

读书

人比雀儿累

1990年6月6日，芒种。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栖宿在窗外几棵广玉兰树上的几百只麻雀突然间叫了起来。闹市的相对寂静顿时被打破了。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伴随我多年的挂钟。5点半！生物钟同挂钟所指示的完全一样。过去只知道雄鸡报晓，自从搬进前后都有广玉兰大树的老式新村居住以后，始知有麻雀报晓。可我天天都比雀儿早。今天雀儿枝上啼时，我已告别夜梦，伏案写有关礼仪改革的文章了。真难写啊，既怕写轻了，不痛不痒，不解决问题；又怕写重了，有人对号入座，说是骂他的，给你来个没完没了。

正在推敲时，雀儿一叫，我立即关上台灯，走出热月书洞（这是我给书房的命名。山洞是人类的摇篮，因此我把书斋称书洞。最近赵朴初先生给我题为“天纵书洞”。只因尚未裱好挂出，姑且仍称热月书洞）。

莫道君行早。院子里已有人在锻炼身体了。我同他们点了点头，然后去干每天要干的两件事：把妻子的自行车推到院子里，从牛奶箱子里取出牛奶。车子推出去了，文字也推敲出来了。我那以劳动代运动的“早操”告一段落。我又回到书洞。

6点半时，妻子为我打开了马虎厅（我们的起居室。因为妻子属马，我属虎，所以取名马虎厅）里的收音机。这时，千字文正好写完。如果说，5点半后的时间复“用”指数不到三的话，从6点半起，时间的复用指数便是十足的三了。听新闻广播，此其一；烧牛奶，此其二；刷牙、洗脸、刮胡子，此其三。三者同时进行。

二十多年来，我们夫妇俩有个习惯：先刷牙的要为后刷牙的挤好牙膏。这样做，不完全是个感情问题，主要是个时间的集约化问题。牙膏管只开关一次，差不多可以节省一分钟的光阴。一分光阴一寸金嘛！今天我为妻子挤好了牙膏。

牛奶烧好以后，新闻广播还没有结束。妻子打扫房间，我坐在马虎厅里，边修改，边誊清。

7点半，稿子抄好，邮票贴好，放入妻子包里。请妻子上班时丢入邮筒。这样可以赶上邮局第一次开邮筒。（顺便说一句：上海的邮筒，多年来都是每日开4次。近年在大谈信息时代时，改为3次。我作为政协委员，以提案的方式建议恢复4次，答复是人手不够。）

嘀铃铃……电话铃声响了。是邻省电台一位节目主持人打来的。这是她第四次打电话来了，说：“办系列答问的事，领导已定下来了。6月底来上海录音……”

刚放下电话，端起饭碗，电话又响了：“喂！邓副主席（编者按：作者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听说有几位领导对你很恼火，说你在那次会上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我听了一笑：“这事我已听到多次了。这几位领导恼火不恼火我不知道，反正没人正式对我批评过，事实上，我也没有那样说过，纯属误传。”“那你去说明一下。”我郑重地说：“不必了。我知道那几位领

导同志也是左右为难。我得体谅他们。即使骂过我，也没什么不好……”

刚端起饭碗，电话又响了：“听说要你参政，当大官，你知道吗？”“我不会当官的。”“我的消息来源非常可靠。你千万别迂腐了，不要再大谈‘淡化“当官心理”’了。上去以后不要忘记我们啊……”

刚吞了几口冷稀饭，电话又响了：“拜读了邓兄的三不养身之道，十分钦佩。你说你‘不吃补药’，一语双关，意味深长。”“不，我当时写这话时，没更多的意思，就是指狭义的补药。”“啊哟，我周围的人都说你话中有话……”

刚撂下饭碗，电话又响了。在我奔向电话机的时候，妻子向我告辞：“如果下雨，别忘了收阳台上的衣服。”我一边向妻子招手，一边对着话筒讲话。是一位老记者打来的。他说：“小弟我最近听到对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议论：一种说法是，你最近表态性的话讲得太多，他们叫我劝你少当花瓶摆设。再一种说法是，有人说你讲话常带刺，叫我劝你少讲带刺的话……”

妻子走后，又有人打来两次电话。我也打出去两次电话。

8点半了。我们一家人都知道从7点半开始的一个小时，不是属于我的。朋友们知道在这个时间里把电话打到家里，准能找到我。8点半以后一般不在家。果然，8点半一过，电话变成哑巴了。

没想到，我今天上午没有会，不出去。

我开始写回信。写信每天要占用我很多时间。八十年代初，在电话难打的日子，我认为写信比打电话快。我过去写信，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速度快，第二是错漏字多。我写好信以后，有的不看第二遍，就发出了。我相信，知音人能看懂，有笔误他们能谅解。现在心情有点变。提起笔来，前思后虑，左顾右盼，斟酌再三。对不熟悉的读者来信，顾虑更大。

不过，今天有一封信，写起来比较流畅。那就是给一位半瘫的大学老同学写回信。我们大概快20年没见面了。她说，她是在看了我的《“三不”养身之道》后，含泪给我写的信。她说，她是用她尚能动弹的被称作万能的那只手给我写信。她在信中，回忆了她从学生时代起就背起家庭出身包袱的情况，讲起了她在病中再次递交入党申请书。我在回信中，赞扬她是“中国的保尔”，“女界的柯察金”，“是我学习的楷模”。

10点了。一口气写完了6封信。还有许多该回的信没有回。我很内疚。但也没办法再写了。写信时间快赶上看书、写书的时间了。我把6封信封好，贴上邮票，锁上房门，跑到马路上寄出去。来回不超过10分钟。这就算是我的“工间操”了。

刚到楼下，就听楼上电话响了，急忙奔上去。是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打来的。他说他孩子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合资企业面试过了。他问我在这个公司里有没有熟人，打个招呼……我一听“打招呼”三个字，就想起有人把我反对打招呼的说法，传成“邓伟志拒绝领导在政治上打招呼”。朋友啊！你肯定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就不会触我霉头了。不过，话传五遍，必然走样，这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实验。懂得这个实验，就心安理得了。

放下电话机以后，我继续读《马克思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我是把马克思的《摘要》同《古代社会》，同刚出版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对照读的。一百多年了，越读越能看出马克思和摩尔根的观点在新发现面前，依然在熠熠生辉。

快到12点了。该吃饭了。

记得妻子上班前关照我中午下面条。我一看还有两只大馒头。为了再压缩消费时间，增加生产时间，我从冰箱里找点剩菜，加点酱油、麻油，倒上开水，泡进馒头。大约三四分钟，洒家就结果了这顿午餐。

打了几分钟瞌睡。12点58分，主动下楼等候1点钟来接我去龙华殡仪馆的轿车。（我平均每月去两次龙华，有次一个下午在同一个大厅参加两次向遗体告别的仪式。）讣告讲2时开追悼会。我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动身呢？因为下午民进市委还有个学习会。我想提前在1时半到龙华，向逝者的亲属表示慰问，然后在2点多一点离开龙华，赶往民进。哪知大厅门口的车子太挤，开不出去。挡在我车前的车子的司机不知去向。我只好等到快3点时才离开。

在由龙华去民进的途中，我惴惴不安。民进的学习是由我分管的。分管学习的不来学习，是讲不过去的。头绪太多，战线太长，是个大问题。因此，我早就打报告提出辞去民进市委副主委的职务。可是因种种原因，领导上要我等一段时间再说。此时此刻，在我深感力不从心时，辞职的念头又浮现出来。

到了民进，学习已近尾声。民进的会议有个习惯，最好4点结束。因为老人多，4点半以后马路上车子就太挤了，老人吃不消。在听完最后一位同志的发言时，已近4点了。主持会议的人一定要我讲话。我实在是勉为其难。可是不讲又有个态度问题。我只好接着最后一位发言者的话茬讲了几句。他说要鼓气。我说，为了鼓气，就得消气。消了气，气才能鼓得进。干起工作来才能一鼓作气。讲后，又不知这话对不对。管不了那么多了……

5时许，回到家里，打开信箱，又有8封信。上午已收到十几封了。不过，我的信件大部分是铅印和油印的。用我女儿小时候的话来说，都是不贴邮票的信。这类信看起来便当。我爱看手写的信。看手写的信，有味道。

在今天的信件中，有一本书很奇怪。这本书的序是作者再三要我写的。作者当时很满意。没想到，经过一年之后，我收到赠书时，序成了嵌进的插页。这是为什么？我干过10年的大百科的出版，能猜透几分。不过，依我的处世哲学，我还是尽量从好处揣测同行。

晚饭前后，翻阅了好几种报纸。

8点，夜幕降临。几百只麻雀在外辛苦了一天之后，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广玉兰树上，又是一阵“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大合唱。可能是因为现在正处在昼长夜短的季节，麻雀离树14个小时，这在一年中是罕见的。不一会，合唱结束，鸦雀无声。我对着隐约可见的广玉兰花，默默地祝福雀儿们睡个好觉。

麻雀睡了，人不能睡。我还得继续笔耕三四个小时。不动笔，手发痒啊！人比雀儿累。今天这么忙，决不是因为今天是芒种。

听，有人敲门。看，客人来了。接待客人也是必要的社会活动。从10年的坐标系看，门庭若市时，文章低产；门可罗雀时，文章高产。今年，客人略有减少，为什么文章反而不见增多？我将在悟出其中道理以后，再写。

我与图书馆有三缘

我这个人没有做过一天图书馆工作，可是我同图书馆有“三缘”：业缘、地缘、姻缘。

先说业缘。1960年，我从大学里一出来就在上海社科院做理论研究工作。说是做研究工作，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涉世不深，懂什么社会科学。主要是边读书，边做一些基础资料工作。同时写些巴掌大的文章。我们研究室很特殊，比大所的级别还高，因此有个不小的图书资料室。我成天泡在资料室里。借书、看书，有时候还帮他们搬书。一縷縷的报刊，资料员来不及拆，我就帮他们拆。拆书一举两得，既减轻了他们的负担，自己又能先睹为快。年轻人的求知欲特别旺盛，不论中文的，还是外文的，能早看到一分钟也是一种享受。在那两年里读的书，比在大学里读书时所读的书不知多上多少。大学里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大跃进，失去了许多读书的时光。在毕业后的两年里，做了几抽屉卡片。那卡片全是从图书里摘出来的，只可惜“文革”中给冲散了。当时望着满地、满走廊的卡片，欲哭无泪。

再说地缘。1962年，我调进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说是研究室，实际上主要是跟着首长的思路找资料，换句话说，还是同图书馆打交道。任务不太急，我们就在“借书——看书——还书”中兜圈子；任务急起来，领导就叫我们住到上海图书馆去，缩短流程，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多看些书。上海图书馆历史长，藏书多，管理得好。住在图书馆里，同图书馆有了“地缘”，“耳食”到不少图书馆学的学识。1989年搬家，成了上图的近邻，我引以为幸事，但愿近书者“痴”。

最后说姻缘。姻缘比较好理解。我是“图”家的女婿。我妻子从事图书工作。现在她是一家专业图书馆的负责人。她的图书馆虽小，可是她大学里的同学全在上海各级各类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这就为我借书和咨询提供了方便。这些年我能够出版二十余本书，是同妻子的帮助分不开的。今年春天，英国、荷兰请我去讲学。回国后遇到我的老邻居，当她知道我偕妻子同去后，用赞美的神情对我说：“应该，应该，你的书，有你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说着说着她和我都热泪盈眶。大概是她太了解我们结发夫妻二三十年来的艰难行程了，太了解我们是如何相濡以沫的了。

令我欣慰的是妻子的同学聚会。聚会时七嘴八舌，简直是开图书馆学研讨会。大家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各有各的独到之处。我作为家属旁听，也长了不少见识。比如他们最近曾议论说：美国的《国会图书分类法》把“陆军”、“海军”分为两大类，可是把“地理”与“娱乐活动”算作一类，太不科学了。我们的《中图法》虽然比美国科学，可是毕竟出台于“文革”，又太突出政治了。他们说：“科学无国界，经济国际化，图书要联网，似乎有趁国际图联在北京开会的时机，讨论一下世界书目分类的相对统一问题。”我想：作为外行的我，虽然说不出内行话，但是既然结了“三缘”，就有把内行话捅出来的责任……

1997年第1期《书城杂志》

巨型图书馆的作用

现在各种营养品的广告不绝于耳，不绝于目。可是，有一种更好的营养品广告，却难得听到，很少看到。这种“更好的营养品”就是书籍。把书籍比作营养品，不是我的发明。苏联的大文豪高尔基说过类似的话，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也说过类似的话。

书籍这营养品是无味的，然而，无味胜有味，其韵味浓于美酒，浓于佳肴。书籍这个营养品是无香的，可是其香味从空间上说，可以飞越高山大海，从时间上说，可以留传百世千代。

书籍这营养品，一般说不是人生第一需要，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更不是人生第一需要。可是，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它正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开门七件事”历来不包括读书，可是千百年来，读书人一直把它视为“开门第一要”，“人生第一营养品”。

人，无财不富。可别忘了人还有个无书不高、无书不雅的大问题。不读书，越有钱摆阔，越显得俗不可耐。家具店不售书架、书橱的现象，迟早会扭转。人均购书、藏书量，迟早会写进各级政府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会成为社会文明的量化指标。

可是，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藏多少百万册书。书籍的枢纽应当在图书馆。图书馆是人类精华的荟萃之地，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大都市的形象标志。人，常进图书馆，有可能学贯中西，可也未必学贯中西；可是，人，任何人，假如他不进图书馆，决不能成大器。文明时代的伟人都与图书馆有不解之缘。马克思与大英图书馆，毛泽东与北大图书馆，都是有力的说明。

我去过欧美不少城市，亲眼看到许多城市的市政厅同图书馆相毗邻，亲眼看到许多城市的市政厅的建筑远不如图书馆宏伟。我还到过一座同上海结为“友好城市”的大城市，在讨论是先扩建市政厅还是先扩建图书馆的问题上，议会最后通过的方案是先扩建图书馆。在他们的眼里，书力大于权力，图书馆重于政府机构。

我们的上海图书馆新馆部分开馆了。这对于丰富精神营养、提高人口素质、完善大都市形象是有益的。希望她能成为知识的宝库，成为“大庇天下”知识分子“俱欢颜”的“广厦”。希望在开馆后，门庭若市，而不是门可罗雀。希望上海图书馆不仅每周开放的时间能够是比较多的，而且进了图书馆能够比较舒坦，对读书人，应强调“苦读”，可对图书馆来讲，应让读书人“读书乐”。当然，要做到这些，除了加强图书馆自身建设以外，还同全民的读书意识、全社会的读书风气有关。现在批评“读书无用论”的多是指责青年，殊不知中老年不读书的情况也很严重。不读书，导致许多人在精神上的“营养不良”。“吃偏食”导致工作上出偏差。过去常批教条主义读书太多，不知教条主义者恰是因为读书太少，才抓住片言只语瞎指挥的。倘是读书多了，就会懂得事情的复杂性。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就不会生搬硬套教条了。

上海图书馆在中国属巨型图书馆。可是，再大的图书馆也不可能包罗万象。维生素有“六维”。六维也不过“六维”，还有很多“维”呐！图书馆种类繁多，有综合的，有专业的，有大的，有小的，有国立的，有集体的，也不排斥有私立的，它们各有千秋，各有各的位置。馆多则智多，馆多市容更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巨型图书馆的上图，应发挥航空母舰作用，在带

动、扶植各级各类图书馆方面下功夫。要联网，可是有网必有目、有纲。中国近年不大提“纲”了，其实纲总是有的，问题在于分寸。上图应成为上海图书网络之“纲”，成为上海图书网络的核心，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图书网络核心之一。

上海图书馆编《新馆开馆纪念集》，1996年出版。

图书节引出的话题

上海首届图书节为上海增色不少。但也引出不少有关文化的话题。

首先，上海应当成为中国最大的图书集散地。国内外的人不仅来上海购物，也要来购书。图书应成为上海的象征。

其次，上海人的人均购书费用应当有所增长。增长的速度应当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原来的基数太低了）。购书费用占全部消费的比例应有所提高。剔除物价因素，应当是人均购买的码样（数量），逐年提高。这一条应当写进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像人均电、人均油、人均粮一样，向全市人民报告，接受人民群众的评议。

第三，上海应当是翻译书的主渠道。上海翻译书的数量在近现代史上一直是“大户”。在“闭关锁国”时尚能如此；在开放后，在国际化的情况下，更应该如此。翻译书的情况，是衡量我国开放的一个标志。

第四，书架应当飞入寻常百姓家。上海人家中拥有的书架数量，即藏书量，也应该是国内比较多的。要改变买不到实用的书架、很少生产书架的现状。

第五，上海应当是书评大市。现在上海有指导读书的报纸、刊物，有好几家书摘刊物，在不少非读书报刊中，有读书版、读书栏。广播电视也有读书节目。书评要有褒有贬，褒不是捧场，贬不是攻击。书评会不分大小，办一句话书评会、半小时书评会也无不可。

第六，上海的图书馆事业还得大发展。能不能做到每个街道都有个像样的图书馆，让人们跑出去 20 分钟就能借到书？

总之，我们要把上海的读书空气搞得浓浓的。要为干部规定读书指标。迅速扭转干部不大看书的局面。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每个人进步的阶梯。在生活提高以后，精神食粮就显得比物质食粮更重要。

1996 年 8 月 28 日《新民晚报》

我们呼吁

《光明日报》报道，正在改建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新华书店未来的位置何在，尚不得而知”。对此，我们深表关切。

中国是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首都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城市。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是一家与新中国同龄的大型书店。45年来它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数以亿计的各类精神产品，在首都乃至全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王府井商业区的更加繁荣，这家书店理应得到更大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遵循的基本方针。我们呼吁：在城镇发展建设中，要充分重视担负着宣传真理、交流文化、传播知识、提高民族素质重要任务的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的作用。我们期望：在王府井改建工程完成之后，王府井新华书店将以崭新面貌坐落在这—繁荣地段，以它宽敞的场地，一流的设施和优质的服务，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加方便和优越的环境，成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窗口。

1994年10月31日

“天有多高”

在幼儿时，有时做错了事情，母亲常常这样批评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现在离家已有多年了，母亲的这种批评听不到了。但是，和同志们生活在一起，偶尔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自己有时也这样说别人：“你简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听归听，说归说，究竟“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问题，在我却始终是个谜。直到最近，读了《十万个为什么》以后，才晓得：从地表到地心大约有6400公里，从地表到大气层的边缘大约800多公里。

谜底总算找到了，令人兴奋。但在兴奋之余，我却有点负疚：竟拖了十几年才搞清楚“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现在想想，这样简单的问题，只要有求知的欲望，张口问问就解决了。然而，我在小学时，没有问过小学老师，中学时也没问过中学老师，大学时也没问过大学老师，所以大学毕业以后，仍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实际上，岂止“天有多高”一个问题是如此，《十万个为什么》一书当中有许多个为什么我都不知道。诸如“为什么棒冰会冒气”，“为什么老鹰张开翅膀不动，也不会掉下来”，“白兔子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之类，屈指难数，不胜枚举。看看似乎简单，经常碰到，但是讲讲又实在讲不清楚。

为什么有时不常碰见的问题倒反而知道，可是对那些随时可问的问题却不肯去问呢？原因无他，只是有些眼高手低、舍近求远罢了。从前有位诗人说：“离山十里，柴在家里，离山一里，柴在山里。”这句话过去看了，不以为然，现在想想，确有道理。怪不得有人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也许是说的同一个道理吧。“到处留心皆是学”，我们要作有心人，要有“凡人类的知识我都要知道”的求知欲，不让任何一个“为什么”从我们身边溜走。脑子里要多装几个问题，遇事先问它三个为什么。今天问三个为什么，明天又问三个为什么，久而久之就会知道十万个、百万个、千万个为什么，就不再是一个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人了。

1961年10月22日《中国青年报》

先“读”为快

“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学不是乐，不乐不是学。”幼时所学的这首《学乐歌》，至今记忆犹新。

是的，读书是快乐的。可这“乐”有没有程度不同呢？应该说是有的。比如说，是先读乐呢还是后读乐？毫无疑问，先“读”为快，先“读”更乐。不少学者有逛书店的习惯，目的就是为了买到新书先读。

不过，世上还有比新书更早的书。这就是即将发行的书，或者是即将出版的书。对这种书，干编辑这一行，有条件先读。

这种尚未变成铅字的书同已经变成铅字的书相比，总要有点新东西，或观点新，或材料新，或角度新。从书稿来讲，不新，就没有必要变成铅字，不新，就难以实现后来居上；从读者来讲，普遍有求新、喜新的心理。一个人的求新、喜新心理被满足之后，乐趣就随之而来。新，是滋生快乐的源泉。

日前，我读到一本有关孔德的书。孔德，人称“社会学之父”。可长期以来，作为社会学爱好者的我，对孔德并不了解，因此，当我看到一本有关孔德的书稿时，如获至宝，尤其是书中的资料改变了我对孔德的传统看法，倍觉快乐。顺便说个小例子：不少书上讲，孔德抄袭圣西门的东西。我也这么信。这次一读，才对孔、圣关系有真正的了解。孔是圣的秘书。两人在著作上，可以说是孔中有圣，圣中有孔。在圣之后，孔对圣有发展。一味地认为孔抄袭圣，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抄袭来的，是人云亦云，是以讹传讹。

编者也是读者。读半成品书，是人生一大乐趣。

1986年4月29日《新民晚报》

我收藏的两部“毛选”

在我的天纵书洞（我原名邓天纵，因此书房名天纵书洞）中有一个毛泽东研究专柜。可是，有两套“毛选”我没有放在专柜里，而是另行珍藏。并且也不大愿意外借。

一套是1947年由晋察冀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父亲留给母亲和我们姊弟四人的全部遗产就两样：一是他自己使用的几枚图章，二是他自己常读的十几本书。图章和一部分书，早在多年前，毛泽东主办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陈列馆来我家征集学员遗物时，母亲捐赠给了他们。我们就从遗物中留下了这套“毛选”。后来，也有些陈列室希望我们捐赠，姐姐代表我们表示：母亲百年之后肯定捐赠。因为这套“毛选”是家中仅有的父亲遗物，是母亲的感情寄托。

其实这套“毛选”，论印刷是很差的；论纸张，更是今日之任何出版物中都找不到这么差的。可是，论感情，我们与她是最深厚的。这套“毛选”，伴随着父亲越过多少次敌人的封锁线，经历过多少次敌机的狂轰滥炸。我第一次看到这套“毛选”，是1948年冬天在淮海战场上。根据后来的推算，可能是12月1日或12月2日。在国民党军队由徐州向西南逃窜时，解放军加紧追击，这时我跟着父亲住在离以邓小平为首的前委驻地临涣集不远的濉溪东关。敌机为干扰解放军的追击，从早到晚在头上飞来飞去，又是扔炸弹，又是用机枪狂射。我亲眼看见许多战士牺牲在我们旁边。父亲也作了牺牲的准备。为了轻装，他扔掉了很多东西，也准备把我这个亲生儿子扔掉。分手时，我看见在他文书的挎包里，放着这套“毛选”。

这套“毛选”，分六卷，共有60余万字。收入了毛泽东在40年代前的主要作品。这套“毛选”的绝大部分作品，后来，被收入了5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中。我们珍爱这套“毛选”，现在看，已不是着眼于版本了，而是因为上面有父亲的体温，有战争的弹药香味。

我珍藏的另一部“毛选”，是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是1960年大学毕业的。毕业论文一交，毕业文凭还没到手，3月30日已被分配在刚成立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工作。为什么成立毛主席著作学习室？据我们的室主任庞季云同志透露：毛选四卷即将出版。到时候要写出一批学习文章。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向毛泽东同志建议在京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毛泽东不同意。于是，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来了个对策，你不同意在北京成立，我就到上海成立。你不同意成立研究所，我就成立学习室。于是，国内首家毛泽东思想研究机构毛主席著作学习室便在上海社科院应运而生。说是学习室，实际规格比研究所还高。室主任由副院长庞季云兼任。这位副院长又是由北京中宣部下放过来的。他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秘书。再就是业务上由市委宣传部直接抓。学习室的头一项任务是迎接毛选四卷出版，准备写一批文章。可是，距离出版时间还有半年，谁都没见过四卷是什么样，怎么写学习体会呢？于是，我们工作的第一步是自编《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公开的自然会收进来，没公开的也尽量收进来。不久，大约是6月份，聂荣臻元帅到上海，送给柯庆施一份四卷目录。柯庆施便把它转给庞季云。我们把自编的目录同聂帅的目录进行对照，发现我们只编到了一半多一点儿。9月，我们室里拿到了第一本毛选第四卷样书。大家轮流阅读，人停书不停。有家的白天看，我们没成家的夜里看。结果发现四卷的目录比聂帅的目录少

一篇。这就是《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至于说文字，也发现有改动。我向庞季云等作了汇报。10月1日毛选4卷开始在上海发行，一大早我便去静安寺新华书店排队为大家买书。大批的书到手以后，庞季云分配我一项任务，把新老版本逐篇对照。因为新版本容易买到，我就在新版本上用红笔恢复老版本的原样。于是发现几乎每篇都有改动。改动的情况大体可分四类：一类是文字改动，二类是资料改动，三类是观点改动，四类是策略改动。从改动能体会出政治走向。正因为从改动中能悟出许多道理，所以庞季云吩咐我不要把我的这本复原本乱传，妥为保存。文革中，我的房间遭到两次洗劫，可是，这复原本安然无恙，以至于能珍藏至今。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过了几十年。回首往事，有两点想法。第一，要尊重原作。不论是编者还是作者要改动原作，都应当加注。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越是应该让读者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了尊重原作这一条，就有条件提出第二条：编辑出版的速度应该快一点。我珍藏的晋察冀六卷本的前身是晋察冀日报的负责人邓拓编的五卷本。邓拓的五卷本从接受任务到编辑、到出版，前后不到半年。今天的印刷条件同晋察冀的印刷条件是不能比的，为什么反而慢了？我们在出版方面，尤其是在出版文选方面，应该召回“邓拓速度”。实事求是出速度。尊重历史出速度。速度快慢是文化背景的标尺。

1993年9月25日，1993年12月18日《新民晚报》

《陶行知诗歌集·序》手迹归国记

陶行知先生一生写过大量诗歌，都收入了《陶行知全集》。可是，陶行知 1945 年 12 月 9 日为他自己的诗歌集所写的序，在各种版本的陶行知作品中都没有刊出过。最近，我把这篇序的手迹由美国带回，交给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先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5 年 12 月，陶行知要去参加悼念昆明死难者的会议。参加纪念会是有风险的。陶行知大有被暗杀的可能，特务也是这样警告他的。在纪念会前，陶行知组织他的学生、朋友以及他的夫人，连夜为他整理、复写他的诗歌。陶行知是教育家，同时也是诗人。他对自己几十年来所写的诗歌十分珍惜。在整理、复写完以后，为了手稿的安全，陶行知提出分送到几个地方：一份送进银行的保险箱；一份交给他的学生，因为这位学生的父亲是搞出版的；还有一份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那就是送给美国驻上海的一位领事。

这位领事叫弗利德曼，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重庆、上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在上海时，弗利德曼是联系工会方面的领事。弗利德曼同陶行知有过往来，他在接触了陶行知等进步人士以后，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他曾建议美国政府不要再援助国民党打内战了。不援助，国民党要失败；援助了，国民党也要失败。弗利德曼的建议一出，他就被调回美国整肃去了。从此，美国政府不许弗利德曼再做外交官，只能到大学去教书。弗利德曼在被调回国时，把陶行知送给他的诗歌集复写件也带到了美国，精心保存。后来又在病逝前，把这份凝聚着陶行知心血和友谊的手稿交给了他的次子克拉克，嘱咐克拉克无论如何保存好，在适当时候交还给中国人。

克拉克受父亲影响，对中国很友好，努力学习汉语。80 年代中期，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克拉克的夫人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曾在上海电视台主持过《老外唱中国歌》节目。现在克拉克是美国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在上海、北京、海南、常州等地都有投资。1993 年我去波士顿开会，克拉克邀我到他家作客，并说他家有一本中国教育家的手稿。我喜出望外。在克拉克家的松树下吃好饭以后，他把一本厚厚的《陶行知诗歌集·第一集》手稿交给了我。我喜上眉梢，把手稿视为无价之宝。同去的卫青小姐为我们拍了许多照片。由于我对《陶行知全集》钻研不够，记不清这第一集诗歌是否发表过，便对克拉克说：“这手迹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没有发表过，价值就更大了。”

回国后，我逐篇查对，对了一种版本，再对一种版本，方才知复写出的诗歌都已出版，只是在次序上略有调整。唯有那篇不是复写、而是用毛笔手写的序，没有发表过。

这篇写于 1945 年 12 月 9 日的序不长，可谓言简意赅，文字优美，且富有哲理。

陶行知的《自序》全文如下：“这是二十七年来所写诗歌全集，大部分之译诗来不及搜集，故未列入。这里面有不少的烂污泥，因为不忍割爱，姑且留着它，给人知道我的全貌。而且虽是烂污泥，我的诗歌便是从它那处长出来的。里面有莲花，也有空心菜，不大美丽，但可以供穷人下饭。还有一些只是粗糙的肥料，不嫌脏的人，可以用它来培养更好吃的菜蔬或更美丽的莲花。”

《自序》是写在宣纸上的，可是，毕竟过了半个世纪，宣纸有点破损。“培养”二字后边是个“更”字，已看不全了。最后一个字是“花”，也因没有装裱，在复印时难以摆得端正，所以有点歪斜。文后签署的日期，为“卅四”，也因折绌，复印后变得像“卅四”。

陶序回国的消息传开后，不少地方希望把原件放在他们那里，各有各的道理，我深表理解。可我只能交给一家，最后，我把它交给了全国陶研会长方明先生。

方明老一看，就说：这是真品。序，是陶行知的真迹；复印的诗歌是出自师母之手。正当我们爱不释手时，在北京的苏州老画家谢孝思老先生走了过来。他一看封面就说：“这陶行知的图章是我刻的。”我同方老洗耳恭听。谢老说：陶行知先生当时名气很大，可是他没有什么好图章。大家问他，怎么不刻一枚好图章呢？陶先生回答：“我一会儿叫行知，一会儿叫知行，怎么个刻法呢？”于是，大家推谢孝思为陶行知刻图章。谢先生当仁不让，下了一番功夫为陶先生刻了一枚既可读作“行知”，又可读作“知行”的图章。陶行知高兴地接受了这枚图章，立即兴致勃勃地挥笔为谢老写了幅字，然后又认真地盖上了这枚图章。至今这幅字还在谢老家中，印记同手稿上的印记一模一样。

《陶行知诗歌集·序》回来了。相信她的公之于世，对于陶行知研究、对于文艺界和教育界将会是有益的。

1996年第9期《上海滩》

黎烈文为什么去台湾

最近贵刊开始选载了著名作家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曹先生直到去年年初还被一家刊物指为“反动文人”，你们今年就发表他的作品，这说明你们的思想是解放的。在第101期上看到曹聚仁的《我与黎烈文》，更觉得你们的思想是解放的。因为，1973年上海出版的《鲁迅杂文选》的注释上讲：黎烈文“后来堕落为反动文人”。敢发表“反动文人”论“反动文人”的文章，这是需要点勇气的。但是，看到里面的删节号，我又感到有些遗憾。

删，历来是编者的权利。但是，删得当不当，则是另一回事。这里不妨把你们所删的一段，抄录于后：

朋友们或许会记起了××。××呢？这就和黎烈文兄有关了。原来黎兄到福州以后，郁达夫兄也到福州去了；××的夫人，也到了福州，参加了改进社的工作。世人都知道郁达夫、王映霞的婚变，却不知××夫人也闹了婚变。她和黎兄相接近，进入热恋阶段。在上海的××兄，失恋之余几乎发疯了。突然，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兄舍身为国，投入政治工作团去。可是，他跟新闻界并没有什么联系，要找战地记者的岗位，实在很困难。那年冬天，杭州陷落前夕，我和××兄街头相遇，他惶惶然不知所措。我劝他找一个有着落的单位，否则在乱糟糟的圈子里，会惹出意想不到的祸害的。后来，新四军司令部在江西南昌成立，奉命向皖南推进。他碰到了一些熟人，就在那儿生根了。到了解放前夕，新四军（应为解放军——邓注）在苏北一带作渡江准备，××兄随军推进，准备进入上海，作接收望平街的打算，他后来也是主持解放日报编务的人手之一。这样，冤家路狭，黎兄自不便在上海留下来了。古有“朋友妻，不可嬉”之训，信然。（引文所有“××”，均为一——邓注）

倘若不删去这一段，读者就会对黎烈文先生为什么在上海解放前夕去台湾的缘由一清二楚了。换句话说，人们就会对黎怎样“堕落为反动文人”一清二楚了。曹先生是爱国的，黎先生也是爱国的。黎离沪去台，主要不是从政治上考虑，而是出于私生活上的苦衷。这也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的。删掉了这一段，保留了黎返台“出乎上海朋友们的意料”，这将引导人们往哪里想呢？要尊重事实，尊重原著，不要为尊者讳。

当然，编者有编者的难处：曹文提到的“××兄”如今还健在。把活着的人的家务事兜出去，影响不大好。但是，也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只顾大陆上的活人，不顾在台的活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嘛！再说，你们在第100期上发表曹聚仁的《也谈郁达夫》时，不也保留着郁王之间的家庭纠葛吗？王映霞现在也还活在上海呀！听说，王在看了贵刊以后，并无反感。王说：曹先生是讲了公道话的。在郁王婚变问题上，郁也是有责任的。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只有郁讲话的地方，没有王解释的余地罢了。因为男女不平等啊，地位有高低啊！几十年前，男女不平等，人之分高下，毋庸多说，今天怎么可以不为女子讳，却为男子讳，不为下者讳，却为尊者讳呢？

不过，笔者尽管这样说，仍然用了“××”，还是为尊者讳了。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但是我认为，这样处理，无损于××，却有助于读者了解黎烈文。

1980年6月27日，1980年8月《文教资料简报》

《文教资料简报》在发表本文时，加了编者按：邓伟志同志的批评非常中肯，使我们深受教育。我们要学习邓同志这种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也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我们以监督和支持！

纪念陆晶清

案头的一本《陆晶清诗文集》，把我的思绪带回到 50 年代。

我的恩师

我是 1956 年考入上海财经学院的。入校后选修了陆晶清教授的中文课。她讲课旁征博引，议论风生。听她讲课，比听经济理论课有趣得多。开课不久，就是鲁迅逝世 20 周年，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听陆老师讲鲁迅，整个解放楼大礼堂挤得满满的。她是鲁迅的学生，她讲到鲁迅的严格与风趣。她是许广平的同学，她讲了许广平的许多故事。她也是刘和珍的同学，她同刘和珍一起游行，并且受过伤，在讲到刘和珍的事迹时，她有点哽咽，我们听的人也热泪盈眶。会后，她在院刊上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纪念鲁迅》一文，里边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可惜刊出时编辑把“记”改成了“纪”。

她对我们说：“我的文章重在‘记’，应为‘纪念’，可是编辑按常识改为‘纪念’。”

在听了陆老师讲课以后，我专门到图书馆里去查阅了鲁迅的《两地书》，方知鲁迅对陆老师很器重。鲁迅说陆老师“组织能力强”，要许广平向陆晶清学习。我们还从鲁迅著作的注释中知道她出版过诗集。事情传开来以后，选修中文的同学激增。在鲁迅墓从万国公墓迁到虹口公园时，有关部门要就近从我们学校抽一些学生去做工作人员。陆老师派了我去，让我见见世面，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与此同时，市作协、团市委、总工会联合举办文学知识讲座，陆老师又推荐我去。从学校所在地欧阳路到听讲座的礼堂（当时的卫生学校礼堂，现为位于静安寺的电子计算机集团）乘一路有轨，往返至少要 2 角钱。陆老师怕我这穷学生出不起路费，失去听讲机会，关照院刊编辑部给我报销。一共十讲，主讲人有巴金、许杰、唐弢、熊佛西、赵景深等十位名家。听了以后，陆老师要我谈体会，记得有次还要我写体会。

忽然成了“敌人”

半年以后，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一位又一位老师被“揪”了出来，好像没看见陆老师吃什么大字报。我暗暗以为这是陆老师平时谨慎，而又不谈政治的结果。记得同学们向她讨教时，她总是只侃侃谈文学，尽力撇开政治。她自己好像也以为这样就可能太平。那知有一天忽然见《解放日报》头版发了批斗陆老师的消息。篇幅不长，讲了她与陈铭枢通信，是攻击什么；讲了她与胡曲原通信，就是与汉奸怎么的。这以后，我很想见见老师。不知是不是因为师生在两个大院的缘故，我怎么也看不见她。直到 1958 年秋，财经学院与政法学院、复旦法律系以及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经济、历史等研究所合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后，我在韬奋楼前与她相遇。她先是一笑，随后便收敛了笑容，扭头走了过去。我当时虽然不到 20 岁，但是已懂点“运动心理学”，知道见面不打招呼是倒霉的人不牵连别人的最佳做法。可是，一个得到老师厚爱的学生怎么能不同老师打招呼呢？当我知道她还在上海以后，便带着一本鲁迅作品从中山公园后门步行到岳阳路陆老师家中，向她请教如何写小说。学经济的学生怎么写起小说来？因为当时什么都是“全民”，全民皆兵，

全民体育，全民写电影，全民写小说。校党委、团委便分配我代表学校写小说。我是用请教小说的名义去的，事实上也除了谈小说以外，别的什么都没谈。真正想谈的一句没有谈，也不用谈，不谈比谈更好，不谈心里也明白。平常我去老师家时，老师都是送学生下楼，这次去，她连门也没出……

又成了我的社会学导师

“文革”结束后，陆老师情绪大振。她听到右派分子要平反，特别高兴。可是，当我劝她写文章时，她仍然心有余悸。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心有余悸。197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要办《百科知识》杂志，刘尊棋、陈虞孙命我参与一部分筹备工作。他们提出要在刊物上发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照片。我想起陆老师家中藏有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照片，从来没有发表过。我请求老师发表，她同意了。可是，这时陆老师的右派改正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我担心领导会从政治上考虑。没想到刘尊老见到照片时，喜出望外，感叹地说：“我终于知道了她的下落……”原来陆老师同刘尊老夫妇是多年的朋友。由于刘尊老当时正在发生婚变，两人没能见面。

“三·一八”北京女师大上街游行的照片发表后，已经搁笔几十年的陆老师想动笔了；报刊也纷纷来约稿了。可是，她这时已年过古稀，又近视又老花的眼睛也不太好使。她不太想用格子极小的稿纸，渴望格子大一点、空隙多一点的稿纸，要我帮她想办法。后来，她就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回忆鲁迅、回忆何香凝、回忆浦熙修的文章。

1980年秋天，作家、社会活动家胡兰畦女士来我家。胡从我刚发表的《家庭的淡化问题》说到她的家庭变迁，说到她参加妇女运动的经历，说到20年代的《妇女周刊》，忽然说出陆晶清的名字。我说：“陆晶清是我老师……”胡兰畦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急着问我：“她在哪里？”接着胡兰畦阿姨向我讲述了陆老师年轻时叱咤风云的故事以及在文学上的成就：老师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并在由何香凝任部长的中央妇女部任干事。老师曾与丁玲、冯雪峰、陈望道一起组织中国作家抗日会。1934年老师曾与胡阿姨、萧三一起列席全俄作家会议，见到高尔基。更意想不到的是，老师还参与编辑过《中国社会史论战》。胡阿姨说，这是你这位社会学界新兵不可不读的学习教材。

听了胡阿姨的介绍，我在想：我怎么对老师这么不了解呢？历史怎么把我老师给忘记了呢？后来，我的文学老师又成为了我的社会学老师。在我的《妇女学呐喊》和《妇女问题杂谈》两书中，有很多陆老师的观点。

1998年第3期《世纪》

用档案写历史

我喜欢读传记，喜欢买传记；家里至少藏有上百本国内外名人的传记。几十年来，我从各类传记中学到了不少做人的学问。可是，传记类书籍同其它书籍一样，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的。

何谓“良”？何谓“莠”？区别传记质量好坏的第一位的标准是真假。对传记的要求应当是：赞不溢其美，毁不增其恶。失真的传记，不论是自传还是他传，不论文字如何华丽，都是不足取的。

现在有些传记，装帧、纸张都不错，扉页上的领导题词也很光彩，可是读起来总觉得不顺。读多了，还会出现此传与彼传之间不一致，甚至有南辕北辙之处。

之所以如此，这里有几种情况。有的是因为记忆错误。如有一本很有名的传记，竟然把江西省委书记的夫人说成是山东省委书记的夫人。我相信，传记作者的这种张冠李戴不是有意的，更不会恶意的。可是，他犯了一个令人、至少是令当事人不安的错误。还有些传记就更那个了，一味地美化自己，把自传变成了“自吹”。为了吹自己，往往还得打别人。在打别人的时候，又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意也罢，无意也罢，都是对历史的歪曲。

那么，怎样才能减少或避免这种歪曲历史的现象呢？我认为，有一条是不可少的，那就是查档。档案是社会的化石。用化石说明地质年代是最过硬不过的了。档案是文明社会的历史记录。既是历史的记录，就不存在迎合后人的问题，尤其是不会迎合某一具体后人的具体需要。档案是铁证。前不久，有一篇回忆录，称某同志1959年在庐山的中央全会上如何如何，发表后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来一查档，这位同志并未出席中央全会。于是回忆录作者只得把这一段文字从回忆录中删去。很明显，那位作者如果当初能查一查会议档案，不就可以避免这一场风波了吗？不就可以减少自己的被动呢？

档案是无情的。你喜欢它，它自己会存在；你不喜欢它，它也会存在。无情的档案自然也会给人带来麻烦。可这麻烦是历史唯物主义加给我们的，是无法回避的。只要有档案在，它就不容许主观臆测。倘若没有了档案带来的麻烦，历史就不严肃了，世界也就太简单了。倘若没有了档案带给人们的麻烦，史学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大了。史家的天才就在于如何正视和对待档案带来的诸多麻烦。

当然，档案有精有粗，有美有丑，有曲有直，甚至也有不真实之处。可这种不真实同有意歪曲出来的不真实有所区别。档案的不真实大多是由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是由档案记录者视野的局限性造成的。对这类不真实，后人有权批评它，应当指出来。后人写出数倍于档案篇幅的批评文章也是允许的。然而，后人决没有权利篡改档案，更没权利毁掉档案，中国现已有了《档案法》，决不允许江青毁档案的历史在中国重演。后人所揭露出的档案中所包含的错误，恰是档案“丰富”的一面，恰是历史“多彩”的一面。历史不反对批评，历史也允许反批评。批评与反批评都应当存在档案库之中，都是档案的延续，都是档案的发展。

丰富知识与解放思想

最近有位领导同志接到一篇科学论文，如获至宝。他明知论文作者政治上并不怎么强，也极力推荐。可谓思想解放矣！不料，科学家们看了，个个摇头，说：“靠这种论文搞四个现代化，等于是骑着自行车登月。”

听到这件事以后，我想了很久，觉得：思想的解放，不能光靠不怕。除了五不怕、六不怕以外，还要有知识。对无知或少知的人来说，他越是不怕则越糟。那位大胆而不识货的领导同志推荐的是论文，况且又受到抵制，没产生什么恶果。若是推荐别的，比如什么“生产措施”之类，岂不要闯下大祸！遥想二十年前的密植、亩产万斤，还不都是无知的产物吗？你没有一亩可以种多少棵的知识，没有一穗可以结多少粒的知识，没有植物需要空气、阳光的知识，又没有对干部的报告要一分为二的知识，就难免要上当。上谁的当？与其说是上别人谎报的当，不如说是上自己无知的当。

人们头脑中的禁区，一般是无知的“白区”。即使是别人设置的禁区，也是因为自己无知才接受的。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他们以打猎为生，敢驱虎豹，不怕熊罴，但是不懂农业，害怕耕牛，见了耕牛要祈祷。在教他们用牛耕田时，他们怕得要命，一根牛绳要四、五个人一起牵。知识是打开思想禁区的钥匙。他们一旦掌握了有关耕牛的知识，就知道耕牛远没有虎豹可怕，从而变可怕的禁区为无畏的坦途。

人们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知识不断丰富过程。思想解放的程度，依赖于知识丰富的程度。在人们只能用肉眼观测天体时，就容易得出地球不动的地心说。你看，如果地球在动，为什么离开地球的小鸟不被地球抛在后头？见多则识广。后来，哥白尼有了云彩和飞鸟跟着地球一起转动的知识，就突破了地静说和地心说的禁区，提出了日心说。但是，太阳不过是银河系边上之一粟，怎么会是宇宙的中心呢？这说明哥白尼知识仍然有限。因此，在他的《天体运行论》问世五十年后，便有人突破了他的框框，提出了宇宙无限论，把人类的知识水平又提高了一步。

不仅如此，知识还能给人以解放思想的勇气。知识不多，即使是抓住了真理，也经不起谬误的袭击。反之，知识渊博，不管袭击来自何方，都能有力量挡回去。冲破盖伦学派框框的塞尔维特，面对着宗教裁判所的审问，说：“我知道我将为自己的学说，为真理而死，但这并不会减少我的勇气。”塞尔维特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毫无疑问，是来自于他的学说，来自于他那血液循环的知识。

禁区，往往来自愚昧无知。有了物质无限可分、认识永无止境的知识，就不会认为这也是禁区，那也是禁区。知识是禁区的掘墓人。让我们用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去不断地解放我们的思想吧！

1979年2月26日《解放日报》

夏 勉

屋前屋后有四株由康有为在一二十年代与其妻妾们亲手所植的广玉兰，
栖有各种鸟类。冬至后以每天递增半分钟的时辰开始啼叫；夏至后以每天递
减半分钟的时辰开始啼叫。我的读书生活是“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
实际上冬天多在鸟啼前，夏天有时要在鸟啼后。丁丑大暑日，一名为“叫翁”
的美丽小鸟，飞入我书洞。邻人捉到后，彼此欣赏一会，又放回树上。于是
我就提笔合唐代诗人金昌绪的《春怨》写了这首《夏勉》：

莫打黄莺儿，放它枝上啼。
啼声胜钟声，催人更奋起。

1997年7月30日《新民晚报》

谈读书

您是怎样看待读书与写书的？

我认为两者之间是互为联系的。书，无非是记录下来的知识。知识本身既有整化，又有分化。越是分化得厉害，越是要注意整化。比如研究地球的物理、化学、演化、火山、地震等等，尽管分支很多，但都离不开地球这个统一体。因此，我写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读”是为了“写”，所以我是有选择地读书。

记得您曾说过：“要在多学科的大跨度交叉中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您是怎样以百科攻一科的呢？

“百科”意即多学科。我搞家庭学，又搞未来学，还研究妇女学，看来分散，其实还是围绕社会学这一轴心。在学术研究中，既有隔行如隔山的一面，又有隔行不隔理的一面。我是力求用百科来攻一科，借多学科的优势来集中解决一个学科的问题。学习借鉴百科知识，可以开阔思想，触“这个类”旁“那个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读一点历史和文学知识的书，可以使理论文章写得丰满，具有可读性。小说中也有家庭学，搞家庭调查并不见得完全真实，而不真实即虚构的小说倒可以揭示深刻的家庭主题，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揭示了社会学的尖端。

听说您有一个“读”与“写”的新招，叫作“扇形效应治学”方法，是吗？

是的。有选择地读书之后，往往能就某一点写了一本书（或文章），但马上再接下去写，就很难有新突破。这就象跳高，要超一厘米，谈何容易！我把折扇效应移植到“读”与“写”上来，把研究领域不断转换5度。转换5度，就是偏离了原来的领域，而又同原来的领域距离不远。偏离5度不是重起炉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为了超越自我。偏离5度依然可以站在原来领域的高度，进入新领域。偏离5度搞得越好，可以做到高出原来领域5度。不断转换5度，就是不断学习，不断借助于新领域的新成就来攻下制高点。再把攻下的一个又一个制高点连起来（或称写出来），就是那个奇妙的弧长。

1990年3月6日《新民晚报》

写 书

在争议中奋进

要是扣紧“我和我的书”这个总题目作文章，似乎有一定难度。首先，对“我”应该怎样评价，一直有争议；其次，对“我的书”应该怎样评价，也是一直有争议的；再次，如果要在“和”字上作文章，又会因为“两个争议”的交叉，产生更大争议，变得难上加难。可是，如果不求四平八稳，好像又不太难。笔握在手里。手同脑是联成一体的。脑子怎么想，手就怎么写，岂有难写之理！

我是学社会科学的，但是我所著的第一批书
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尤为奇怪的是：第一种
书是多版权或者说是无版权的书

1956年9月，我在不满18岁的时候，便开始了“以文养读”的生活。每月在报上发一两篇“豆腐干”文章，拿那么几块钱稿费，作为生活零用。吃，由国家包了，我享受甲等助学金，每月发给12元半的伙食费。1960年毕业分配在国内第一家社会科学院的国内第一家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后更名为研究室）工作。1962年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专门攻读《列宁全集》，业余写点小文章。我酷爱社会科学。列宁和毛泽东的一些名篇、名句，我早在学雷锋运动以前，就能背出来。庞季云鼓励我背，杨永直鼓励我背，俞铭璜也鼓励我背，魏文伯还摸着我的头鼓励我背。我自己也有着背的强烈愿望。

可是，我出版的第一批书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第一批的第一种书的书名叫做《天体的来龙去脉》。

抛开内容不说，这部书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署名不是我的笔名。《天体的来龙去脉》作者署名余衡泰。这个名字是我起的，但笔名不是我个人的。参加这本书写作的前后有5位。署真名实姓，现在看来是共同的愿望，但在当时是犯忌的，谁也不提署真名。5人之中，以我为主，只好由我出来搞左的一套：因为书的第一章讲的是宇宙，我提议我们都姓“余”；因为书的第二章讲的是恒星，我提议，我们是“衡”字辈；因为书的第三章讲的是太阳，所以我们都取名“泰”。大家一听，都表示同意，就这么定了。

第二，书稿由两家出版社分别、同时出版。这大概也是少有的。事情是这样：书稿先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连载；载毕，在当时上海唯一的一家大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4年3月出版。没想到云南人民出版社根据杂志所载，于1974年4月出版。出版前、出版后，云南都没同作者、没同杂志社打一声招呼。直到出版后两年多，1976年我才在云南元阳县的一家小书店里看到它。书有版权页，人无版权法，这在无法无天的动乱年代是不足为奇的。不是吗？我作为书的主笔，在知道这件事以后也只不过苦笑一下而已。

第三，两家出版社和那家杂志社都没给过作者一分钱稿酬。这对“文革”的过来人来说，是不消一提的。如今提出来是让年轻人了解了解历史上曾有过的怪现象。

搞社会科学的为什么会写起自然科学书呢？说来话长。1968年到1970年我都在五七干校。这时我一位老同学在市里搞经济大批判。他看我家中困难，提出要我帮他忙。上来后，一家大报发给我一张“工农兵通讯员临时采访证”。我与我的老同学采写的文章，头头们总是不满意，批评“脱离实际”，说我们“搞的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没有‘政治’的经济学，或者是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说我们“传统观点太重”。头头批多了，我们也就学会了对付这类批评的方法。我们索性就把它接过来，对头头说：“我们是长期脱离实际，今后是不是用一半时间下厂，一半时间写作？”从此，头头就见不着我们了。我们每天下厂。我俩的目标是“为跑100家厂而努力”。大约一年时间，我们在上海没有哪个行业的厂没跑过。从黄金的冶炼到镭的提制，从大规模集成电路到当时还属于绝密的电子计算机厂、宇航系统的厂，我们都跑了。没上天的卫星我们抱过，造好的导弹我们摸过。去了，只问技术革新，不问别的。头头渐渐发现我们一年来不搞政治经济学，反而是搞技术去了。他们对我们彻底不抱希望了。于是，撤下我老同学的组长，并正式通知我回干校。回干校吃苦，我不怕。怕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没条件看书了，怕的是作为父亲，没办法照顾孩子了。可是，知识分子是不会耍赖的，我立即表示愿意回干校。

哪知正当我准备回干校时，头头又征求我的意见：“愿意不愿意搞自然科学？”我愣住了。我的科技知识在不搞技术的人当中是高水平，在搞技术的人当中我就是低水平。我对技术有兴趣，但是丝毫没有专搞科学技术的思想准备。但我又想：既然搞社会科学太危险，既然我所学的社会科学知识用不上，既然我已养成了“三天不写手发痒”的习惯，既然去搞自然科学就可以不下干校，那还不如断然表示：去！

至于头头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我没去多想。到自然科学组报名的第一天晚上，组长向我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要研究4大起源的指示，并要我参加这项工作，还明确了一位先我而来的同志带一带我。我欣然接受。我早就懂得“搞自然科学是属人参的，越老越补；搞社会科学的，属萝卜，越老越苦”。“搞自然科学保险，搞社会科学危险。”如今只要我搞毛主席提出的自然科学课题，岂不是保险而又保险了。干，我坚决干。组长又说：“为了集中精力干，平常要住在报社里，就是回家那也得吃了夜餐以后回家。”这自然又多了点不便，可是，毛主席关心的课题，说什么都得干。当晚我就睡在报社里了。那位负责带我的同事早为我铺好了床。这天夜里睡得特别香。没想到凌晨，组长和那位负责带我的同事都被叫走了。我对他们工作节奏的紧张，深表钦佩。第二天才知道，那位负责带我的同事因“炮打王洪文、张春桥”而被抓起来了，我们自然科学组的组长被派去搞他以及他那一伙人的专案去了。天哪！原来是要我顶替他的啊！

我就这样从文科转向了理科。开头说是4大起源，后来就不止4个了。除了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来源、人类起源之外，又派生出细胞起源、意识起源。说到写书，大家商量搞三部曲：把天、地合成一本，叫《天体的来龙去脉》；把生命、细胞合成一本，叫《生命生生不息》；把人类、意识合成一本，叫《人类的继往开来》。

这三部曲本来决定全由我负责，后来因为在编写过程中，自然科学组里又来了一位农学家。他是我的老首长，“生”字头那本就由他负责了。

假如说我们平常用“全力以赴”一词来形容积极努力，带有夸大成分的

话，那么用“全力以赴”来形容我们集体创作这三部曲时的劲头恐怕就嫌不够味了。记得1973年大年初二，我与华东师大金教授就冒雪来到一间7平方的小屋内改稿了。全力以赴并非完全出于自觉，也是因为别处无力可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有“给出路”与“不给出路”之分。一个人能有一条出路就感恩不尽了，谁还三心二意呢？

“不安”务“理”，“久安”务“文”，在务了一阵“理”之后，又转向搞最危险的社会学研究

1975年由我主笔的《人类的继往开来》在《自然辩证法杂志》连载以后，受到当时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同志的赞赏。书出来以后，有些学者也为我们的三部曲喝彩。不喝，我还心安理得；一喝，反倒把我吓住了。别人不知道，自己心里不能没有数：我不是理科科班出身，理科只有高中水平。写这两部书，我已用尽了脑汁，可谓“邓郎”才尽。如今评价这么高，我怎么再往高里提？我因畏难产生了回到老本行的想法。但，1975年的好景不长，胡耀邦很快受到了批判。

不管怎么说，在写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我涉猎了不少原始社会的资料，也考察了不少处于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民族，对各种各样的家庭制度发生了兴趣。中国现存的古代社会比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要丰富得多。中国不出版一本胜过《古代社会》的《家庭起源》，将愧对50多个兄弟民族。我有些跃跃欲试了。

《家庭起源》是个不大不小的课题。说它大，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点；说它小，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细胞，而不是社会整体，不会引起社会的注意，安全系数大。它研究细胞“起源”而不是细胞“今天”，也不会引起社会的干预。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心从对细胞起源、人类来源的研究转向对家庭这一“细胞”起源的研究了。

在“红色恐怖”下，个人想写专著是不行的，更何况是写这样一部专著呢？我只好偷偷地搜集资料。我在毛主席授予的“人类起源”的大旗下，看完了中国已出的20多个民族的简史、简志中有关家庭的资料，看完了中国已出版的数十个国家的“概况”中有关家庭的资料，还阅读了二十四史中有关家庭的资料。说来也巧，不久“四人帮”垮台了。我被《红旗》杂志借去写批判张春桥的文章。横竖几千字，本以为很快就能脱稿，哪知一拖就是半年。在这半年里，我每天钻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前后大约看了几十本当时在上海不大能借到的有关家庭史、妇女史、妓女史一类的书籍。

1977年下半年，我的心情一方面有着10年不曾有过的喜悦，另一方面也还有点“余悸”和“预悸”。在“左”的影响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我想起“农忙务农，农闲务工”这句老话，我是不是也可以来个“环境不安则务理，环境久安则务文”呢？1977年底，我又重返科技界，被中国科学院研究室借去筹办《自然辩证法通讯》。在这以后，我不断写点科学小品，这就是1980年出版的《科学入口处》。1978年在庐山连续参加了几次会议，应《中国科学》之约，就庐山景观写本书。这就是198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庐山》。在这大半年当中，我对家庭起源的研究有所放松。

1978年8月，我听车文仪同志说，姜椿芳同志要在上海搞一个编纂大百科全书的机构。我断定这个部门符合我“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想法。最主要的是，我这时已经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的消极合流者转化为

自觉的积极的合流者。于是，我便带着“以不变应万变”、“用百科攻一科”的宏图，于1978年11月调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来大百科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的胆子大了起来。春节期间，我越了几次古代的鸿沟的遗迹，回来后便写了《越鸿沟记》，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我10多年来第一次自己出题写杂文。从奉命写作到自己命题，这一转折给我带来了极大喜悦。我大谈世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接着又在《人民日报》写了篇《美与丑》，大谈再美的人也有丑的一面。

随着胆量的增大，在封建观念笼罩千家万户，尤其是笼罩大人物之家的严峻现实面前，我想也得越一下自己只搞家庭起源，不问家庭现状的鸿沟。我提起笔，用了不到一天时间，写成了《家庭的淡化问题》。前后不到一周，《文汇报》就发表了出来。发表后，收到了百十篇来信。反对的，反对得强烈；赞扬的，赞扬得强烈；不痛不痒、模棱两可的，几乎没有。《文汇报》把两种观点的文章都择要发表了。我没有答辩。不是报社不让我答辩，是我自己觉得不答辩比答辩要好。按我的真实思想，如果答辩的话，我的论点比原作更鲜明，更尖锐。这对于渴望学术界由沉默变为活跃的我来说，是行不得的。还是让历史替我答辩吧！后来知道，当时有些大学生对我没有答辩感到失望。有人甚至担心我改变了观点。

我怎么会轻易改变观点呢？1981年到1983年，我在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讲授家庭社会学课程时，系统地讲解了家庭淡化的道理，并公开讲：“我是淡化派”。一边讲，一边写，我一口气写了数十篇有关家庭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没有标出“答辩”的答辩。1982年春，天津人民出版社决定把我所撰写的有关家庭的文章汇成专集，作为《社会学丛书》之一。我当时主张用《家庭的淡化问题》作书名，可是编辑同志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不赞成把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书名。这对我来说，是勉为其难的。但我又想，我也不应该让编辑勉为其难。我同意用《家庭问题种种》作书名。《家庭问题种种》于1983年初问世。这是我出版的第五种书。但它却是我在社会学方面的处女作，也是社会学重建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家庭学著作。随后，我于1985年出版了《生活的觉醒》，1986年出版了《婚姻史趣话》、《家庭面面观》，1987年出版了《中国家庭的演变》。

不过，我的得意之作是1986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的明天》。这部书写于1983年。当时一家出版社的两位女编辑不远千里来到我家。我说起这部稿子。她们很感兴趣。可是她们送审时，没通过，原因是观点太尖，不适合“清污”的形势。结果，他们就从书稿中选了儿篇不太尖的篇章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杂志上刊出，以示友好。198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医农同志打电话到我家里，说她马上就來我家。对医农，我是久闻其名。她是获全国一等奖的《青年生活响导》的责任编辑。这部书，我虽是编著者之一，但主编是金马。主要由金马与她联系。医农是男是女我过去并不知道。她一进门，我才知道她身材很小，但是谈了几分钟以后，我就发现她胆子很大。彼此的观点，一拍即合。因此，当她向我索稿时，我表示把《家庭的明天》补充修改后，交她阅。1986年5月交稿，没过多少日子，她就来信表示高度赞扬；又过了没几个月，清样寄来了。就在我把清样寄回贵阳不久，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始了。一位领导同志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又听说，一家刊物和北京一家报纸因为发表了类似我书中观点的文章，受到领导同志的批评。我估计，我可能撞到枪眼上了。

我估计我的《家庭的明天》出不来了。但是，我自信我没错。自反对自由化以来，“抽稿风”大盛，可我宁可挨批，也决不主动把书稿抽回来。抽不抽在我，出不出在他。一个月过去，没动静；又一个月过去了，书仍没出来，也没信来。对医农我是信得过的。对头头们我不了解。我担心医农会因我等的书而遭殃。我要公开挑战。我挥笔写了篇文章，讲到书稿可能受挫。意在为医农撑腰，也给那些“大批判专业户”一点眼色。文章刚寄出，医农的信来了，说样书出来了，说了她对形势的看法。

书出来了，这要是在往常，我会很高兴。可是，此时此刻，我有点反常了。我为自己担忧，更为医农担心。我反正早已被人盯上了，跑不了了。谁叫我在“清污”之初在一家大报上指名道姓批评人家缺乏学术民主的？人家现在要利用“反自”的机会报这“一篇之仇”，我有什么话可说。再说，我是出了名的“生气不超过三分钟”，纵使有100篇大批判文章摆在面前，我也不过是一笑置之，我也会有妻子儿女安慰。可医农呢！她是一位孑然一身的中年女子。倘若牵连到她，怎么办呢？

没有争议的著作称不上著作，可惜争议
大的著作也就出版不了了。我的代表作是
不宜出版的书稿

十多年来，我出版十余种著作，主编了几十种书。哪一种书是我的代表作呢？朋友们说法不一。可我认为，朋友们说的都不对。我的代表作尚未出版。没出版不等于没写好。我的代表作已脱稿好几年了。

上面说过，并非出于一种闪光的动机，既研究社会科学，又研究自然科学，近10年我又把百科变成了本职工作。在《中国百科年鉴》工作期间，我既当过科技组长，又当过社科组长，还一度身兼两个组长。百科的职业促使我萌生出离开家庭社会学，走向知识社会学的愿望。我在《书林》上发表了一篇《家庭学的烦恼与烦恼的家庭学》以后，就进一步把精力集中在知识社会学上了。

依照我“先各个击破，后一举全歼”的治学习习惯，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瞄准了知识社会学的一支——学术生态学。几年来，我围绕学术生态学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几乎篇篇引起争论。

1984年，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一文，随后《文汇报》以及文汇报的内刊，还有好几家刊物，相继就此展开讨论，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1985年，我与朱长超同志合写了《论错误》一文，先后在文汇报内刊以及《文汇报》上发表后，《文汇报》就此展开讨论，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似乎反对的呼声更高一些。

1985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多样化问题》。《社会科学》就此讨论了三年多，至今还在讨论。

1986年，我在《文汇报》发表了《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一文，一直到现在许多报刊还在对此观点或褒或贬。

我一直认为，没有争议的著作称不上著作。要“著”必然会有争议。套话连篇，老话充斥，是不会有争议的。思想的火花要在撞击中产生。文章有人撞击，就说明不是无病呻吟。有人听到挨批，甚至看到“商榷”就紧张，可我有有人撞击为乐，以有人批评为荣。掷地有声总比掷地无声好。掷地后的音量大小应当是衡量文章分量轻重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然，对批评要分析，

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则不从。

在我就学术生态学发表了一些文章之后，有一家出版社主动与我联系，要为我出一部小集子，作为他们的一套丛书之一。这家出版社虽然是第一次同我联系，但是我早就领教过这家出版社领导人的大无畏精神，早就知道他们的出版周期在国内是最短的。出于对他们的信任，我很快就把书稿整理得清清楚楚寄给他们。有一次出差到他们那里，责任编辑告诉我已经编好，马上发排。几天之后，地球又绕太阳转了一圈，1987年降临了。丛书中有位作者挨批了，我估计他的书不会出了；接着，丛书中有些作者的言论上了《言论摘编》了，我估计他们的书不会出了；再接下去，海内外也出现对我的传说。那么，我的书会不会出呢？不知道是因为我对这场斗争认识不足，还是因为我自己推出的代表作评价偏高，我默默地念叨：“不至于吧！”“不至于吧！”正在念叨的时候，稿子退回来了。年轻责任编辑很坦率地写道：“请理解我们的处境”。“啊”，我长长地叹了口气，马上从不太理解变得能够理解。就凭他们头头的那股子大无畏精神，在这个风头上，处境能好吗？

退稿也同时打退了我的幼稚病，打退了我的贪图清净的心理。我不想安分守己了。1986年底，有两家出版社抢着要出版我的《邓伟志信箱》。我费了一番口舌，才说服另一家让给这一家。如今我明知这一家不再会出版我的《邓伟志信箱》了，况且我还没有交稿呐！但是，我为了测试一下“运动量”，仍然写信给这家出版社，问那位一再催稿的小姑娘还要不要书稿？那知杳无音信。过了很久，她才带来口信，说：“不要了。”没见书稿就不要书稿，可见她是“以人废书”。不，不能说是“她”。怎么能把帐记在一位小姑娘头上？

争议吧，不在争议中前进，就在争议中后退。

争议吧，社会永远是充满争议的社会。没有争议岂不是太平静了？

争议吧，我的名字叫邓伟志，我的号就叫邓争议。

我为什么写作

我是从进大学的第一个月起就开始把文章变成铅字的。32年来，养成了三天不写文章手发痒的习惯。学术生态环境好，写社会科学文章；写社会科学文章发不出去，便写自然科学文章。文革中我写天、写地、写螃蟹。

天天写，是因为心没死；天天有话要说，是因为有话不说憋得慌，有文不写就像是做了亏心事。

我以写为乐，一写就乐，一发表更乐，发了以后有人褒贬更乐。自1980年以来，我惹出了六场争论，每场都收到上百篇文章，有褒有贬。贬我旧作，就等于逼我写新作。贬得甚，想得深，写得多。有不少文章是被人贬出来的，是被人商榷出来的。

1988年12月6日《新民晚报》

从黄土低坡走来

我生在黄河故道，长在黄土地上。可是家乡萧县并非黄土高坡，而是黄土低坡，海拔只有几十米。从小处说，属黄淮平原；从大处说，属华北大平原。是双料平原，却不是一马平川。家乡有绵延几十里的山脉，还有国家列为自然保护区的崇山峻岭，有壮观的瀑布，有数不尽的泉眼。这就构成了家乡山明水秀的景色。

不知是不是因为山明水秀的缘故，家乡人善画山水花鸟，家乡被誉为“书画之乡”。家乡还涌现出一批如刘开渠、李可染等十余位国内外知名的美术大师。1958年称萧县为文化县时，说我们人人会画，那自然有水份，说绘画的人很多则是事实。现在画画的条件很优越，可是，建国前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买纸、买墨。记得穷人爱在雨后的沙土地、雪后的雪地上，用树枝绘“硬笔画”。大人绘画，小孩在泥地、雪地上乱跑，绘“足画”。“足画”的生命周期并不短。下雪前在泥地里留下的足迹，在被大雪掩埋了一个冬季之后，待到春天雪化时，泥地里的足迹依然如旧。欣赏自己留在黄土地上的“足画”，也是孩提时代的一大乐趣。

生长在黄土地上的孩子总喜欢种点什么。桃树、杏树、石榴树、柏树、杨柳树，我们都种过。可是，种的多，死的也多。不管我们如何精心爱护、浇灌，树苗儿被冻死、踩死、淹死的，还是不在少数。又由于我们家乡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汉刘邦是我们邻县人，项羽的老婆虞姬也是我们邻县人。建国前，家乡是国共的拉锯区。一个小集镇，东头流通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币，西头流通共产党的淮海币、中州币。在战争中树苗被打仗打死的也不少。在战场上长大的孩子，经常面对死亡，因此对自己培育的苗儿长不成大树，抑或是长不成小树，是有思想准备的。

我17岁时告别黄河故道，来到黄浦江边。38年来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多年来，一直在机关工作，知道许多直系领导、旁系领导的上台下台，亲眼看到了许多学科带头人涨潮落潮的具体细节，也感受了人间的冷暖与酸甜。有过消极情绪，也有过积极情绪，更多的是想化消极为积极。

曾经，遇到想不通的问题，我就背毛泽东欣赏的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副对联帮我实现了心理平衡。但是，总觉过于悲观。80年代以后，我就改用以下几句做座右铭了：“即使苗儿长不成大树，也决不惋惜千百次的浇灌；即使足迹被风雪掩埋，我也珍惜自己走过的路程。”有些词典要登我的小传，我宁可压缩别的文字，也要把这两句同我出身相应的话挤上去。可是，有的保留了，有的被删去了。删去了，我也不惋惜；删去了，我依然珍之。

1994年5月8日《解放日报》

跑中写

我最近成了作协会员，可谓“半途出家”。本是搞社会学的，为什么偏要在文学界里插一脚？原因是：我想写小说。

这些年来，我耳闻目睹了许多可歌可泣可褒可贬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当真事来讲吧，行不通；不把这些真人真事讲出来吧，又憋得慌，实在是觉得对不起社会。怎么办呢？我便想把真事当假事来讲，就不会有人对号入座，跑出来耍赖了。为此，我瞄准了小说，试着做“甄士隐”、“贾雨村”。我这个人之所以碰到该很高兴的事，不很高兴，碰到该生气的事，不太生气，是因为我断定宠辱悲喜都在为我的小说提供素材。感谢他们这些义务资料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哭哭笑笑呢？把哭和笑的时间变为观察表情，记录语言的时间，岂不是更有意义！小说是形象的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抽象的小说。研究社会学的写小说，或许是社会学的延长。

当然，作家们批准我加入他们的圈子，不会是根据我未来的小说，而是根据我写过数百篇杂文。杂文是社会学同文学的中介与结合。因此，多年来我一边研究社会学，一边写杂文。

不过，有谁知道，我的杂文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跑出来的。我跑到哪里搞调查，就以那里的材料写杂文。比方说，我“文革”后写出的第一篇杂文《越鸿沟记》，是1978年春天到河南农村调查时，联想起社会上还有许多人为的鸿沟阻碍社会前进，才一挥而就的。再比方说，“文革”后的第二篇杂文《初识庐山真面目》，是1978年秋天去庐山搞社会调查，联想起实践的重要性，而提笔成文的。再比方说，去年夏天发表的《到了天尽头以后》，是与一批社会学家一起到山东荣城调查，在天尽头看到胡耀邦的题字以后，有感而发，写出来的。

跑，能跑出写的原材料。跑，能跑出写的激情。

跑，自然也是一件苦差事。

从东北到西南，从沙漠到海边，我都跑过。

先说跑东北。在东北，我上了长白山。当时，山下还是金秋季节，山上已是白雪皑皑。上山要靠拖拉机。可是在山上活动，拖拉机就不顶用了。怎么办呢？我有时是蹬着滑雪运动员的雪橇行动的，有时是站在滑雪运动员背后，手扶滑雪运动员肩膀，同运动员共蹬一双雪橇行动的。就这样，对林海雪原的社会生活、对朝鲜族兄弟的生活作了为期一周的调查。

在西南，在哀牢山上调查，随时都有被猛兽吞噬的可能。当地流传一句话：“要去拉坝，先把老婆嫁。”意思是有去无回。可是，我不仅要到拉坝，而且还要从拉坝再骑三天马才能到达目的地——苦聪族聚居处。不要以为骑马很威武，遇到穿密林，马怕刮破肚皮不肯走，我们只能徒步。一路上，披荆斩棘不用说，树上的蚂蝗还会落进脖子里。那里是亚热带雨林区。因为树上时时有水，所以，蚂蝗可以上树。我们每走半个小时，便要脱下衣服，相互看看有无蚂蝗吸血。

有次在万丈深渊边，我骑的马累倒了，人被甩了下去。我以为“献身”的时候到了，那知被深渊间的灌木挡住了，满手鲜血，爬了上来……。这次西南行，我不是记日记，而是记时记，坐下来就记，见闻新鲜，感慨万千，回来写了好几十篇。

在沙漠，我到了十年不见一滴雨的地区，那里在宋代就被称为“苦甲天

下”。百姓的衣服就是一件单一件棉。夏天穿单衣时，把棉衣挂在绳上；冬天穿棉衣时，把单衣挂在绳上。谁也没有箱子、柜子，也不需要箱子、柜子。从沙漠归来后，很想写它一批文章，可是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病倒了，住院了。在住院期间，写了三篇。

在海边，人们总以为好玩，不过那要看怎么下海。有次，我为了调查捕蟹人的生活，与捕蟹队一起，坐着廿五吨的小船，横行在东海里（捕蟹船像螃蟹一样是横行的），都晕了船，四条汉子挤在只有二平方米的船舱里，面面相觑，个个木然。好在很快就靠了岸。稍加定神，大家就神气活现地问长问短。

这些年来我就是这样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到底层去挖材料，找观点，学语言的。半个世纪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号召我们“学习社会”。我深切地体会到深入社会、调查社会是学习社会的前提。深入的过程，调查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出产品的过程。跑，是为了写。跑，就有得写。跑出来的东西，真切，真实。

1992年3月26日《文学报》

甜酸苦辣咸痒涩麻

我现年 56.17 岁，按四舍五入，可以简而言之为 56 岁。56，古罗马政治家凯撒将军被人谋杀时，年 56；二次大战的头号战犯希特勒在柏林自杀时，年 56。56 岁已接近中年（切莫误为“终年”）的尽头，应当说，对中年的滋味已不是略知一二，而是深知八九。在下不才，知识年龄低于生理年龄，那么打个折扣，也该是知道七八。

中年的第一味是甜。过去说我们这一代是甜水里泡大的，现在不大讲了。我看不讲也不对。我们从苦海里跳出后，确实在甜水里泡过。后来不甜的事多起来。不过既已步入中年，就容易混进老年群，甜吾老之甜；又便于挤近青年族，甜吾幼之甜，真乃“甜上甜”也。

第二味是酸。不是从正面打过来的，而是从后头捣的，从侧面揪的，从上头掐的。比如把你上“未经核实”的内参，打你“仅供参阅”的小报告，其结果就是：一挂，二晾，三变酸。

第三味是苦。“要问苦不苦，想想二万五”。真的，一想二万五千里长征，什么都不算苦了，何况我还有化苦为乐，苦中作乐，以苦为乐的硬功夫。可是，不管怎么说，总有苦的时候。依我体会，“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之苦，是真苦。

第四味是辣。我的少年时代是在“窝窝头就辣椒，越吃越添膘”中度过的。从小就是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步入中年后，尽管还是怕不辣，但又尽量少吃辣。运用到人生上，就是：辣来就吃辣，辣亦不嫌辣。

第五味是咸。走运时，别人认为我什么都能，我越说不能，他越说我能。要我写序，要我题词，要我登台，附加值像火箭般上升。这时我就觉得是在吃打翻盐罐子的小菜，呕心的咸。

第六味是痒。在几种感觉中，科学界对痒的研究最少。我只知道痒是挠出来的。挠，既非打，又非拉，也可以说是既有一点儿打，又有一点儿拉，其结果是痒得你坐卧不安，啼笑皆非。

第七味是涩。在政治风向变化时，我的文章发不出，可是有些报刊不知道这个行情，一个劲儿约稿，我直觉发涩。在政治风向又变时，都来约稿，我应接不暇，赶写不出来，报刊认为我摆谱。我担心：要你写你不写，待你要写时他会不要你写，深感发涩。

第八味是麻。明知他是假，明知他打假是假打，可我又无力点出其假，到头来自己变成作假，变得发麻。麻木不仁之麻，骨疏皮麻之麻。

出家人说，众生有八苦。假如不否认甜尽苦来，那上述八味也可视为八苦。不过对到了“知天命”之年的人来说，完全可以视八苦为人生八景，为人生八音。八景之美为全美，八音之谐为最谐。

1995 年第 3 期《淮海文汇月刊》

我的两种“扩张病”

有的人是有权有福，有的人是有钱有福。我是既没有权，又没有钱，而很有福。我享有的幸福总量，以及单位时间内享有的幸福量，大如东海。

福从何来？这福来自方方面面，其中之一是健康。

在风景如画的名山面前，别人不能爬，我能爬，能领略千岩万壑的风光，这不是幸福吗？

干同样的活儿，别人已累得爬不起来，可我还没当一回事儿，这不是幸福吗？

不健康的人不能开夜工，可我既能开夜工，又能连早工。每天只要比别人多工作3小时（实际不止3小时），就比每周工作40小时的人增加了50%多的工作时间。换句话说，从“工龄”角度看，就是多活了一二十年，这岂不是享受了“寿比南山”之福吗？

那么，我又是怎么会有这样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的呢？这同我“患”有两种“遗传病”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种“遗传病”是“胃扩张”。我家几代人胃口都很大。我青年时胃量大，到了中年胃口仍然大得惊人。用“惊人”二字，并非夸张。有一次，我在一位老同志家中吃油饼。他们习惯于保姆做一个，大家吃一个。可我不了解这个习惯。保姆做好了第一个，先给了我，第二个还没做好，我第一个已经吃得精光；第三个还没做好，我第二个早已吃完了；第四个还未做好，我第三个已经吃完。连吃5个之后，我发现保姆的眼睛老是盯住我，一副又惊又喜的样子。我再看看她手中和的面粉，只够做1个饼了。我方才明白保姆在为我的饭量而惊喜。向老同志一问，他也说保姆可能是这个意思。以后我再到这位老同志家中吃饭时，保姆便知道如何招待我这“胃扩张”了。

我吃饭是只讲量，不求质。猿是因吃杂食而变为人的；人也只有吃杂食而健康发展。人体需要的营养是全面而又平衡的。偏食，只爱吃所谓好的，不利于健康。所谓不求质，就是杂食。即使味道不好，只要身体需要，也得当药吃下去。现在上班吃盒饭，没法多挑拣了；过去，我总是拣便宜的菜买。便宜有便宜的用处。我坚信：价格高不等于营养好；营养好的，不等于对我好。我知道我该吃什么。

我患的第二种“遗传病”是“胸扩张”。我这个人碰到的不顺心的事，不比一般人少。可是，不论多难容的事，我总是尽量容纳进来。能化苦为乐的，就化；不能全化的，就部分化，来个“苦中作乐”。我从来不全盘否定阿Q精神。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精神当然不是指阿Q精神，可也包含一点阿Q精神。阿Q精神会使人解嘲，多一点安乐。乐，不会失眠；乐，会睡得香甜；睡得香甜，有助于吃得香甜。阿Q是被枪毙的，如果不被枪毙，他肯定长寿。俗话说，心宽体胖。这话有道理，可是不完整。准确地说，应为：心宽体健。正像照片放大了后，小处会变得模糊一样，人的心胸宽阔了，有些事情也会变得模糊。人既难得聪明，也难得糊涂。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糊涂使人平静，平静使人少病。为了大事不糊涂，就必须来点小事多糊涂。也只有小事糊涂，才能换来、才能确保大事不糊涂。糊涂人期望值不高；期望值不高，就不大会失望、失落；少失望、失落，也会使人心理、生理平衡。对有些事情，有时候就是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为了记忆，必须忘记。我为了记住当记之事，常常有意忘记当忘

之事。记忆需要反复，不反复不就忘了吗？能容难容之事，不完全是因为“胸扩张”，有时候还是因为“过后不思量”，不记住，不进胸。“胸扩张”总是有限度的，不进胸，也就是帮助了“胸扩张”。

天下没有无病之人。从另外的角度讲，“胃扩张”和“胸扩张”也是病。不过，这两种“病”帮助我换来了少生其他病。至少在写这篇文章以前是这样。至于明天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995 年第 10 期《大众医学》

我那没有读者的代表作

在填表格、上辞典、接受采访时，总有人问我的代表作是哪一本。我实在是答不上来。虽然有时我也承认《家庭的明天》为代表作，可那基本上是根据印刷次数较多这一点来说的，实际上未必能代表。

1996年底，我得了个“中国图书奖”，于是又有记者建议把这本获奖的《市场经济的若干社会功能》当代表作。道理自然是有的。连代表作都够不上还能得奖吗？再说，中国图书奖评得那样公平，不仅是没要我付申报费，而且在公布之前，我压根就不知道有评奖这回事。直到报上接二连三地登了出来，朋友们来祝贺了，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就凭这一点，我也该视这本书为代表作。

然而，当我封存1996年的日记，启用1997年的日记簿时，忽然觉得日记才是我的代表作。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只因“文革”中日记被冲走两次，便不记了。1989年底，我又记起日记来，一记就是8年，没有缺过一天。我那日记，实为时记。想什么时候记，就什么时候记，一天能记好几次。出差外地，也照记不误。不过，我出差从不带日记簿。俗语说：“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已两次被蛇咬了，便更怕“井绳”，更怕日记丢失。这大概是一种运动型精神分裂症。不带日记簿如何记日记呢？我是抓到纸片就记，回来后依次贴在日记簿上。打开我的日记簿，能看到五颜六色的纸张，有厚纸，有薄纸，甚至还有登机卡，鼓鼓囊囊。这里说的是形式。

从内容上看，我的日记虽也有流水帐，但大量的是评论：评书、评报、评人、评事、评会议、评活动。在评论中，还夹杂有不少预言、预警的东西。言了警了许多只有在日记中才能言和警的文字。这是给自己添麻烦，故意留作日后检验其准确率的。我现在还没来得及用实践检验，估计里面肯定有“预”错了的。不过，所有这些都是写给自己看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包装，连一片蔽体的树叶也没有。说得那个一点，活像毕加索中青年时代画的裸女。因此，日记较之于发表出来的文字更真实，更有新见解。因此，我要把日记当代表作，可惜是还没有读者的代表作。

1997年1月21日《新民晚报》

荡起快乐的双桨

岁月不饶人。几年前，我还在报刊上大谈自己身体如何如何好。过去看人边吃边剔牙，暗暗发笑，以自己从不捏剔棒而自豪。没想到几年以后，我那颗因咬铁渣而开裂的牙齿，已经拔掉了。我也可以归入“老掉牙”那一类的了。不过，朋友们说那是机械伤，问题不大。

是的，我的身体总的讲还算好的。有人问我：吃什么补品，保养得这么好。我说，我从来不碰补品。他们不信。真的，我是不吃补品的。

不过，我有两种“补品”却是常服的。

一是“乐”字牌营养液。我这前半生，吃尽苦头。解放前、解放初和三年自然灾害时，都挨过饿。“文革”中干过几十个工种。在上钢三厂当过炉前工，在上港五区当过装卸工，在上棉21厂当过半年的修理工，还在上海电机厂当过半年的绕线工。绕线工作比较轻松，就是耳朵吃不消。那30万、60万千瓦的大锭子一转，直觉得有嗡嗡叫的小虫子往耳朵深处钻。有时也累得爬不动，起不来。可是想想人生经历还是丰富些比较好。再说，劳其筋骨要比苦其心志好。找几则笑话一说，顿时可以轻松好多。乐，可以驱散累。乐，可以治累。乐是花钱买不到的营养液。

二是“友”字牌补脑汁。我这前半生，不知经历过多少政治运动。大运动连着小运动，小运动变成大运动，大运动中还套着若干小运动。即使不触及皮肉，单触及灵魂也够受的。对讲“义”的知识分子来讲，对那种扭曲灵魂更觉得难受。不是么？有句话，叫做“搞不完的运动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掉不完的泪。”扭曲灵魂不是一般的苦。随着扭曲的角度变化，那苦味有时酸，有时辣，有时痒，有时麻，弄得你手足无措，身心疲劳不堪。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如果郁郁苦闷，日夜烦恼，非得把自己活活闷死不可。我呢，却采用了“友”字牌补脑汁。那就是找老朋友密谈。我有那么几位好朋友，彼此无话不谈。他们不太尊敬我，可是他们给我以慰勉。他们不大表扬我，可是他们给我真诚的建议。当然，也包括给我出一些应付那些不讲理的场面的鬼点子。当此之时，我深感朋友是“强心剂”，朋友是“起搏器”。友谊既能使人心理康复，也能使人身体康健。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有了一个好朋友，能使自己多活十年，假如能有十位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岂不是能使我长命百岁！有道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就是靠一批知心好友帮我度过了那段“史无前例”的岁月。由于得益于这两种“补品”，我的身体不仅没有被搞垮，反而磨练得像条壮汉子。

光阴荏苒，我今已年近花甲，即将跨进老人行列。恭逢盛世，诸事繁忙。然而“乐”字牌营养液、“友”字牌补脑汁这两味“补品”却是须臾不可忘怀的。平时我还将其引进到我老夫老妻之间。夫妻胜于挚友，忙里偷闲，我俩操起那欢乐的双桨，荡漾在秀水静谧的碧波上……真个“不知老之将至”了。

1996年第11期《康复》

我与妇女学

1994年9月，我在《妇女学呐喊》一书的自序中写道：“在妇女学方面，我没写过专著，谈不上造诣。在理论深度上，不仅无法同罗琼、董边等老一辈妇女学理论家们相比，而且同有可比性的同龄人比起来，甚至比年轻的有成就的妇女理论家相比，也差上一大截。”

不过，我在中国妇女学的建立和建设过程中，还是有过真诚的投入的。所谓“投入”，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曰“呐喊”。中国的妇女理论是很丰富的。辛亥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鲁迅等人都写过妇女理论文章。在本世纪中，妇女问题著作浩如烟海。可是，似乎没有人使用过“妇女学”一词。在国外，也就是六七十年代才时隐时现在人们面前的。1982年11月26日，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要“加倍重视妇女学研究”。

展开来论证妇女学是在两年以后。我在1984年第9期的《妇女工作》上发表了《完善和发展妇女学问题》，讲到了妇女学在中国产生的必然性，提出了“妇女学框架”的八个组成部分，又分析了中国妇女学应有的三个特色。不料，引起了一些非议。“非议”激发我再议。1986年3月25日我在《社会报》上发表了“中国应该有妇女学”，与一些学者商榷。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正面肯定妇女学研究的文章。

二曰“撑腰”。潜心于研究妇女学的，决不是我一个。发明权或引进权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就在我呐喊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已经写出了专著。有些专著在出版前要我作序。妇女学界的约请，我来者不拒。我相继为10余种书写了10余篇序。我认为，作序就是撑腰。

三曰“联网”。妇女学不是我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我还有别的事要做。自妇女学在中国破土而出以后，我做了些壮大集体的工作。学者手中没权，只能靠以文会友。从1984年起，我们就着手编书。如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姐妹丛书”，她可能是中国第一套妇女学研究的系列丛书。作者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我作为主编，把大家联成网，来一个“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后来又相继编了几套。出版后没“炒”过，许多同行都不知道，可能影响不大，但是作用多少有点。十年了，有些作者早已成了妇女学界的骨干。

我为什么对妇女学研究如此执著呢？有人猜想我一定是个“辈老太婆”。其实，我是研究女性的男性。现在接近“老”了，当年发表第一篇妇女问题文章时，才44岁，是“大小伙子”。

先说我为什么研究妇女？这要“感谢”“文革”。“文革”中社会科学没法搞，我改行搞自然科学，研究起天体起源、人类起源来。在研究人类起源时，我暗暗地萌发研究“家庭起源”的念头。“文革”后，我又从“家庭起源”转向了“家庭社会学”。80年代初，又从家庭社会学转向妇女问题。这就是我的学术轨迹。

再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妇女”后头加个“学”字？我是1978年底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的。编百科，总要琢磨自己这一“科”。何谓“学科”？有独立对象，有独特的范畴、方法，成了体系就是“学”了。当然，这里的“独立”、“独特”都是相对的。再接触了百科、千科以后，就发现少了我这一科的“邻居”妇女学。老年学、青年学都有了，没有妇女

学怎么行？况且中国有那么丰富的妇女理论。还有，我为什么要为了“学”争辩呢？这里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提出妇女学时，在我编百科的工作中，正遇上有人否认另一门学科，说它不是学科，只是理论。正因为有人否定，所以学术界就分外谨慎地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多数人还是认为他们的学科能成立。设身处地，对比之下，我坚信我们的妇女学一定能成立，因此就坚持不懈。我们的坚持并不是孤立的。当时，许多人——包括全国妇联的同志有不少人有建立妇女学的愿望。比如《妇女工作》和《中国妇女报》在发表我的文章时都加上了几百字的按语。我只不过是一个群体的代言人罢了。

最后，我想说一下我倾心于妇女学的“阶级根源”——即我的家庭背景。我外祖父、我母亲，都有极强的男女平等思想。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父母生了姐姐、我和两个弟弟，但弟弟们从来不叫我大哥而是叫二哥，姐姐称我二弟，外甥叫我二舅。因为外祖父和母亲不允许他们按老规矩把姐姐排除在外，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兄弟仍然对姐姐很尊重，让长辈们的男女平等意识发扬光大，以至发扬在学术研究中。

1996年1月25日东京《华声新闻》

学点家庭发展史

家庭，多么迷人的字眼！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它讴歌，为它悲鸣，甚至为它发疯、殉葬，然而，有多少人真正认识家庭？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管是能正确认识家庭的，还是不懂得家庭的，每个人无不生活在家庭之中。人从呱呱坠地、牙牙学语开始，就是家庭中的一员。小时候靠父母抚养，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长大成人后，结了婚，生儿育女了，就成为一个新的家庭的主持者——家长；即使到了垂垂老矣的时候，不管是和老伴一起生活，还是靠子女赡养，仍旧离不开家庭。家庭是人们基本的生活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础。

家庭与人的关系是多么牢固与恒久！但我们可曾知道，在先古时期，人类却有过一个不知家庭为何物的混沌杂居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才从无家到有家，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家，到要确保父系一脉血统的家。正如摩尔根所说，家庭“——是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同样，随着家庭的逐渐进化，家庭的结构与作用也相应发生着变化。四世同堂，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家族的家庭，逐渐让位于一夫一妻与孩子所组成的小家庭。家庭本来所具有的生产作用、消费作用、生儿育女的作用与培养教育子女的作用，现在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农村由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所以农民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仍然发挥着作用，只是它已有别于历史上作为生产单位的小农家庭了。而在城市，则绝大多数家庭都已失去了作为生产单位的作用。同时，随着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家庭教育子女的任务一部分转由社会所承担了。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家庭的作用必然还会不断变化，老的作用可能会消失，新的作用逐渐产生。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家庭的存在，重视家庭的作用。

古人曰：“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或许有点“二元论”，没有摆正国与家的关系，但事实上，如果处理不好家庭问题，也难免会影响到对国家问题的处理。马雅可夫斯基说过，共产主义也表现在锅台上。这就是要我们用共产主义精神对待家庭问题。从马克思与亲朋的通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很重视家庭生活的。他把“孩子们的喧闹”说成是“安静”，在与孩子们的游戏与交谈中，他得到了休息，也获得了继续工作的充沛精力。他说，家庭“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鲁迅的家庭生活是很美满的。他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是泛指人民大众，但据熟悉情况的人说，这句话当时是从他的儿子身上引申开的。

家庭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家庭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并行不悖，而且是社会发展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认识家庭，一定要读点家庭史。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表后的一个世纪里，家庭史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活教材。如果说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剖析商品开始的，那么，恩格斯剖析人类发展史就是从剖析家庭开始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从家庭这个角度，揭露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和冷酷无情，

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溃疡和无可救药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引起了家庭关系的改变。家庭，根据恩格斯与拉法格的考证，其本意是奴隶，亦即在一个握有生杀大权的主人（父权）支配下，统治着一定数量的奴隶。因此这种家庭包含了在私有制社会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关系。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家庭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和睦的基础上的。今后家庭关系会出现哪些变化，又会产生哪些矛盾？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特别是随着新兴科学技术应用到了人类自身生产的领域，如出现了精子库、体外受孕与试管婴儿等，家庭关系将会引起什么新的变化，对家庭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否会使家庭结构、家庭作用、家庭关系与家庭观念发生什么变化？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家庭的来龙去脉，掌握家庭运动发展的规律。了解这些知识，将能有助于我们处理好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从旧的习惯势力束缚下解放出来。

发展辞书的立体化系列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这里说的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又何尝不是这样！什么是读书人的劳动手段？这就是工具书。“书”前加上“工具”两字，是颇为形象的。它说明有那么一些书同工具一样，是不可缺少的。

近几年来，我国的辞书品种与年俱增，极大地改变了读者“嗷嗷待哺”的局面。尤其是新版《辞海》、《辞源》的问世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开始出版，为祖国文化增色。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我们辞书的编纂出版工作还很落后，我们的工具书品种同文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距离。有一个面积不到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家，辞书的品种却为中国的十倍。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提高辞书编纂水平呢？系列化问题应是不容忽视的方面。

第一个系列是知识系列。知识的门类是很多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经、法、社……不同的读者在不同情况下对工具书的要求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工具书的门类必须齐全。工具书至少可以分四大类：综合性辞书、专门辞书、语文词典以及年鉴、手册之类的工具书。因为学科本身的划分是相对的，所以，综合性辞书与专科性辞书的划分也是相对的。医学百科全书较之大百科全书可谓专科，可是较之外科百科全书则是综合。所谓语文词典也分详解词典、翻译词典、正音词典、正字词典、方言词典、外来语词典、同义语词典、词源词典、音韵词典等多种。

第二个系列是容量系列。每一种词典都可以按规模和容量分为大、中、小。如百科，有大百科，中百科，还有小百科。再分得细一点，可分为中型偏大的百科，中型偏小的百科以及小型偏中的百科。这就是层次。每一类工具书都可以分许多层次，以适应不同文化水平读者的需要。如以学科为纵坐标，以容量等为横坐标，可以得出成千上万的点来。因此，像我们国家有几万种工具书是不算多的。目前我国的辞书不只是品种太少，缺环太多，且在仅有的品种里又有重复，这是很可惜的。特别是大型的、有一定深度的工具书，简直寥寥可数。这是由民族的文化状况决定的。但是，也要看到随着文化的繁荣，人们渴望高质量、高水平的工具书源源不断地被编纂出来。辞书工作者要从大处着眼。

第三个系列是教学、编纂、科研一条龙。编纂工作要受辞书学理论的指导，编纂工作队伍要靠学校培养的学生来充实、更新。现在，中国不仅没有辞书系，而且连辞书专业也没有。更没有什么辞书研究所。总的来说，辞书编纂队伍还不成其为队伍。这同工具书在四化建设中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工作、队伍、理论三者如能同步前进，将会加速提高工具书的水平。

如果说知识系列同容量系列构成十字形辞书事业的话，那么再加上教学、编纂、科研这一系列，就构成辞书事业的立体化系列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完全有可能对工具书的系列化作出统筹安排。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把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各种辞书列为社会科学的十二个重点之一，这对我们辞书工作者是个鼓舞。今后我们一定要通力合作，主动填补补

齐，避免重复劳动。即使是不能在近期出齐，有一个战略计划在胸同没有一个战略计划在胸是大不相同的。注意系列化问题，有助于加强辞书理论研究，提高辞书编纂水平，扩大辞书队伍，让工具书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1983年9月14日《文汇报》

不妨走“野路子”

研究中国古代的婚姻家庭，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两条路子：

第一条是正路子。那就是查史书，找史料，说话有根有据。没有史料作依据的话不说不写，因此称其为“正路”。我们的《中国家庭的演变》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就是沿这条路子写出来的。可是，熟悉史学的都知道：史书上的东西并不都是靠得住的。这只要看一看不同的史书往往说法不一样，就可以明白了。在历史研究上，也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一面。再说，史书上主要记载的是政治、经济、文化，至于婚姻家庭，那是不可能占很多篇幅的。可见，正路子有优点，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二条是野路子。野路子就是离开史书。我们这部书的编写就是走离开史书的野路子。我们离开史书，却抓住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显然不是史书。可是，文学作品无不是历史的反映。在真实性上，文学作品不是史实，却又有胜过史实的一面。尤其是在婚姻家庭这方面，文学作品描绘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是蕴藏婚姻家庭史的宝库，是分析中国古代家庭的“三棱镜”。再说，我们所要探讨的婚姻家庭史，并非家族史，不必太细。婚姻家庭的发展不是以一代、两代来计算的。一代、两代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两秒钟。在这里，模糊胜于精确，模糊比精确更精确。因此，我们在这本书里选择“野路子”来研究家庭史。我们自信这是一条“曲径通幽”的正路子。

当然，由于中国的古典文学浩如烟海，我们一时间还不能通晓。本书只是从一部分古典文学作品来透视唐以前的阴阳变化，似有以偏概全之嫌。加之，古典文学作品尽管比正史多反映了一些劳动人民的婚姻家庭状况，但是比重较大的还是帝王将相。这也为我们的研究增加了困难。这本书的问世，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结束。我们渴望得到读者的评论，并愿根据读者的评论和指点，进一步补充、修改，使之趋向完美。

1987年6月

“南风”终有一天会“北伐”

中国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蛇口率先发达，加上那里的领导开明，因此，蛇口青年能够较快、较早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道德观。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能容忍的旧观念，到蛇口就不能容忍了。敢于同大专家顶嘴，在有些地方是不可思议的。其实，这恰是青年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增强的表现。宗教靠信仰，科学靠讨论。顶嘴容易产生思想火花，讨论能够打开思路，深化思考。我相信，通过对深圳制度的讨论，会把思想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具体地说，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一、道德是有层次的。既然存在多种所有制，生活在不同所有制下的人们道德尺度就不能一样。提倡大公无私，肯定先公后私，还得承认公私兼顾。去年初，那样大动干戈批判“大公有私”是不对的，是背离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蛇口青年在辩论时说，主观上淘金，客观上建设了蛇口。这话有道理。但是，还不够。也有主观上淘金，而主观上也为建设的复杂意识。对这些，不必动肝火。就像有些专家，既盼望有金光闪闪的高级职称，又有从事科学的愿望，这都在情理之中。

二、对青年教育专家来讲，须正确评价青年，热爱青年，要注意态度和方式，不应作“对立面”看待。

三、专家本身更应当注意知识更新、观念更新。往日或今日的风流人物，都免不了要“淘汰”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四、几年前，一直批“南风”，我不赞成。我估计在观念上终有一天会来个“北伐”。这次“蛇口风波”，就是北伐的征兆。过去南下干部起了不小的作用，什么时候能让懂商品经济的南方干部北上呢？我期待着。

1988年9月15日《社会科学报》

评 书

院士的风采 ——读《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

不读传记，便不懂得人生。

人，作为社会的人，不读上百本传记，便不懂得社会。

传记，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我都爱读，不过，我最爱读的是自传。直接同间接，毕竟有区别。

传记，按传主的界别分，有三百六十行，每一行状元的传记，我都爱读，其中，我犹爱读科学家传记。这类传记较少粉饰，较少回避。

最近，我怀着极大兴趣读了长达 170 万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一书（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院士们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辉煌的成就，令我钦佩，令我惊叹！

院士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是科学家的最杰出代表。《院士自述》是院士们吐露的心声。五百余名院士的自述集于一卷，自然不会成为院士们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可是，由院士们自选的精彩片断，如百花争妍，如繁星闪耀，无不赏心悦目。

《院士自述》不是百科全书，也是百科全书。自述独立成章，各具风采，无疑地不是按百科体例撰稿，里面没有什么定义项。可是，摆在我案头的这部自述，讲了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现状，又很像百科体例。有的自述还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增加了百科全书式的权威性。比如赵忠尧 1930 年在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方面的发现，长期以来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在这本《院士自述》中，尊重历史，予以澄清，深得同行赞许。从编排体例上说，《院士自述》分学科编写，按笔画排序，设有附录，并有两种索引，为检索带来方便。这，又充分显示出《院士自述》的鲜明的百科体例和辞书特点。

《院士自述》不是精神文明读本，也是精神文明读本。这部书是科学书，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艺术；在这部书中也同时饱和着精神文明。许多自述充分肯定师长的启迪，高度评价同行的贡献，洋溢着崇高的职业道德。许多自述讲了自己热爱祖国的心情，奔向祖国的艰难历程。他们喊出了“祖国再穷也是自己的”、“为中华民族争气”的最强音。有些自述讲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恰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科学是文明的基石，科学院院士是精神文明的化身，科学院院士自述是精神文明的优秀读物。

《院士自述》大量的的是对 20 世纪的回顾，同时也有对 21 世纪的展望。有物理学展望，有化学展望，有基础理论展望，有工程技术展望。有对新产业革命的展望，甚至也有对社会革命的展望。在展望中，还包括着对学术界的殷切期望，对后辈学者的谆谆嘱托。人们将带着《院士自述》告别 20 世纪，沿着《院士自述》的成才之路迎接 21 世纪。

科学院的院士们在撰写自述中的态度也是科学的。他们求真、求新、求深，严肃、严格、严密。特别是在求真这一点上，难能可贵。在阅读《院士自述》的过程中，我着力阅读了我曾直接接触过的那几十位院士的自述，深知他们对自己学术成就的叙述是准确的，一是一，二是二，毫无夸大之处。

《院士自述》是院士们亲笔撰写的，也是编者“抢”出来的。有的自述是院士在病榻上完稿的，有的是从谢世了的院士的业务自传中节选出来的。抢救出来的文稿更珍贵，更增添了这部煌煌巨著的文献价值。

1997年3月1日《光明日报》

喜读中国第一本《世界之“最”》

看完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出版的《世界之“最”》第一分册，像是打开了世界之窗，视野为之一阔。人有两只眼，花草树木，鸟兽鱼虫，谁没见过。可是，见过最大的花，最小的鸟的人，怕是寥寥无几。至于知道“最早的人”、“最圆的湖”的，也不会很多。前不久，我曾访问过摆脱原始社会没几年的苦聪族。他们谈到毒箭的制造，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可我从未见过真正的毒箭。苦聪兄弟说，毒箭是箭头沾上了一种树的白汁而成。什么树呢？回上海后，请教过几位生物学家，终因不是专门研究毒树的，讲不清楚。在《辞海》上查阅，又因不知树名，没查到。这次读了《世界之“最”》，一目了然，顿开茅塞。

正因为《世界之“最”》系统叙述了最有趣的事和物，所以，不少国家出版过《世界之最》。上海出的这一本，同国外比，迟了点，然而，这是中国的第一本，且有自己的特色。

特色之一是系统。有些《世界之最》只说其然，不说其所以然。上海这本则不同，它有头有尾，有据有理。比方说，《最壮观的海潮》，不仅讲了哪里的海潮最壮观，而且还讲了为什么会壮观；《最大的“冰库”》，既讲了哪里的“冰库”最大，还讲了成因，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特色之二是新鲜。这一点本来是各国都注意的，可是，他们的作者队伍，就一本书来讲是不大的，便难以做到全新。加之，他们出得早，材料自然老化。上海这一本，除占了天时的便宜，后来居上外，还可以看出编者、作者在求新上是花了功夫的。一九八二年二月出版的书，不仅大量采用了一九七九年的材料，而且还运用了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的国外报道。这般惊人的速度，是一般书籍所不及的。

特色之三是准确。把各种版本的《世界之最》放在一块比较，就可以看出上海这本尽管运用了不少版本的资料，尽管里头难免有差错，然而它认真纠正了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要做到准确，主要取决于编写者的知识水平，同时也取决于编写者思想解放的程度。过去有一阵子，明知道某些国家在某些方面名列前茅，但因跟人家政治观点不同，便不予收入。从上海这一本中可以看出编写者注意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上海这一本之所以比较准确，还因为编写者懂得凡“最”都是相对的，是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不用说“最大的”不一定会永远最大，就是有些“最早的”是不是最早，也有待发掘。有些《世界之最》取一家之言，看起来“最”了，实际上似最非最。上海这一本在应该取几家之言的地方，就取了几个“最”。这看起来自相矛盾，实则是多了点辩证法。

1980年3月19日《文汇报》

黑猩猩王国的奥秘被揭开了 ——介绍古多尔的《黑猩猩在召唤》

在非洲坦噶尼喀湖畔莽莽的原始丛林中，生活着成群的黑猩猩。它们是人类的近亲，也是地球上最有智慧的动物之一。黑猩猩被发现已有 300 年，但是它们野生状态下的行为习性却一直还是个谜。

1960 年，英国一个 20 来岁的姑娘珍妮·古多尔只身进入非洲丛林，考察黑猩猩的种种行为习性。《黑猩猩在召唤》就是她在长达 11 年的野外生活中探索黑猩猩王国奥秘的真实记录。这本书已由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这一用文学体裁写成的科学读物，以生动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热带森林中的一幅幅动人画面，并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地叙述了黑猩猩的生活：暴雨来临时的“雨舞”，发现香蕉时的喧闹，钓白蚁时聚精会神的神情，小黑猩猩诞生时的欢乐，惊险的狩猎和分配猎物的动人场面等等，都写得亲切逼真，妙趣横生，读来使人如身临其境。作者细腻的笔调中流露着她对大自然的热爱。

《黑猩猩在召唤》给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作者为探索自然奥秘的献身精神。热带森林是美丽的，但也充满着种种困难和危险。炎热气候的困扰、蚊虫的叮咬足以令人难受，而凶猛的豹，狂怒的水牛，好斗的狒狒，呼呼吐舌的眼镜蛇，更给她带来威胁。黑猩猩也很凶猛，开头见了她，就毛发倒竖，狂怒地摇着树枝，有时一阵泥土石头瀑布似地落在她身上。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古多尔毫不退缩。她每天早上五点半闹钟一响，吃上块面包就出发观察黑猩猩去了，天黑了才回到营地，吃过晚饭后又整理笔记，直至深夜。可怕的疟疾把她折磨得瘦弱不堪，病没有好，她又继续工作了。就在热带森林中，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新婚第三天，她就又开始进行研究；怀孕时，她坚持与黑猩猩打交道；生了孩子后，她继续留在林中观察。她的青春是在热带森林中与黑猩猩一起度过的。这种献身科学的崇高精神，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深深为之感动。

这本科普读物是古多尔长期在森林中考察研究黑猩猩的结晶。揭开黑猩猩社会的种种奥秘，这对研究动物行为、高等灵长类动物的心理特征和人类的起源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古多尔对黑猩猩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加深了对人类本身的了解，对人类语言、意识、社会性等人类特征的产生有了新的认识。

1980 年 7 月 11 日《解放日报》

《科学馆》里有科学

《科学馆》副刊是我爱读的专版之一。这不只是因为主其事者是我的同窗，阅读友人编写的东西，有助于满足和寄托对友人的思念；更主要的是这个版面办得有声有色。

十年来，《科学馆》从三个方面给了我深刻印象，也就是说给我上了三门课。

一门是科学知识课。科学技术门类繁多，学问大的人也只能像牛顿一样，是在科学的海滩上拣了几块石头。牛顿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呢？岂不是更应该多学些科学知识吗？《科学馆》着重介绍生活中的科学知识、科学珍闻，这等于是给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插了翅膀。

第二门是科学方法课。“过目不忘”的人至多是能成为“活字典”。可是，掌握了科学方法的人则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方法的高低是衡量聪明程度的真正标尺。《科学馆》不断介绍各种创造发明的思维方法，给人们脱愚学聪以很大启迪。

第三门是科学精神课。攀登科学高峰是要有点精神的，科学精神是探索科学的动力。《科学馆》经常用科学家的故事及其格言，来鼓动人们的科学精神。虽然是点点滴滴，但是五百多期了，已经汇成了一条小河，通向科学海洋的小河。

《科学馆》是百花齐放的科学园地，是破除迷信、破除伪科学的“铁头”。伪科学已经同黑社会结合在一起，大有帮派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希望《科学馆》继续科学地办下去，对推动各项事业的科学化作出更大贡献。

1995年12月7日《新民晚报》

第一流的图文 ——推荐《人类的黎明》

打开“图解科学普及全书”的首卷——《人类的黎明》，久久不肯释手。这不只是因为书中的许多图和文，促使我回想起攀柳城巨猿洞、翻录丰石灰坝以及冒雨游黔西观音洞的情景，也不只是因为书中的图和文，勾起我在图们江畔朝鲜族家中饮酒、在哀牢山上苦聪人家中吃木薯的回忆，更主要的是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一本具有相当国际水准的好书——中国第一流的图文并茂的精美图册。

这部书至少有三个“第一流”：

一、编著者是第一流的。“图解科学普及全书”的编辑委员会主任于光远前不久还是中国“三科”的负责人之一，即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在学术上造诣深、门类多、跨度大，由他来任这套书的编委会主任，应该说是非他莫属了。

还有这一卷的主编贾兰坡，他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本书的副主编甄朔南不仅在人类学界，而且在国内科普界也有盛名；此外，一批有才华的学者也参加了编写工作。

二、“解”是第一流的。“图解”中的“解”，不是论著，况且读者对象是中学以上的人，当然不可能讲得太深。可是，尽管如此，这本书在论及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上，发挥了新观点、新材料。比如对火的分析，外国学者虽也提到，但一笔带过。中国学者是很注意从生产力来分析历史的，把工具看作人类社会的指示器。因此，本书在讲到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已在用火时，就把火这一能源的发现提到应有高度，指出用火的元谋人“可能具有从纤细型南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

三、“图”也是第一流的。《人类的黎明》收入了四百四十幅图片，无论是照片，还是绘图，都很精致；照片中有首次发表的。不仅第一次见到这些图片的人，会为它们的逼真、形象所吸引，就是像我这样以前见过其中部分图片的人，也会为它们的精致所倾倒。禄丰拉玛猿的下颌，我看到时，还是黑黝黝的一块，是不是拉玛猿还不能断定，后来肯定了，但我至今没见过。这次一见照片，真是一目了然。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齿弓已呈“U”形；臼齿是双尖形的。在近乎人这一点上，非已知的猿类所能相比。过去人们常说：“画是无声的诗。”现在摆在面前的照片胜过冗长的文字。

我们不能要求几万、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类为我们留下栩栩如生的照片。因此，在这一点上求知的人从不敢苛求。不料，在本书的“远古时代的折光”一章中，却收集了倥人、苦聪人、鄂伦春人、怒族、傣族、独龙族向自然界作斗争的生动画面。书的编者用图片让今人与前人相印证，从而更能看清人类的黎明。

读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和上海科技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人类的黎明》，了解了人类的“来龙”，就会更加看清人类的“去脉”；从书中了解了人类的“继往”，就会更增加“开来”的信心。

1980年5月8日《澳门日报》

用辩证法指导科普创作和宣传

科普刊物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宣传辩证法的一条重要途径。如果一种科普刊物、一篇科普文章不仅宣传了科学，而且宣传了辩证法，这不仅会使科学内容蕴含深刻的哲理，也使辩证法成为活生生的东西，这样的科普刊物或科普作品的教育意义就更大、更富有吸引人的魅力。

那么，怎么在科普刊物中宣传好辩证法呢？

一、要正确处理真与假的关系。科学史上曾有过许多将真当假、以假当真的事件。真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时是不易区分的。设计永动机、研究不存在的N射线一度被当作科学，在科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把布鲁诺、拉马克的科学思想当作荒谬的东西加以批判，则也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因此，科普宣传中特别要注意区分事物的真假，区分可能和现实，区分现在与未来，不要把未来可能实现的事物当作已经成功的事物，更不要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学与技术的关系看，科学一般是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是比较“虚”的；技术则是运用已有的科学知识来改造事物，是比较“实”的。从科学发现中的想象、实验的关系看，抽象可驰骋万里，而实验则必须脚踏实地。好的科普刊物应该虚实结合，既有丰富的想象、开阔的视野，又有比较具体的知识，给读者的帮助也一定大些。

三、要把握好“长”与“短”的关系。自然界的万物都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长短利弊决不能绝对化。人参是药中之王，但用药不当，也能使人生病。老虎、狼会伤人，但对保持生态平衡有一定作用。有些地方虎狼绝迹后，野猪成群，危害很大，不得已又放狼入林，放虎归山。绿色植物一般说对保持水土有利，但美国的葛根、欧洲的风信子、澳大利亚的仙人掌却成了“绿祸”。可见，一切都依时间地点为转移，必须辩证分析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必须辩证地分析事物的长处和短处。过去我们在科普宣传中常常容易犯绝对化的毛病。如有的文章所指出的什么“消灭麻雀”、“有草必除”等，都是绝对化地看问题。现在讲到爱鸟，大多数鸟确是人类的朋友，但是也有害鸟。因此不能凡鸟皆爱。总之，要注意分析，不要一刀切。

四、要正确处理浅与深的关系。科普刊物若充满科学公式、科学术语，势必令人望而生畏；如果不讲科学，那么读者就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不能触类旁通。因此，科普刊物必须处理好深与浅的关系，做到深入浅出。作者首先得对要写的内容融会贯通，然后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有些作者自己还是一知半解，利用一些资料拼凑成文，结果必然使得读者似懂非懂，莫测高深。要做到深入浅出，还必须用形象生动的例子来说明比较深奥的科学道理。此外，运用恰当的比喻，注意文采，都能使科学理论通俗化，容易被读者接受。

科普学是一门科学。只要我们不断研究科普创作和科普宣传中的辩证法，不断用辩证法指导科普创作与科普宣传，就一定能把科普工作搞得更好。

1982年第4期上海《科学生活》

要唯物地研究人体科学

十一月初，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上，于光远同志作会议总结的时候说，他和常务理事会的同志们商量，大家都赞成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有关单位合作，在明年召开一个关于人体科学的讨论会，推动一下这方面的研究。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我认为研究会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及时的。

我们都知道，人类是自然界发展的最高产物。人体，尤其是现代人的身体，是自然界一切物质中最复杂的物质。对人体的研究比对世界上任何物质的研究都更为重要，更为困难。因此，人体科学每前进一步，都将是对人类的莫大贡献。为什么当脑生理专家艾格尔斯研究大脑功能有了成果后，要授给他诺贝尔奖金，还不是因为他的这一成就是难能可贵的吗？为什么当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张香桐发现针刺下丘脑会起镇痛作用后，人们给了他那么大的荣誉，还不是因为这一成就也是难能可贵的吗？

尽管对人体的研究存在特殊的困难，比如不允许把活人当作实验对象，等等，但是经过科学工作者、医务工作者长期的努力，不论在人体解剖学方面，还是在人体生理学、心理学方面，都已有了相当高的实验基础和理论基础。我们要尊重人体科学已经获得的成就。在六十年代，当国外有个叫金凤汗的人声称在人身上发现了“凤汗小体”、“凤汗管”的时候，我国生理学家大都表示怀疑，不相信这是事实。不久，这个国家的科学界也否定了这个“发现”。这说明，不经过艰苦、严格的工作，就想推翻人体科学的已有成就，兴起一个什么人体科学革命，那是办不到的。在七十年代，在到处都有人吹嘘说针灸治好了多少多少聋哑人时，我国研究人体科学的学者就根据已有的人体科学基本知识，认为里面一定有夸大和欺骗。后来也证明的确是那样。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关于人体还有许多科学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特别是脑，它实在太复杂了。尽管科学家们对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科学院设有专门的脑生理研究所），但还有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解决。我国有人认为，如果说二十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那么很可能二十一世纪就是生物学和人体科学的世纪。会思维的人类对自己的思维器官——大脑的研究是今后科学发展的生长点。这方面的研究意义重大，难度也很大。

研究人体科学一定要有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参加，也一定要有广大医学家参加。这些人是专门和人体打交道的，对人体有最深切的认识。人体科学的研究应该以人体科学家为主体，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在人体科学愈来愈引起人们注意的时候，有那么一些人把天眼通、传心术之类的心灵现象，称之为“人体特异功能”；再一转眼，他们竟以“人体科学”研究的专家自居，打出人体科学的旗号，用来组织队伍。这是在对人体科学开玩笑。君不见有些人在研究“第七感官”吗？君不见有些人在鼓吹“意念手”、“意念眼”一类的“意念器官”吗？君不见在一个人体科学讨论会上有好多人大讲鬼魂的客观性吗？把这些东西都叫做人体科学，那就不会有什么人体科学了。把这些玩意儿叫做灵学，倒是货真价实的。他们引超心理学为同道。说超心理学对他们来说是对路的，因为超心理学就是从心理学中超出去了，和心理学不再相干。如果他们一定要用人体科学这个名称，

我看不如把他们那一套称之为“超人体科学”要好一点。超人体科学者是从“人体科学”中超出去的东西，就不再是什么“人体科学”了。

我觉得真正人体科学讨论会的召开，将有利于排除干扰，洗刷唯心主义和种种迷信，让人体科学沿着唯物主义轨道前进。

1981年12月19日《文汇报》

科幻小说应当宣传科学

从《文汇报》上读到：国外正就冰冻尸体以待他日复活的理论展开讨论。我马上联想起五十年代读过的一篇科学幻想小说《失踪的哥哥》。里面讲的就是把一个人冷冻起来，在需要他复活时，再去解冻。国外的这场讨论大概同中国的这篇科幻小说没有直接联系，可是三十多年前的幻想居然变成科学上的现实问题，则是发人深省的。

它促使人们思考：科学幻想小说的主要使命是什么？科幻小说既是小说，当然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但这能是主要的吗？不能。如果是主要的，那它同其他小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幻想是科幻小说的主要使命吗？也不是。如果是主要的，那它就无法区别于其他幻想小说了。科幻小说作为科学文艺的一种体裁，它的主要特征和功能应当是宣传科学。科学是科幻小说的安身立命之本。离开了科学，科幻小说就要枯萎。

科幻小说要具有科学特色固然是理所当然的，可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科幻小说是科学与文艺的远缘杂交。对一个人来讲，既要是作家，又要是科学家，并非轻而易举。这两年，随着科学的普及，人们对科幻小说的科学要求也越来越高。仅从科幻小说中学得一点浅显的科学知识，读者就觉得不太过瘾。这一点，科幻作家似乎也意识到了。他们在科学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是，毋庸讳言，也有些科幻作家写了些不科学的东西；有些科幻作家在读者要求面前，不是在科学上扎扎实实下功夫，而想转向，向文学家队伍里靠，有的则在“科”的招牌下，致力于惊险小说、言情小说、鬼怪小说，那未免太不争气了。科幻作家放弃科学是没出息的表现，是学术上的“自杀”。

不过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有些人对科幻小说有点苛求，以至以瑕掩瑜。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对科幻小说存在的问题要作分析。对那些宣传反科学、伪科学，如讲鬼神，吹灵学等，那是应该加以严肃批评的，有的还应该禁止；而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不科学或者缺乏科学的毛病，则应当在批评的同时，给予热情帮助，希望他们提高科学水平。对科幻小说要求过急过高，把科幻作家吓跑了，结果就会事与愿违。如果说科幻作家改行是“自杀”的话，那么对科幻斥之过严，就无异于是“骂杀”了。这几年《科学画报》、《科学文艺》等书刊在科幻小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渴望有更多的科幻“园丁”涌现，渴望更多更好更科学的科幻小说问世。

1982年7月11日《文汇报》

河北有个胡开明 ——读《真理与命运》

河北有个胡开明。我是在“文革”当中知道的。那年头，有很多书不能看，只能读“毛选”。繁体字本，简体字本，竖排本，横排本，改动几个字的版本，又不再改动那几个字的版本，分卷本、合订本，还有各种各样的选读本、语录本，我统统读过不知多少遍。1968年，忽然出现了许多大同小异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里面有“文革”前听说过没读过的，还有从未听说过的。虽然不是正式出版物，也知道里头有靠不住的，但是毕竟有新鲜感，便托人买了好几种版本。其中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讲话这一篇内，读到“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胡’开明”。由于这段话讲得风趣，因此也就特别容易记住。“文革”后，我同胡开明的女儿成了同事，又听说胡开明在我家乡安徽省当中共省委常委，便打听到胡开明的许多趣闻。诸如他是《青春之歌》一个角色的原型，等等。

可是，真正让我对他有系统认识的，是读了刚刚出版的《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一书。尤其是对“‘胡’开明”一说的由来有了具体了解。1962年8月8日，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身为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的胡开明，经过反复调查，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推行“三包到组”。他的建议经省委转到毛泽东同志手里。于是就引出毛泽东的上面那段话。

毛泽东的那段话说起来轻松，可是随着而来的是对胡开明逐步升级的批斗。1962年说胡开明的建议“基本上属于认识问题”，以后“不再提了”。可是不久就把胡的建议说成“反对三面红旗”。建议还是那个建议，在“四清”就成了“反党集团”，“阴谋反党集团”；建议还是那个建议，到了“文革”，就成了“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反革命政变’”，“三反分子”，“敌我矛盾”。就是那么一个“包产到组”的建议，胡开明受了十多年的折磨。

事情怪得很，毛泽东批胡的那段话，当时胡没听到，至今在中央档案馆里也没查到。人们都是根据毛泽东的那段话给胡开明“定”的“性”，可是，至今不见“根据”的影子。这叫人如何交代呢？长达十余年的批斗，岂不是显得太不严肃了？

当然，说不见“影子”也不全面。影子还是有的。影子就是红卫兵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什么叫“捕风捉影”？现在又多了一例。岂止是“捕风捉影”，简直是“看”风捉影。为了看风向，就要去“捉影”。讲话没有进档案馆，即使真的讲过这话，那也说明这一讲话不是正式指示，更不是组织意见了。把非正式讲话看得那么重，把非组织意见当作组织意见去处理，老实说，这本身就是非组织行为，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几十年来，我们吃亏就是吃在拿着鸡毛当令箭，不知害了多少好人。

退一万步讲，毛泽东批评胡开明的这段话，就算是正式下达的指示，那又怎么样呢？这里也有个是非要分嘛！盲目执行上级指示是对上级的怠工，这可是有根有据的毛泽东的教导啊！怎么在批斗胡开明时就忘了呢！依我看，盲从是对上级的耻辱搞“扩散”。貌似对上级忠诚，实则是拿上级的错误示众。近年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更加证明了这一点。胡耀邦称“文革”前提出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曾希圣、胡开明为“先知先觉者”。我们在

毛泽东批评“‘胡’开明”之后，虽然不便称胡开明为先知，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往敌人那边推！至多就按毛的调子取笑他“胡”开明就是了。何必层层加码，逐年升级呢。

人啊，还是开明点好……

1995年10月14日《文汇报》

毛泽东当面夸奖周瘦鹃 ——《姑苏书简》序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触发一个人成名的业迹，未必是他人生的精华、未必是他人生的闪光点，而他鲜为人知的成就，却可能最有资格代表他的声望、并成为他人生的辉煌。

对周瘦鹃这个名字，我是在中学时代从语文老师嘴里知道的。也许是先人为主的缘故，多年来我一直把“周瘦鹃”三个字同鸳鸯蝴蝶派联系在一起。其实呢，我既未看过周瘦鹃书中的鸳鸯，也未欣赏过周瘦鹃笔下飞舞的蝴蝶。

过了很久，我才懂得周瘦鹃不仅不是鸳鸯蝴蝶派的首脑，而且也不是彻头彻尾的鸳鸯蝴蝶派。在鸳鸯蝴蝶派名声大振时，年仅廿一的“言情大家”周瘦鹃出版了呼吁抗日救亡的《亡国奴日记》，销行了几十万册。接着周瘦鹃又写了一部《卖国奴日记》，痛骂曹、章、陆三个私通日本的卖国贼。

我本来以为这两部爱国《日记》应当是周瘦鹃的代表作了，并且坚信不疑。可是，当我反复拜读了周瘦鹃的《姑苏书简》以后，我的看法又变了。我认为，《姑苏书简》才真正是周瘦鹃的创作高峰。

《姑苏书简》是周瘦鹃先生晚年从苏州发给他远在香港的第六个女儿周瑛的信件。从1962年到1965年，在香港《大公报》连续刊登了74次，共59封信。

既是信件，而且又是父亲写给女儿的信件，不用说，都是谈家常的。在这一点上，周瘦鹃也不例外。可是，人们也应该知道，谈家常也是有水平高下之分的。我作为《姑苏书简》的读者，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周瘦鹃所谈的家常非同一般。他在《姑苏书简》中谈花，谈梅花，谈菊花；他在《姑苏书简》中谈树，谈松树，谈柳树。可是，细细读来，就可以知道他是透过花草树木，谈国家，谈政治。他说的是“诗情画意盆上来”，实际上说的是“诗情画意”笔下来。在周瘦鹃笔下，祖国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他的每一封信都是一曲颂歌，他把颂歌唱到了海外。他呼唤的是他的女儿，可是，听到颂歌的是广大海外同胞。当时，不知有多少海外同胞就是从周瘦鹃的书简中了解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不知有多少海外同胞是在读了周瘦鹃的《书简》以后，大踏步地回国观光，回国定居的。

《姑苏书简》是信，也是散文，是文笔流畅的散文，是读来轻松神怡、令人神往的散文。正因为周先生的妙笔能生花，所以他的赤子心，爱国心，更能激动人、感染人。周瘦鹃的《姑苏书简》堪称书信体散文的楷模。难怪毛泽东当面夸奖周先生的散文写得好。

我相信，《姑苏书简》的集成出版，将是献给中国散文界的一束鲜花，也为海峡两岸修筑了一座便桥。

1994年10月17日于无锡洛社

“谜样的人物”——曹聚仁

曹聚仁先生在文坛上活跃了半个世纪，留下了五十余部著作，如果再加上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估计不下于两千万字。但他一生道路坎坷，命运多舛。尽管他一再声称不想卷进是非漩涡，可是他惹下了许多是非。在他身上有是有非，时是时非；在他身上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东西很多。他的思想是庞杂的。就连他的朋友也认为他扑朔迷离，难以捉摸，是一个“谜样的人物”。也许现在还没有到揭秘的时候，然而迟早会有人去揭的。这里不妨根据书本资料先猜一番。

曹聚仁与鲁迅

曹聚仁跟鲁迅结识很早。1927年，鲁迅的著名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就是青年教授曹聚仁作的记录，后来收在《集外集》。1932年曹聚仁主编《涛声》周刊，鲁迅曾用“罗忧”、“旅隼”等笔名主动为《涛声》写稿，给曹聚仁莫大鼓舞。鲁迅看到“《涛声》上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鲁迅全集》第5卷155页），便写了《祝涛声》，说：“我是爱看《涛声》的。”当用“乌鸦为记”，以讽刺国民党的所谓“太平盛世”的《涛声》被查禁停刊时，鲁迅又写了“补记”。1933年，曹聚仁为纪念李大钊出版《守常全集》事，请鲁迅写序，鲁迅欣然写了《守常全集题记》。“题记”末尾提到的“T先生”就是曹先生。1934年，曹聚仁和陈望道、叶圣陶等在《申报》的《自由谈》上提倡“大众语”。鲁迅应曹的请求，在《自由谈》上发表《门外文谈》，极力支持曹聚仁等的主张。1935年，曹聚仁等创办《芒种》半月刊，配合鲁迅，跟林语堂的错误观点展开论战，鲁迅表示赞赏。有时，曹聚仁的文章出来，鲁迅觉得意犹未尽，就续下篇，加以深化。鲁迅先后给曹聚仁写过数十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曹聚仁有许多文章为鲁迅大段引用，整篇收入。

六十年代，曹聚仁怀着对鲁迅的崇高敬意，撰写了《鲁迅评传》，不仅材料充实新颖，而且把鲁迅的形象塑造得也很高大。他认为“鲁迅之所以伟大，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了”。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鲁迅，他认为，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停滞”、“躲避”。他明确指出：鲁迅“是面对现实，睁着眼睛在看的”。对鲁迅1927年前后的思想转变，在鲁迅研究家中长期说法不一，只是在近年新发现了一些鲁迅的佚文以后，才对鲁迅有更高的评价。然而，曹聚仁在海外，在六十年代就已经提了出来。

曹聚仁在高度颂扬鲁迅的同时，也反对把鲁迅神化，他说：“鲁迅是智者，决不是圣人。”不论是在曹聚仁所著的《鲁迅评传》、《鲁迅年谱》中，还是在曹聚仁的其他谈到鲁迅的著作中，都坚持不把鲁迅“写成为一个‘神’”。有些人为了突出鲁迅“横眉冷对”的一面，总爱把鲁迅画得很严肃。曹先生有反感。他说：所谓大人物者，别人大笑，他们微笑，别人微笑，他们不笑。“而鲁迅呢？和我们谈天，一样的发笑，他会哈哈大笑的。”不仅如此，曹先生甚至写道，从外貌上看，鲁迅很像“烟鬼”。曹先生竟举出有人贸然向鲁迅买“特货”（鸦片）的例子来。这在其他人的书中，是看不见的，似乎有损于伟大形象。试问：伟人一定有伟像吗？未必。再说，不把鲁迅神化，这是曹聚仁当面对鲁迅讲过的，也是鲁迅所赞成的。1933年的一

个夜晚，鲁迅见曹聚仁书架上有许多有关鲁迅的史料，就问：“你是不是准备材料替我写传记？”曹答：“……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好。”由于曹先生反对神化，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往往不把鲁迅的反对派写得那样青面獠牙，十恶不赦，往往不把鲁迅写得洞察一切，而是有个认识过程，有个反复过程。这在其他人的书中，也是罕见的。曹聚仁批评我们闹了许多对“鲁迅的神化和庸俗化的笑话”，并非没有道理。

当然，曹聚仁对鲁迅的评价也有不少错误。比方说，他认为鲁迅“复仇观念最强烈”，认为鲁迅有时“徘徊于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等等。这都是不当的。这说明他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不能脱离曹先生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来分析他的过失。他孑然一身，漂零在外，加之，当时“香港一些论客，深以我是鲁迅的朋友为恨”；更何况，在港澳出书，还要迎合海外广大读者的胃口。“阳春白雪，和者必寡”，倘若尽唱高调，那是没人听的。种种原因，酿成了他在鲁迅研究中的过失。

曹聚仁与祖国

全国解放前夕，曹聚仁指斥蒋介石有“暴戾之气”，爱“玩弄权力”；“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不久，国民党灭亡了。曹先生怎样呢？他写道：“对蒋政权的绝望与对中共的疑虑，带着好奇的心理，我们的心境，颇似新婚前夜的新娘，复杂而混沌。”后来，“新娘”嫁给新中国没有？没有。他跑到香港去了。在那种时候去香港，是会引起误解的。可是他一到香港，就公开发表文章，赫然声称《从光明中来》。他赞扬解放军进城“纪律严明，真正的秋毫无犯”。他赞扬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他甚至也不认为改造思想就那么“恐怖”。那末，他干么要走？这正如他所说的：“上海虽是解放了，上海人的意识形态，并不曾解放掉。”他一直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当时，有些人根据曹聚仁曾在赣南替蒋经国办过报这一点在报上攻击他。他受不了这个气，他也不想卷进政治漩涡。他认为，“在‘斗争’的圈子，是非、好坏、黑白，就是那么一回事；好的未必好，坏的未必坏。昨天捧之上大，今天摔之入地，黑白每每是倒置了的。所以，许多大道理、大问题，说了也等于不说。”——一根虚无主义的绳子，把他牵到了香港。他常把自己比作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小说中那个过流浪生活的“灯塔看守人”。他幻想离群独处，踽踽独行，他矢志不涉世务，与世无争。

可是，事与愿违。他的《从光明中来》一问世，世上的人就跟他争起来了。有人质问他：“你把大陆说得那么好，你为什么离开大陆？”有的人就干脆指责他为“统战分子”。还有人挑拨他与共产党的关系，造谣说共产党骂他为“乌鸦”。他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约记者，但是当时的新加坡当局称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不许他进入新加坡。严酷的斗争就像那袭击“灯塔看守人”的恶浪，猛烈地扑打在曹先生身上。一年又一年……

1956年曹聚仁回国观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强烈地感染着他，吸引着。他或许是香港记者中最早访问新中国的一个。他回港后，写了一篇又一篇报告文学。1957年，他又回国了。1958年、1959年，他每年回国多次。他在香港出版了《北行小语》，接着就出版《北行二语》，接着又出版《北行三语》。他写道：“过去十年中，大陆中国的社会政治，实在进步得太快了；‘快’得使我们来不及追踪，我们报道的文字，有时转眼化为陈迹。”

他为了让报道跟上时代的步伐，仅仅四年时间，就写了二百来篇。他那朴实生动、议论风生的佳作，又像磁石一样，强烈地感染着、吸引着广大海外侨胞。许多人在报刊上大谈读了曹先生文章后的感想；有些人还登门请曹先生深谈、详谈祖国实况；加拿大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华侨，看了曹先生的文章，老泪纵横，感慨万千。直到1980年7月，一位自台湾去美定居的读者在回忆当年阅读曹聚仁的这些报道时写道：“那本《采访新记》我在再三考虑下，偷偷带进台湾，一旦被发现，坐牢，绿岛管制，都很难说，风险冒得不能说不大。后来，辗转向朋友借到《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那份读禁书的紧张恐怖味儿，迄今犹心有余悸。可见，管制再严，高压再剧，总有隙缝，让文化思想作某种轻度的渗透。”（《新晚报》8月12日）

在北京，曹聚仁亲眼看见了北京面貌的变化。他说，六百年前的政治家创建了北京，“六百年后的政治家，就在五年之中，扩展了比六百年来建设还要多的新北京。”他纵情歌颂毛主席“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人物”，歌颂周总理“是旋转乾坤的人”。

在北京，周总理对他讲：“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到香港，他就大声疾呼：“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会结婚同居，也曾离婚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为了统一祖国，他访杜聿明，忆蒋经国……。他渴望祖国统一，胜过渴望家庭团聚。

当然，曹聚仁对祖国成就的宣传未必全都正确，夸大、缩小之处都是有的。缩小，可能是他没来得及看到更好的；夸大，可能是受骗上当。至于说观点上的错误，不用说也有不少，尤其是五十年代初的作品，有着严重的错误。后来的报道也有许多毛病。比方说到1960年春，他还认为“中苏友谊，水乳交融，不会有裂痕的”。然而，扪心自问：这难道应该记在曹聚仁账上吗？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曹聚仁由于处于“旁观者”的地位，由于他没有框框的约束，对国内政策的看法，也有其独到之处。他提出过不少耐人寻味的见解。1957年，曹聚仁在北京访问了一些右派分子。他说：“对于右派分子思想的理解，记者与此间人士的说法，不一定相同。年轻的一辈，一提到右派分子，就作公式化的按语，说他们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究其实际，他们并无‘造反’的野心，……章乃器氏说他烧成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他还写道：“在大陆中国，老实说，找不出积极反政府、反共产党的组织，也产生不了这样的英雄。”曹聚仁这些话，我们当时听起来觉得刺耳，说不定会认为他是右派的辩护士，可是，在我们已纠正了反右扩大化的今天，也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说祖国好话，固然是爱国；批评祖国的，也很难说一定是不爱国，说不定是更加爱国的赤子呐！还是陈毅对曹聚仁的评价比较恰当而富有诗意。陈毅在连夜看完了曹聚仁的著作之后，既说曹聚仁是“爱作怪异之论”的人，又说他的怪论“可喜”。

四十多年前，曹聚仁说了一句有名的幽默话：“喝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的人啦。”（鲁迅《伪自由书》）可是，曹先生大概不会想到，他的这句幽默，在十多年前，竟成了国内某些人置曹聚仁于死地的依据。“喝了外国的水，还不是卖国的人么？”这就是极左思潮的逻辑。曹聚仁同成百上千的华侨、港澳同胞一样，被打成了“叛国分子”，家人被说成是“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十多年前，一场浩劫开始了。曹聚仁讴歌的建国十七年，成了黑线专政了；他孜孜以求的统一祖国的大业，只好中断了。曹聚仁在海外的处境愈来愈艰难，他就像那位最终还是被免职的看守灯塔的老人，“大大地衰颓了，腰背伛曲了下来，惟有目光还是很亮”。他两眼炯炯有神地盯住他寄居的房间。做了大半辈子记者的人，不能出去走走，是件很苦的事。大陆的藏书毁了，海外的藏书还在。于是，他就在室内的书架上打主意。谁说十七年的文艺是黑的？怎能容忍党和人民辛勤浇灌了十七年的文艺百花园被人摧残殆尽？他决心看守好这份“家业”。他带病把二十年来所收集的零散的国内文艺资料，编纂成册。这就是那本大八开，厚八百多页、重达十八斤的巨书：《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用大量的图片介绍了新中国的京剧、电影、话剧、地方戏曲百花齐放的面貌，介绍了梅兰芳、周信芳等艺术大师的成就。他为画册写了总序，为优秀剧目写了剧评。他写道：“这是一部伟大时代的剧曲艺术图片实录。”就在国内把这些资料称为“毒草”，将它们一焚二禁的时候，曹聚仁从1971年开始，把这部巨书远销世界各地。现在不少国家的大图书馆里，都收藏有这部巨书。1972年曹先生病危的时候，这部巨书已装订成册，运往各国。一直到现在，这部书仍是引导海外侨胞了解和研究祖国文艺的宝贵资料。

曹聚仁先生逝世已有十多年了。生前，“岛内（指台湾）以他为毒蛇猛兽”。我们对他也是众说纷纭，甚至还给他扣过大帽子。在他死后，尤其是在拨乱反正的时候，在我们争取祖国大统一的时候，又怎能把他这位饱经风霜的作家忘掉呢？他爱祖国，祖国应当更爱他。他早在逝世前夕就说道：“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今天，就让我们用他这句话去检验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吧！

1990年第2期《书林》，此文写于1980年，10年后才得以发表。

曹聚仁、沈从文及其他 ——曹聚仁的又一谜

曹聚仁大约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成名，30 年代著名的。六七十年以来，曹聚仁可谓名扬海内外。不过，我这些日子在揣摩：“曹聚仁的名气是不是还是近几年来最响？”这里固然没有什么仪器可测，用感觉还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不是吗？他既是老、小二蒋的朋友，老、小二蒋的传记作者，又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客，陈毅还专门陪他玩了几天。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谜最近解开了，引世人瞩目。还有，解放军即将炮轰金门，这可是普天之下没几个人知道的军事机密、政治机密呀！可是，海外报纸提前捅了出来。这又是怎么回事？最近揭开谜底，又是曹聚仁干的，于是海内外议论纷纷。

曹聚仁之谜一次又一次地被揭开，是十分可喜的。似乎还有一谜，不见有人提起，这就是：曹聚仁为什么会在 1950 年离沪赴港？

1950 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冒险家乐园”刚回到人民手里之后。曹聚仁为什么早不走、晚不走，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走？

是曹聚仁心甘情愿离沪赴港吗？不是！他要去，1949 年国民党把党票、机票送到他跟前，他早该飞到台湾去了。可是，他断然拒绝，寸步不离上海。

曹聚仁自己不想去港，那一定是被共产党派到港澳的了。抚今追昔，倒有点像。曹抵港后也有些港人这么推测过。倘若真是这样，那么曹聚仁在港的处境，曹一家在沪的处境，就不致于那么艰难了。

那么，曹聚仁是怎么走的呢？据我考证，他是被赶走的。上海解放后，曹聚仁情绪昂扬，决心为新中国服务。不知为什么，当时有些人不相信他。有几个文人发表文章刺他，刺曰：“蒋介石、蒋经国走了，曹聚仁留下来干什么？”弦外之音是听得很清楚的。曹聚仁焦虑了几天，最后还是决定离妻别子，孤身一人到港澳度日。

曹聚仁这种人到香港，无疑会引起震荡。于是曹聚仁起而挥笔，发了篇《从光明中来》，称赞新中国。文章一出，港人又起来刺他：大陆光明，你为什么“弃明投暗”？在好长一段时间，曹聚仁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曹聚仁是人，是人字旁的“仁”，是“聚仁”，也是“巨大的”“巨人”。可是，当时里外都不这样看他。

曹聚仁是在地理位置上被赶来赶去。由此我想起，中国还有位与曹聚仁齐名的人在专业上被赶来赶去。这人是沈从文。沈从文在建国前写过几十篇小说。他的文学成就比曹还要大一些。可是，建国后，从文弃文，改行从事古董鉴赏，研究起民俗学来。何以如此？是因为有位大文豪骂他“反动”，并把文章贴到沈任教的北京大学。沈深感小说写不下去了……

把沈从文“赶成”民俗学家是坏事变好事，值得欣慰。把曹聚仁赶成海峡两岸牵线人也是坏事变好事，都值得庆贺。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当初不赶他们，让好事增值，让好事变成大好事，岂不是更好吗？

要相信人。相信人是团结人的前提，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前提。“一切”是“个别”之和。“个别”是“一切”的基础。

中国人绝大多数是赶不走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赶不走的人。有一位同我有忘年交的甘肃省文联主席曲子贞。他一生被开除过四次党籍。延安整风一次，反右斗争一次，“文革”中两次。晚年，他写了部 80 万字的长篇小说《赶不走的人》。一是赶不走，二是人走心不走，三是走了还回来。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高风，是中华民族亮节。

附：文章写好后，一友人来借书。他乘找书之机，翻阅了我这篇文章，问我：“为什么这样热心读曹著？”我思考了片刻之后说：“这也是被赶出来的。”1979年夏，我看南方某省文联主席在文章中指斥曹“反动”，指斥胡风为“反革命”。我提笔写了篇《赵一曼、曹聚仁及其他》，为曹、胡说了几句话。因胡风没平反，发表时被删掉了。我为曹说的那几句话，在今天看来是低调，可是，当时有位老先生读了大发雷霆，喝道：“曹聚仁是革命，那我们都是反革命了？这个邓伟志肯定是邓珂云（曹聚仁的夫人）的什么亲戚……”这位老先生的批评报到了上头。上头再转给我的顶头上司陈虞孙先生。陈虞老把我叫到跟前，笑眯眯地说：“你闯了个大祸……”我莫名其妙，但故作泰然。陈虞老把事情叙述完以后，我以为他会批评我。没想到，他话锋一转，说：“不要理他。我深知其人（指那老先生）是个左派。你回去吧！”我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怕陈虞老挡不住，总得作点准备。唯一的方法是再读曹著。我敲开了邓珂云老人的家门。自报家门以后，我说：“按规矩，我应当称你‘阿姨’，可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就称你姑姑吧？”认识了珂云姑姑以后，我一口气读曹先生的五十多部著作，连一部只印有两册的（另一本在英国图书馆）、每本重量达8斤的大书，我也看了。我自然了解《从光明中来》的前前后后。不过，事隔17年了……由于同友人谈话时，想起了那篇《赵一曼、曹聚仁及其他》（见我的杂文集《我就是我》），我便将本文的题目定为《曹聚仁、沈从文及其他》，从而把原来的《曹聚仁的又一谜》作为副题，以示两篇文章为姊妹篇。

1995.12.6，1996年第1期《民主》

一本给女性带来美的书

最近十年来，在书刊界，妇女问题一直是个热点。单就妇女理论来说，广义的妇女理论书籍出版了两千余种，狭义的妇女学的书籍出版了上百种。其势头，居高不下。据我预测，今、明两年还将有大幅度上升，可能会达到最高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美之苑——中国女性美大全》是妇女书籍的大花苑中绽开的又一朵绚丽的红牡丹。

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文化统治最久、封建思想体系也最完善的国家。封建主义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男尊女卑。封建文化积淀在中国女性身上的东西比较多。封建主义的妇女观在当代妇女的价值观、择业观、道德观、择偶观、婚姻观、生育观、贞操观、审美观、人才观等方面，都留有很深的烙印。观念的变革并不会因为经济基础的改变一蹴而就；可是，观念迟早会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革。近年的妇女学研究，进一步解开了套在广大中国妇女身上的封建文化的枷锁，同时也抨击了前一阵所暴露出来的对妇女“似爱之虐”的某些宣传活动。令人欣慰的是，反封建的深层理论也在《美之苑——中国女性美大全》一书中熠熠生辉。

1995年2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

妇女学已跻身于学术之林

占人类一半以上的妇女，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过，妇女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那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这就是妇女学的出现。

自妇女学在本世纪 60 年代破土而出以来，她以强大的生命力，茁壮成长。现在妇女学不但已跻身于学术之林，成为百科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学科，而且又从自身中产生了许多子学科。诸如：妇女社会学，妇女人类学，妇女历史学，妇女未来学，女性美学，等等。我很钦佩上海科技出版社编辑的眼力，在 80 年代初，便组织力量编写《妇女百科》。

《妇女百科》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位观察妇女，从谈妇女问题，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为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呐喊。《妇女百科》是妇女知识的大全，是妇女生活的指南，是妇女案头、枕边的信息库。

《妇女百科》不仅是妇女解放的法典，而且是广大男性的良师益友。阴阳是互为依存的。不懂得女性的男性不可能是完全的男性。男性不尊重女性就是不尊重自身。男女全面平等，妇女彻底解放，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我们希望《妇女百科》能成为奔向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一块铺路石。

1990 年 9 月 6 日于上海

从整体上研究女性

作为与男性相异又相伴的女性，历来为人类文化所瞩目。在二三百万年的人类漫长历史中，女性时而被神化，时而被奴化，在奴化中又夹杂着妖化。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探讨过女性的本质，企图揭开女性文化史的神秘面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远的姑且不说，就是近现代便有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以女性为研究对象。有从社会学角度的，有从心理学角度的，有从伦理学角度的，还有从法学、史学、政治学角度的，他们分别都有很深的造诣。学科从来都是有分化就有整合。“整合—分化—再整合……”这就是千百年来学科发展的规律，在从许多不同的学科对女性进行研究之后，似乎也应该对女性进行综合研究了。置于我案头的《中外女性文化比较》书稿，便是着重综合研究女性的可喜尝试。

正因为是从综合上、整体上研究女性，所以作者余亚平等人是把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或者说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来探讨的。通过对女性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她们绘出了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失落的真实过程，并在这个基础上，论证了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价值以及对重建人类文化的意义。作者余亚平等人又发挥了他们对西方文化比较熟悉的优势，对东西方女性文化做了比较研究，研究了女性存在、女性人格、女性角色、女性价值，研究了东西方女性文化上的冲撞、交融和转换，并以女性文化为起点，找到了两性文化各自在人类文化史中的地位及其成因，阐述了东西方妇女运动的发展趋势。

《中外女性文化比较》一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女性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创造，而且有助于通过对女性的公正而客观的认识，进而认识人类整体。为人们完整地认识人类本体，提供了一条思路和一个粗略的框架，是这本书真正的独到之处，成功之点。

自1984年在中国提出妇女学构想以来，妇女学的出版物拔地而起，节节增高，喜看《中外女性文化比较》一书又占领了一个新的制高点。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妇女学研究已成长为世界学术之林的一株参天大树。

1995年5月12日

家庭的“八字宪法”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家庭。尽管远古的家庭同现在不能同日而语，尽管在家庭起源问题上学术界还有许多争论，但总归可以说明家庭是发展变化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家庭至少经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婚家庭、个体婚家庭这几个阶段。

个体婚家庭的历史不长，只有上万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二三百分之一。可是，个体婚家庭本身也经历过若干不同的阶段。总的趋势是由低向高发展。

从纵向看，家庭有高低之分；从横向看，今日之家庭也有优劣之别。高质量的家庭是五彩缤纷的，低质量的家庭也是千差万别的。怎样衡量家庭质量？

一曰：和谐。和谐是指夫妻感情深厚，家庭内部关系和谐，家庭与外部、与他人的关系和谐。和谐带来欢乐，和谐带来幸福。和谐了，喝水也比人家喝得蜜甜。

二曰：健康。生理上要健康，心理上也要健康。生理上也要卫生，心理上也要卫生。健康是劳动的条件。不健康，虽也可以和谐；但是，不健康，总归是缺陷。

三曰：富裕。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也是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也不见得就一定是美好的家庭。在假定家庭的各方面都一样的情况下，富裕比穷好。穷了，可以心好，但是往往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曰：文化。家不在大，有文则灵。在家庭经济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以后，紧接着就应当注重家庭文化建设；在履行家庭经济职能的过程中，应当同时履行家庭的文化功能。假如没有家庭文化，即使富得腰缠万贯，我们也可以认为他穷得只有一样东西——钱。“万贯”与“万卷”相结合的家庭，才是真正富有的家庭。

和谐、健康、富裕、文化是现代家庭质量的“八字宪法”。在国际家庭年里，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的这套《家庭生活文化书库》，便是家庭八字宪法的生动体现。比如，《夫妻之间》、《多维世界》、《女性解忧》讲的是和谐；《家庭医生》、《百病自疗》讲的是健康；《女子家政》、《家庭宠物》讲的是富裕；《身边科学》、《米舒谈书》等，讲的是文化。应当说，在12种书中，讲文化的占的比重最大。这是值得倡导的。这是现代家庭的特点和优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家庭生活文化书库》是家庭质量指南，是家庭质量提高的必备书、必读书。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套书库中，有他们自己编著的，还有他们翻译过来的；有第一次面世的，还有部分是由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发表过的、实践证明是读者欢迎的佳作，多视角，多方位，多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套书库是人们可亲的家庭质量指南，是生动引人的家庭必备书。

可惜，我只通读了其中的6种，还有6种只晓得概要，希望这12种书能尽快出齐，早日把评论权交给读者。

1994年9月15日于天纵书洞

家政学是开放的学科
——《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序

家庭，对于一个劳动者来讲，是后方。后方是前方的保障。后方不巩固，在前方劳动、打仗就会走神。后方搞得好，人在前方就会精神饱满，浑身带劲。

家庭，对社会来讲，是微观，是细胞。细胞组成器官，器官组成肌体。细胞的优劣决定机体的强弱。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和组成部分。社会文明要从家庭文明开始。

家政涉及家庭职能的方方面面，从家庭经济到家庭政治，从家庭文化到家庭宗教，都同家政有关。家政是一门内容极为丰富的大学问。治家同治厂、治国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毕竟是两回事。能当好厂长的，未必能当好家长。这就是说，家庭有自身特有的运动规律。这也说明，家政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应当列为百科中之一科的大学科。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政府中设有家庭科，在法律系统中设有家庭法庭、家庭法院，在大学，甚至中学中开设家庭课程。有的国家，在结婚登记前要进行家庭学、家政学方面的考试。考不及格的，不许结婚。假若一定要结婚，就得补考。补考不及格，婚后生的孩子不许报户口。可见，家庭学、家政学是人生的必修课。

家政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其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更新。在改革的年代，家政学的教材和教学，也处于改革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建英谈现代家政学一书，富有强烈的现代气息。书中有些观念可以说是全新的。任著的副题叫做《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我诚恳地希望它能成为替千家万户打开幸福之门的金钥匙，成为家庭生活的指南。

1993年8月31日夜于天纵书洞

家庭示波器 ——简评《当代中国家庭大变动》

《当代中国家庭大变动》（以下简称《大变动》），是由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广东《家庭》杂志社在1991年联合进行的“城市居民家庭网络和生活质量”调查基础上合著而成的，并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项调查采取邮寄问卷的方式，获得了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共计1470个家庭的问卷资料，同时广泛收集了文献资料、新闻媒体中的大量相关数据和典型个案材料作为补充，较为详实地概括和论述了当代中国家庭的特点和变化规律，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使这项研究不仅有经验层次的描述，也有理论层次的探讨。

家庭的变迁体现在家庭功能、家庭结构及家庭关系各个侧面。《大变动》在全面考察制约、影响家庭变动的各种因素的同时，着重分析了从传统的以亲子关系为轴心的纵向家庭关系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横向家庭关系转化的过程。作者首先概括了传统中国纵向家庭关系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即“结构上纵向重于横向，横向靠纵向支配和维持；观念上父系传统，崇尚孝道；功能上以传宗接代为本，纵向双向交流；区位上“从父居”，进而考察了“日趋更新的夫妻关系”、“夫妻冲突与离异”、“规则而错落的亲子互动”、“孩子——家庭生活的‘调味瓶’”等当今家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新情况、新特点。同时提出：伴随着城市家庭的核心化、小型化过程和家庭关系的相对松散、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减低，家庭网络将日渐完善和发达。通过对当今城市家庭网交往形式、频率和内容的扫描，区别城市家庭网络 and 传统家族，认为家庭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家庭模式，是传统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补充，在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过渡过程中将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对家庭生活质量作单独的考察，是该书区别于其他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作者通过对家庭生活消费多角度的透视、对家庭闲暇生活的各方概览、对家庭住房困境的探源，系统勾勒了当今城市家庭生活的风景线。通过对收入、住房、环境、健康、安全等客观指标和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心理感觉、体验、认定等主观指标的双向测定，对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的两重评估，全面评述了当今城市家庭生活的满意程度。改革开放使我国众多城市的家庭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向小康生活目标迈进。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家庭生活的主导需求是什么？在家庭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如何展开多维的、高层次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如何建立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家庭社会学应该研究的课题。《大变动》对家庭生活质量的专题考察，开拓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最后，《大变动》作为《家庭》杂志社和学术理论界的合作成果，将学术研究与家庭知识的普及宣传结合起来，科学而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家庭的变化发展，对于帮助人们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不啻具有启迪和教益。

1994年第6期《社会学研究》

贺《家事》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家事》已出满了 500 期。

家事，包括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人类生命延续的基本需要。七件事犹如音乐的七个音阶。如何唱法，大有学问。这里同市场一样，也有成本效益、时间效益问题。勤俭持家、科学持家，可以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少花时间理好家务。

家事，包括家庭教育、家庭文化。这是直接关系到人口质量、家庭格调 and 层次的大问题。家，无教不兴；家，无文不雅。

家事，还包括家庭关系的和谐。姻缘之间、血缘之间要和谐，内部关系、外部关系要和谐。有钱不等于幸福，有权不等于幸福，和谐才是真正幸福。和谐是力量，和谐能长寿。

家事自然还包括生育。这是婚姻特有的职能。既要讲研究生育的质，也要讲研究生育的量。

家事是国事的缩影，社会的写照。国有民主，家讲自由。国家搞家长式统治，家庭也多一言堂。治国与治家有共通之处，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能指挥一个集团军或者一个集团公司的，并不等于已经治好了自己的家。

十年来，《家事》在指导家事上做了一些工作。《家事》是千家万户的咨询站。《家事》是没有教室的家庭学校。《家事》是百姓看了不觉深，专家看了不觉浅的版面。《新民晚报》能够持久地以“飞入寻常百姓家”而著称于全世界，其中《家事》也加快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速度。

祝《家事》兴旺！祝《家事》长寿！！

1995 年 9 月 2 日《新民晚报》

《严景耀论文集》读后

开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严景耀论文集》，收了严先生自 1928 年至 1954 年撰写的 25 篇文章。不论从篇数上看，还是从字数上说，《文集》的大部分都是严先生在上海写成并且在上海发表的。

严先生从三十一岁到四十二岁是在上海度过的。这十一二年是严先生的成熟阶段。学术上成熟，政治上也成熟。政治上的进步带动了严先生学术上的造诣；学术上的造诣促进了严先生政治上的进步。

严先生在学术上成熟的标志是在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中，接受了马列，运用了马列。他在阐述改造社会与改造自己的关系时，引用了《资本论》。在 1939 年那个时候，在严查“赤化”的当口，他敢于公开引用马克思的话，是难能可贵的。我不知道严先生是否读过恩格斯的《论权威》，可是在严先生的《领袖论》等著作中充分体现了恩格斯的观点。我不知道严先生是否读过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可是，我知道当时毛泽东的这部书曾以不署作者姓名的版式在上海出版过，估计严先生看过。不然，严先生的观点不会那么鲜明地采用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还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 1938 年 5 月讲的，严先生在 9 月就在《论持久战与民众运动》一文中，反复阐发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

这说的是学术，其实也是政治。严先生在政治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5 年他积极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 年他热情支持上海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他勉励他的伴侣雷洁琼：请愿不成功就不要回来。严先生不仅写出了熠熠生辉的民主理论，而且在争民主、争自由的实践中为人楷模。

严先生在社会学、政治学、犯罪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严景耀论文集》的出版将大大丰富中国的学术文库，推动中国当今的民主政治建设。祝愿《严景耀论文集》赢得更多的读者。

1995 年第 6 期《书城杂志》

科学社会学的兴起

“阿波罗”登月——从“小科学”到“大科学”

美国的阿波罗飞船登月，曾一度震动了世界。“阿波罗”之所以能够上去，想必有很高超的技术和设备。可是，我们也可以认为，“阿波罗”是靠84万只手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托上去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参加研制阿波罗飞船的人，共有42万。42万，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世界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在42万以下。42万人，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组织。这里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如果组织得不好，不管在哪个环节上出了毛病，都会在阿波罗飞船上打下社会烙印，都会影响登月。例如，阿波罗-13原定降落在月球雨海以北的弗拉·摩洛高原，但它在飞离地球33万公里左右时，发生了猛烈爆炸，使一次登月飞行，变为一次逃命的航程，损失了1亿多美元。事后调查，造成这次爆炸的原因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没有协调好。阿波罗-13上的两个恒温器开关原来是按28伏电压设计的，后来设计修改了，电压改为65伏，但制造厂供应的仍是这种按28伏电压设计的开关，结果造成了这次灾难性的事故。

研制一个比马车大不了多少的“阿波罗”，用了42万人，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古人在编嫦娥奔月的神话时，就没想到几十万人嫦娥奔波的情节。这大概同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人们的眼界狭小有关。

古代科学水平不高，当时的科学家，不仅是百科科学家，同时还可能是哲学家、政治家。如今不同了，不仅精通各门科学的科学家不存在了，就是熟悉一门学科的科学家的也不多，一般是只懂一门学科的一个分支，或者是只懂分支中的分支。

分工越细，越需要综合。换句话说，为了把握一个分支学科，必须同许许多多学科发生联系。这个联系不用说比古代，就是比近代的居里夫人那个时候，也要广得多。居里夫人靠三两个人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有人称她那个时代，两三个人办一个研究所的做法为“小科学”，把今天这种成百上千人参加的网络矩阵的科学叫“大科学”，这是有道理的。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科学中的社会问题不知增加了多少。探索“大科学”内部的管理，这既是科学社会学产生的原因，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候鸟公约的签订——从一国到跨国

人类分国别。可是跟人类休戚相关的鸟类不分国别。世界上有许多种候鸟每年要飞越几十个国家。前不久，我国广东中山县一位社员捕获了一群鸟，发现其中有一只鸟的脚上套有一只铝环。经有关方面研究，知道是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及工业研究组织下属的野生动物研究所给它带上去的。于是，马上写信给这个研究所。一个月后，收到了这个研究所负责人的来信，说明这只鸟从装环后飞出到中国社员捕获，经过了15个月时间。广东的社员是在这只鸟重归南国的途中捕获的。澳大利亚的报纸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则令人可喜的消息。

这件事告诉我们，要把候鸟的习性和迁徙规律研究清楚，需要各有关国家的配合。不然，少了哪一段资料，都只能是对候鸟一知半解。近年来，有

些国家之间不论在政治制度上有多大分野，他们依然可以在对候鸟的研究上达成协议，签订条约。这便是有力的证明。

在对候鸟的研究上是如此，在对其他生物的研究上也无不是这样。各地有各地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各地有各地研究某一生物特别有利的条件。如果说有哪一个国家的动物没被搞清楚，那么一本世界动物志就要开天窗、留空白。这是很可惜的。要编好一本较完整的动物志，就少不了世界性的联合。

不用多说，对地球的研究更加离不开地球上的人。地学要求在地球的各点上设立观测点。少了哪一点，都会妨碍我们对自已的立足之地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近一、二十年，美国、苏联、日本、伊朗、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都曾想研究青藏高原，但他们只能在外围打转，无法研究清楚。还有珠穆朗玛峰，很多国家过去只能从南坡爬上去，局限性很大，而我们只能爬北坡，两方面都只能了解一个侧面。这两年，我们在青藏高原接待了从外国来考察的科学家，中外合作，加速了对青藏高原认识的进程。

研究天、地、生宏观世界的科学需要广泛的社会交流。研究微观世界是否就可以离开社会呢？同样不行。研究基本粒子的大型加速器似乎就不宜一国建造、一国使用。

“科学无国界”，如果说在提出时，还是指的传播而言，或者指的是理论而言；那么在今天，已经是指的人员配备、技术装备、情报资料和实验经费了。科学的足迹不仅已经跨出了国界，而且已经跨出了球界，到球外去了。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和“宇宙人”在飞船上联欢、谈判。“天下为公”在提出时有点乌托邦味道，在不远的将来，会变为光辉的现实。研究其大无边的“宇宙社会”中的社会活动规律，是科学社会学的又一任务。

地质学的几次大突破——从“地缘”到“业缘”

古代，一河之隔，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现在这种受地区限制的情况变了。由于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达，基本实现了“天涯若比邻”。这就是说，“地缘”观念打破了，剩下的就是行业界限。随着科学的发达，这个界限越来越明显，但也越来越交叉。19世纪初，生物学进入了地质学，促进地学界用古生物进化的观点来确定地层先后序列，形成了“生物学的地球观”。20世纪初，化学进入了地质学，使地质学从描述进入分析，形成了“化学的地球观”。60年代到现在，海洋学、力学、物理学进入了地质学，促进地质学界提出了板块学说、地质力学，形成了“物理学的地球观”。

各学科之间，乃至各分支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在边缘交叉的地方，异军突起，出现突破，是当前科学发展的特点。著名的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定律，就是由有机化学家和量子化学家相结合，以两人之长完成的。还有全息概念与光学相结合，出现了用途广泛的三维全息技术。这些学科间似乎还太相近。说得再远一点，对地震的研究可以从月震、星震的研究中吸取养料。宏观与微观，似乎是相反的两极，但两极相通。宏观现象的基础是微观，用微观分析宏观现象，比宏观实验方法要快得多，经济得多，好得多。有人认为，基本粒子物理与天体物理的交叉，就是让微观与宏观这两个前沿阵地碰头，可能会使一些天文现象在理论上得到解释，有所突破。

那么，各行各业之间谁来穿针引线，这又是科学社会学任务之一。

诺贝尔的发明——从科学到社会

近几十年来，诺贝尔奖金成了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发明炸药的目的在于开矿生产。换句话说，他的本意是要让发明给生产带来益处。可是，发明家的发明对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家的想象。炸药很快就用在战争中了。这完全出乎诺贝尔的意料。诺贝尔大声疾呼要求制止，但是这已经由不得他了，炸药依然在战争中爆炸，弄得诺贝尔一筹莫展。如今，炸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大了：从爆炸成型到劈山填海，从人工降雨到节日焰火，都或多或少跟它有关。

岂止是炸药对社会有影响，任何一项发明、发现，都是投向社会的“炸药”。达尔文的进化论炸得上帝造人说失魂落魄；哥白尼的日心说炸得宗教界乱成一团。前些时候，自动化的推广，在有些国家带来了工人失业。近两年，试管婴儿的试验成功又将把现有的伦理道德搅乱。人类寿命的延长，又使人担心，在实现了“人生会当二百年”以后，在那么漫长的一生中，人的婚姻关系还会不会从一而终？

科学社会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岸之间的桥梁。自然科学的成就会推动社会科学的研究。最近就有人把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科学的划分，运用到社会科学当中。同样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会推动自然科学的研究。比方说，最近，社会科学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原理，就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开辟了新路。科学社会学的兴起将加速这两门知识的流通，促进人类知识信息量的激增。

1980年第12期《科学画报》

行为科学

在北方农村，常用“看蚂蚁上树”来形容游手好闲。其实，看蚂蚁上树，也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讲，叫行为科学，或称动物行为科学。

动物的特点在于有动作。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动作；同一种动物又有进食、求偶、斗争等不同的动作。行为科学就是以动物的动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就拿蚂蚁来说，人们尽管晓得很多蚂蚁的“社会化”状况。诸如蚂蚁懂得排队觅食、集体迁徙，懂得贮藏食料等等，可是，蚂蚁是靠什么来交流信息的呢？那就不甚了了。前几年，有人研究出蚂蚁“社会”是靠一种用“接吻”方式传播的气味“语言”来组织的。最近，又有人进行迷宫试验，在把气味抹掉以后，蚂蚁仍能记住途径，证明蚂蚁有记忆力。从而把对蚂蚁行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蚂蚁只是千百万种动物之一，同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还有很多。比如人们发现蜜蜂对颜色，特别是对黄色和蓝色比较敏感，测出蜜蜂能看到人眼看不到的紫外线。还有人研究出蜜蜂用“舞蹈语言”来交流食物所在的方向、距离和多寡。

再拿蝴蝶来说，不久前，有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发现灰黄蝶*此文与朱长超合作。蝶不仅爱追逐雌蝶，而且爱追逐苍蝇、昆虫、画眉鸟。更奇怪的是，有时还追逐飞舞下坠的落叶以及自己的投影。这位院士作了五万次试验，才弄清灰黄蝴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对深色（如棕、黑色）反应强烈，而对形状等则不够敏感。

在仿生学中，仿生物的体形容易，仿行为难。而要仿行为，就必须弄清行为的来龙去脉。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必将推进人类改造自然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人类的物质生活。

不仅如此，研究行为科学还将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列宁曾把“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视为“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知识领域”（《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9页）。人们常说：“鸟儿在歌唱。”鸟儿一定会歌唱吗？未必。有人让初生下来的燕雀离群，过一段时间后，开展燕雀“歌咏比赛”，离群的燕雀远远比不上没有离群的燕雀。还有人把一大群小燕雀，分成几小群生活，久了，他们就各唱各的调，形成几种“方言”。还有人把幼鸟弄聋。这耳聋的燕雀尽管发声器官完好，仍然唱不出歌来，成了“哑鸟”。显然，燕雀的歌声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听来的，学来的，一句话，是存在决定的。

当然，行为科学的研究是一项极为艰苦的事业。英国女人类学家古道尔为了了解黑猩猩的行为，在原始森林里过了十年的孤独生活。美国一大学系主任仅仅为了弄清雌环颈雉见雄雉后的内分泌状况，花了十五年。有的学者为了了解鲨鱼的行为，与鲨鱼斗了一辈子；有的学者为了了解蛙、鸭、猴、狗的行为，成天与这些动物为伍，学会了动物语言，与动物交为朋友，被人赞为“农民型的自然科学家”。

由于现代生物学正在同时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发展，因此，重视研究行为科学是当前国际生物学界的重要动向。我国是农民、牧民、渔民最多的国家，他们对动物的行为很熟悉，这方面的条件十分有利，如能把他们的经验加以总结，并充分发挥专业研究人员的作用，可望我国的行为科学会走在世界的前列。

1979年11月9日《文汇报》

赞“上海大学社会学学派”

1995年冬，上海大学的社会学同仁响亮地提出：创建上大社会学学派。对此，我表示由衷地钦佩。

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是邓小平提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学科以后，在中国学术界率先建立的学科。基础是比较好的。我过去只知道他们是系、所、刊三者俱全。这在国内的系、所中是独一无二的。最近方才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他们平均每年完成二项课题，这是很不容易的。“八五”期间，他们人均出版4部书，人均发表30多篇论文。应当说是很高的了。

在出成果的同时，上大社会学学科也出了不少人才。社会学学科现有7名“正高”。这个比例是很大的。“七君子”是手持自己一摞摞著作走进学术殿堂的。在上大社会学学科中，有好几位是社会学某些分支学科的带头人。因此，上大社会学学科试图创建学派是指日可待的。

“指”哪一“日”呢？依我看，就是“世纪之交”。也许会有朋友不以为然。我可以举芝加哥学派为例，说明这一点。

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

说芝加哥学派很有影响，是因为他们于1892年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世界第一”，自然是很有影响的。那中国的上海大学呢？他们是在1980年4月创办了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

说芝加哥学派很有影响，是因为他们于1895年创办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第一”，自然是很有影响的。那中国的上海大学呢？他们是在1981年创办了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后的新中国的第一家社会学刊物《社会》。

说芝加哥学派很有影响是因为他们这个系的创始人A.W.斯莫尔与人合写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第一部教科书自然是很有影响的。那中国的上海大学呢？他们的教授也参与了第一部《社会学概论》的写作。

美国的“三个第一”是硬指标；中国的“三个第一”也同样是硬指标。在硬指标问题上是不会有争议的。可能发生争议的是“软指标”。

不过，从“软指标”上看，今日之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同当年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相比，可能会加个“更”字。

从研究对象上看，芝加哥学派是对当时的新兴城市芝加哥的社会问题开展实证研究的。新兴城市有新情况、新角度、新视野，因此，更容易促成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领域中达到新高度。上海大学呢，以浦东新区的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对上海这座特大城市进行比较研究。有了这么好的“实验基地”，那就更加有可能在城市社会学方面有所建树。

芝加哥学派在兴起之初，不就是“七、八条枪”吗？创始人斯莫尔算一位，合著芝加哥学派代表作《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一书的托马斯和兹纳尼茨基算两位，在都市社会学上有造诣的帕克、伯吉斯、沃思、佐巴斯算四位，合起来也就是七位。芝加哥大学的“七君子”可以把世面做得那么大，我们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七君子”难道就不能把学派搞起来吗？况且，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还有许多副教授，还有五位博士呢！他们均在47岁以

下，风华正茂着呢！更重要的，芝加哥学派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城市进行研究，上海大学的社会学学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城市进行研究。芝加哥学派从产生到出名大约用了二十多年，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从产生到今天，也有 15 年，已小有名气，到 21 世纪还有 5 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应该体现在学术事业上。上大学派的形成应当比芝加哥学派的形成过程快一点。二十年，是可能的。

当然，上面是机械地推测。至于能否把理想变成现实，还要看上大的努力。“有志者事竟成”。学者的潜能是有的。只要我们在学术事业中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坚持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派一定会在“争鸣”中形成，在“争鸣”中发展。

上大学派应有上海特色，应有长江三角洲特色，应有中国特色。中国太需要学派了。仅仅在社会学领域，上海就可以有几个学派，中国就应该有几十个学派。“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中国的学术春天里应该有千个“学说”，万个“学派”。中国有了千百个学派、学说，中国的学术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国际地位就会大大提高。

1996 年第 2 期《社会》

我从未忘读的报纸

《社会科学报》是我最喜欢读的报纸之一。从第一期起读到现在，没有漏读过。这在我的读报史上是不多的。

读这张报纸，既不像吃大补膏，也不像吃抗菌素，而是像喝百合汤，清香、温和。编者心中有方寸，手中有分寸。

在10月18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洪泽同志提出创刊时所考虑的编辑方针是否要变。记得五年前洪泽同志在草拟办报方针时，曾拉我一起讨论。他管了半个世纪的报纸，对他当初定的基调，我投了赞成票。五年来，报纸之所以能不断前进，同当初的基调大有关系。因此，我认为这个基调可以大体不变，稍加微调。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支持新学说、新理论问世，鼓励理论工作者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该活跃的，还是要活跃起来。

1990年11月8日《社会科学报》

愿《文摘》杂志长寿

无论是在文摘类期刊凤毛麟角的时候，还是在文摘类期刊多如牛毛的时候，我都爱读《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简称《文摘》）杂志。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文摘》杂志书芯用纸是黄色的，每一面上都有几颗颗粒。颗粒脱落了，版面上便少掉了几个字。我会恭恭敬敬地把那少掉的字补上。

如此爱读《文摘》杂志，不只是职业偏好。主要是因为《文摘》杂志全是首次文摘。这自然不是指著作的发表，而是说译文的发表。《文摘》杂志一直有一支高水平的翻译队伍，自译自编，观点新鲜。顺便发个牢骚，如今有些文摘，多有重复，令人乏味。再就是《文摘》杂志，不同于短文摘，而是坚持长文摘。短文摘固然增加了密度，可是，由于斩头去尾太多，总觉不过瘾。《文摘》杂志则不然，虽有所删，但是有头有尾，能让人看出个头绪来。

《文摘》杂志可以认为是长寿刊物了。希望她能成为老寿星。期刊的生命周期是社会稳定的折射。如今中国人的期望寿命在延长，令世人瞩目。愿我们的刊物与日月同辉！

争当“小百科”

百科是人类全部知识的总称。要问人类的知识有多少门，据最新的统计：自然科学有两千多学科，社会科学有一千多学科。可是，我敢断言，不论统计者的态度如何认真，不论他的统计表有几尺长，这个数字永远只能是近似值。因为，学科的分化是无止境的。然而，即使学科上了万，我们将仍以“百科”来表示这个可变量。

学问分百科、千科，是近代的事。从前，学问只有一科，那就是原始的哲学。名为一科，实际内容不止一科。古代的大学者什么都懂，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有的还是伟大的建筑师。可是，古人的无所不知，恰恰是他们有所不知的表现。韩愈有云：“术业有专攻”，一个人样样懂是办不到的。因此，后来知识就开始分科了。分科，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是知识丰富的硕果。百科的出现，是人类的自豪。

但是，也有一些明白人看出了分科的弊病，主张在精细分科的基础上，高度综合。钻到牛角尖里不出来，将会使学科孤陋，学者寡闻。因此，运用多学科的力量攻一科，已成为各科学者的共同呼声。综合治理，是当今的治学之道。前几年人们只觉得相邻的学科之间应当合作，近年来人们主张跨度要大，主张远缘杂交，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一句话，人人都在争当百科全书派。

从青年的成长看，更应当强调在青春阶段，打下深厚基础。人们常常批评某些人“头重脚轻根底浅”。这是完全正确的。理由是：根底一浅，头就重起来；头重了，也就容易折断。一切有志于成为大专家的人，首先要当小百科，只有先转过小百科的“十八盘”，才能最终登上某一科的“南天门”。

《青年报》把知识副刊定名为《小百科》是符合科学发展趋势的，是符合青年成长规律的。我们预祝《小百科》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成为青年手中打开知识宝库的万能钥匙。

1982年9月17日《青年报》

真善美的颂歌

张权教授是举世闻名的歌唱艺术家。她的歌声至今还回荡在大兴安岭上空；她的歌声至今还在伴着密西西比河流淌；她的扣人心弦的歌声至今还在紧紧扣着千百万人的心弦，铭记在千百万人心间。

余生也晚。在张权教授已成为大洋彼岸声乐学派活跃分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她的《秋子》、她的《茶花女》我都没有看过。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年过花甲。我只听她唱过一支歌。可是，我见过张权大姐流泪，见过张权大姐欢笑。她的泪，是沉重的音符。她的笑，是欢快的乐章。我更多的是听张权大姐讲话、发言。我认为，她说的比唱的还好。她做的比说的、唱的更好。她是民进中央常委，民进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她是民进的旗帜，是我们广大会员学习的楷模。在有人充当“音乐大款”的时候，她带病下乡演出，不收一分钱。她德高望重。她任民进中央文艺委员会主任，是任之无愧的。可是她力荐中青年上第一线，坚决辞去主任职务。她为人纯朴，说话纯真，思想纯洁。在她的发言中找不到官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曾送她两句话：“张口即真话；权术概不懂。”因为不懂权术，她吃过大亏。可是，她吃大亏之后，依然不学权术。权术同她从不沾边。张权教授的一生就是一曲真善美的颂歌。

张权教授已离开我们快一年了。她的生命已经划了休止符。可是，她的歌声、她的精神永远不会有休止符。永远！

降低迷雾系数

打开报纸很容易看到“日前”二字。“日前”成立了个什么机构，“日前”开了个什么大会，“日前”授了个什么大奖。起先信了报纸，总以为“日前”离今日不远。后来慢慢了解到那“日前”的包容面很广，有一周前、一月前的，每逢年初出现的“日前”则更为离谱，许多是年前，离“日前”远着呐！

新闻写作早有“五个W”之说，这就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五个W”至关重要，因此新闻还同时要求把五个W写进新闻的第一段，即导语中。不是说要吸收和借鉴外国先进文化吗？早在19世纪80年代，国外就把“五个W”视为新闻构成的基本成分。不是说要继承、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吗？早在1945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以《从五个W说起》为题，发表社论，庄严指出：“五个W是把事实弄清楚的最起码条件”。讲了半个多世纪了，怎么会居然把居于五个W之首的“何时”给丢掉了呢？

新闻贵在新。不新就不成其为新闻。新闻的时间性越强，社会效果越大。缩短事件发生时间同新闻发表时间的时间差，是新闻工作者的水平之所在。现在有些日报，已经发展到不只是以“日”计，而是以“小时”计，甚至以分、秒来计了。对比之下，我们有些传媒竟然把本来有具体时间的新闻，用“日前”二字代之，是何等的落后啊！很多事情，早一天同晚一天有着天壤之别。发明权、创造力、知识产权只能给领先者。假如在时间的表述上含糊不清，必然会给这些问题上的判断增添麻烦。“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几十年来，因为报道的滞后，把中国人的重大发明拱手让给外国人的事，决不是一两起。

时间上的模糊，是时间观念不强的表现。就时间观念来说，不管可以原谅多少时间观念薄弱的人，但唯独不能原谅新闻工作者。因为，你姓“新”啊！

抽象、含糊乃新闻之大忌。为监测新闻中的含糊不清，新闻学里产生了“迷雾系数”这一概念。新闻学认为：迷雾系数越大，其可读性越小。

现在有些报纸的迷雾系数实在太大。不仅时间模糊，在其他几个W方面也让人雾里观花。比方说“何事”。在写成绩时，有的消息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何谓“阶段性”？阶段有多长？不知道。没有分母的分子，能说明什么呢？

至于说在“为什么”这个W上的迷雾系数，那就更大了。谈远因，不谈近因；谈表层原因，不谈深层原因。回避“为什么”的新闻，使人读了如坠五里雾中。报纸是让人读的，读者也有权利读报，可是在编者与读者之间有一层“雾状体”，岂不是违背了双方的初衷吗？

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我们在五个W上的迷雾系数都很大。老实说，在我们的会议新闻中，包括剪彩新闻、奠基新闻、庆贺新闻，在“何人”这个“W”上的迷雾系数是很小的。名单一长串，今天漏了，明天还会补正。何以如此（怨我在这里用一个W）？答曰：有关方面抓得紧啊！

是的，五个W本是五兄弟。希望有关方面能像抓“何人”这个W一样，来抓一抓其余四个“W”，我们的迷雾系数便会降到最低点。到那时，提高发行量的问题就不必那么兴师动众了。降低了迷雾系数，增强了可读性，就增

加了可购性、可剪（剪报）性以及可订性。

1997年第2期《新闻记者》

编辑学的网络问题

自提出编辑学以来，不仅外界有人摇头，就连出版界也有些同行不以为然。有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学问从浑然一体，发展到今天的三千门（说是“今天”，其实也是七、八年前的老话，现在增加到多少，待考），一直有争论。更何况我们的编辑学眉目还不太清楚，远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呢！

不过，一门学科的形成总有个过程。编辑学亦然。在我看来，编辑学不只是一门学科。假如把她看作母学科的话，它下头还有许多子学科、孙学科。她应当是一个网络复杂的科学群。依编辑的最终产品划分，有文字编辑学、美术编辑学、辞书编纂学等；在辞书编纂学之下，又可分为语文辞典编纂学、双语辞典编纂学、百科全书编纂学、年鉴编纂学等。依编辑工作分，有编辑管理学、编辑修养学、编辑工艺学、编辑经济学、编辑手段学等。

提“编辑学”一门学科已经受阻，提那么多学科会怎样呢？我觉得没什么好阻的。只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就可以说一门学科已经形成。要求理论体系十分完整，是办不到的。哲学，大概可算是三千门学科的第一门、且是最老的一门了。试问：哲学的理论体系完善没有？似乎曾被人认为完善过，但曾几何时，就被人认为不完善、被人认为需要“突破”的了。

编辑学刚刚被提出来，仅仅是粗线条，编辑学有一些方面也可以为其他学科所代替，但是，既然编辑这一行已存在了几千年，至少是在今天还看不出她有消失的可能，那编辑学就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至于说她的某些方面可以被代替，我看，说“代替”不算错，说“交叉”更确切。任何一门学科当中，都有一部分可以为相关学科所代替的，但是它还是存在的。编辑学也不例外。编辑学的网络在形成之后，也会部分地取代其他学科。同样的，其他学科也决不会因编辑学的“取代”而不复存在。

编辑学的形成和发展除了要依靠从事编辑实践的编辑队伍以外，还要依靠从事编辑学教学的师生，依靠从事编辑学理论研究的研究人员。这三方面力量结合起来，编辑学就会日臻完美。这三方面力量的结合本身，也是编辑学“网络”的又一“维”。

预祝编辑学的网络一天比一天严密、科学！

1985年9月3日，1986年创刊号《编辑学刊》

刊物的经济政策也忌一刀切

“自立”是个诱人的词汇。我喜欢“自立”。当我看到只会爬的孩子自立时，有说不出的高兴。体力上的自立值得庆贺，经济上自立也值得称赞。我就不止一次地宣讲过欧洲大学生不向父母要钱的自立精神。

可是，世界上的事物也不是都以自立为好。西瓜如果自立，怕是结不出瓜来，至少现在是这样。列车如果立起来，怕是要死人的。再说，以立起来为美的，也不都是自己立的。高高耸立的电视塔无不是人们把它立起来的。再拿上头讲的小孩自立来讲，也是有条件的。刚生下几个月的婴儿不仅不可能自立，就是旁人把他们立起来，也立不住；立多了，会变成“0”形腿。

这个浅显的道理，到了社会生活中往往容易被忽视。1988年8月，在一次报刊会议上，有人介绍了他们自立的经验，受到与会者欢迎。可是当上头准备推广时，介绍经验的同志却不赞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介绍经验的同志对领导说，不是每一种刊物都能自立。大部分刊物不能自立。因为有的刊物发行量可能很大，有的刊物发行量大不了，有的甚至不应该大。雅俗共赏固然好，雅俗分赏也很必要。老少咸宜固然好，可是老少的胃口毕竟不同。现在我们的刊物覆盖面太大。实际上每个人看刊物的一小部分，利用率很低。刊物的发展趋势，应当是分工越来越细，读者对象越来越窄。比方说青年刊物，25岁的青年要看的，18岁的青年不一定要看。将来我们的刊物如果能按年龄组分得很细，按文化层分得很细，每种杂志的读者减少，每一本杂志的利用率提高，从全社会看是极大的节约。可是这样一来，刊物经济上自立更为困难。

什么都有个多元、多样，对刊物的经济政策是不是也能来个多元、多样呢？该补贴的就补贴，不要补贴的就不补贴，该补多少就补多少。当然补贴的渠道也应该多样。

1988年11月《新闻记者》

我与文汇报同年生

我与文汇报同龄。文汇 50，我半百。再说得精确一点，我是在文汇报问世后 10 个月才出世的，实际上比文汇报的报龄小。不过，我真正同文汇报打交道，是 20 岁那年，借文汇一角，发了篇“豆腐干文章”。从此，我成了文汇报的千百万作者之一。

可是，我在文汇报的众多作者中，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我可能是近年来被文汇报商榷得最多的作者之一。1980 年，我在文汇报上发了篇《家庭的淡化问题》，接着文汇报上发表了好多篇同我商榷的文章；后来，我在文汇报上发了篇《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接着文汇报又发表了好多篇同我商榷的文章；我在文汇报上发了篇《论错误》以后，接着文汇报又发表了好多篇同我商榷的文章；我在文汇报上发了篇《淡化当官心理——谈做学问与当官的函数关系》，接着文汇报又发表了好多篇同我商榷的文章。

文汇报发这么多同我商榷的文章，并不为每个人所理解。有朋友悄悄对我说：“文汇为什么老是同你过意不去？”至于间接传到我耳朵里的议论就更重了。可是，不管社会上怎么传，都没有动摇过我与文汇报的友谊。我始终认为，商榷是正常的。商榷是认识发展必不可少的途径。天下没有不可商榷的文章，更何况我呢？在中国，商榷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也曾多次想写点“对商榷的商榷”。可是，又考虑不要造成“批评不得”的空气，就没有对那么多商榷作过一次答辩。说也奇怪，就因为文汇报没发表过我的答辩，也引起不少传言。可我自己心里明白。

我同文汇报的友谊，为什么“颠簸”那么多次而“不破”？原因很简单；我是文汇之一滴。从 50 年代的陈虞孙、陆灏等同志，到今天的马达、张启承等同志，都为我出过题，改过稿。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文汇的同志还为我担过文责。既承担过应该属于我的过错，又为我承担过不是过错的所谓过错。保护作者，关键时刻决不出卖作者，这看起来是平常的事，但是在有些时候又是很难的事。正因为文汇报的报人有这点新闻道德，所以我们的友谊长久。

虽是同年生，不愿同年死。这就是我对文汇报的美好祝愿。人即使是长命百岁，也不过是两个“50”。而报社的寿命应该是不止两个“50”的，问题是只要能够长治久安。报纸短命，不管从那方面讲，都不是好事。

因此我要说，我的祝愿并非艺术夸张。

又：上面一点文字是在 1 月 25 日参加文汇报 50 年座谈会的当天写出来的。写完以后总觉缺少点什么，便没有寄出。今又重读，觉得应该加一句：文汇报能为我承担不错之“错”，从编者与作者关系上看，是高尚道德。可是，从对真理的态度上看，违心认错，似乎又有点那个。干么要这样为难报人呢？怎样才能不让报人违心认错呢？我将再想下去。

1988 年 1 月 31 日，1988 年第 3 期《文汇之友》

赞老年报

老年报的读者正在日益扩大。究其原因至少有三条。一是老龄化在越化越多。老人自然爱读老人自己的报纸。二是老年是中、青年的未来和方向。我们常说青少年是未来。殊不知辩证法告诉我们，老年也是青少年的未来。不是吗？哪个老年不是由青少年转化而来？哪个青少年不在向老年走去？走得到是福气；走不到，成了“早夭”，成了“英年早逝”，那就是遗憾。

当然，老年报的读者面扩大的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主要原因是在第三条：老年报本身办得好。就拿《上海老年报》来说，我就比较喜欢读。

《上海老年报》文字老练、洗练。不像有些报纸拖泥带水。就连标题，有时候读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对仗的功底很深。看标题就像是看对联。

《上海老年报》文风老辣。现在舆论界针砭时弊的文章不少，可是，有的就像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是“钝子刀割肉”。可是，《上海老年报》就写得犀利，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老练、老辣的文章，多出于老作者、老编辑之手。报是人办的。作者、编者是过来人，有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资本。他们会写，也敢想。过去人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话言重了。从现实看，可以改为“人之将老，其言则善。”人老骨头硬。硬骨头的笔头往往也是硬的。患“老年骨质疏松”的，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老人耐高压、耐腐蚀。

1995年10月27日《上海老年报》

只有起点而无终点

萧县地灵人杰。

萧县是教授县。萧县是高工县。萧县是人才县。

萧县的人才，出在萧县，留在萧县，布在全国，撒在全世界。

萧县的人才是萧县最宝贵的资源，萧县的山要靠萧县人来开，萧县的水要靠萧县人来引，萧县的建设蓝图要靠萧县人来描绘，萧县即将矗立起的高楼大厦要靠分布在五湖四海的萧县人添砖加瓦。

地缘的力量应当发挥出来。成千上万的萧县英才需要联网，联网就是联合，联网就是联谊。联网会产生协力、合力，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其实联网本身就是生产力。

《萧县英才》一书的编写，是为联网提供一张联络图，是联网的第一步。我作为萧籍人对《萧县英才》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我相信老乡们也会同样高兴。在册的、没在册的，都会为有这一张联络图而高兴。

可惜的是，这本书所收录的英才很不全，虽不能说它挂一漏万，但也可以认为挂千漏万。

按理在萧县英才中，还应当包括那些踏进过萧土，为萧县出过大力，流过大汗，并且至今对萧县还有深厚感情的、现在已经调离的非萧籍人士。川流不息是萧县英才的结构特征。对非萧籍的萧县英才，本书真可谓挂一漏万，我们真应该表示歉意了。

但是，《史记》全吗？《资治通鉴》全吗？对二十四史不是还有人批评吗？！不全也得印了，明知不全也不能再等了，我相信应该收入而又暂时未收入本书的同乡、乡长，是会理解编者的一番苦心的，是会相信编者不会厚此薄彼的。你我都是同根生……

好在此书是第一册。砖头抛出去以后，不愁引不来白玉。咱们“格(gé)拔县”里格拔的人太多了。可望不用多久会有大批英才被收入续集。此书的编写是只有起点而无终点的。一册接一册地编写，是萧县人才兴旺发达的标志。

愿得萧厦千万间，大庇萧县英才俱欢颜。

生有涯而知无涯

这几年来，我曾为好多本书写过序言，那些书的作者和为他们所写的书，大致都是专业对口的。但像朱林兴教授这样，那是在我所接触前来要求写序的作者行列里所罕见的；是否可以说，他是近年来经济学教授写随笔的少数人之一。

霞光芳雾映春晖。这几年，随着政局稳定、清和，文坛百花齐放，随笔也有如一片繁花，琳琅满目，神驰万里。中国随笔是有优秀传统的。今天更有所开拓、弘扬。朱林兴先生的随笔，由感而发，由发而写；文篇所叙，大至地球万物，变化万端，小至影星、歌星，吃喝玩乐，其嬉笑怒骂，力透纸背，与人历历在目。文为时而作，作者此处选择的题材，都是当今人们所注意的，关心的，足可以与读者有同步心理感应。集中所叙的虽几乎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接触的，但作者却以经济学者所具有的敏感性和责任心，从多元思维的力度，针对近年，特别是去年以来文化经济领域里出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现象，提出自己新颖、别致的见解，如对于当前仍令行不止的愚昧消费、公款私化、信息市侩化、影视明星介入名品广告，都分别予以剖析并指出其症结，若干篇目，颇见匠心，如《莫让“母鸡打鸣”》、《奖官》，经重组、重包装后，就获得新观点从而提出引人注意的课题。作者善于捕捉题材，勇于自抒胸臆，直陈感想，而很少有忌讳，遣词造句，淡妆朴素，刚柔相济，抑恶扬善，催人奋进，令人奋发。

集子作者是以学者身份写随笔的，其实，学者和作家，应该是合而为一，古乃有之，于今亦然。优秀的学者应当是作家型学者。他也须下笔走龙蛇，倚马生万言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有如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大地星光灿烂的学者群，他们堪称是在自己研究领域的权威，其中一大原因，就是颇具有中华文化的造诣，以致也都具有自然流畅、纵横捭阖的文笔；只有好的文笔才能恰切表达自己的思想、理念。那些别扭、粗率，以致不符合民族风格的词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很难为自己的成果充作载体的。由此，当今的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应该重视写作。

我和作者很早就相识了，那时是60年代，我们风华正茂，还都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随着岁月如流光，现在我们都逾越了三旬，抚今思昔，只有努力加餐，加餐努力。清朝鄂尔泰北固山曾写有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生有涯而知无涯，我愿朱林兴教授在业余时间，继续努力在随笔园地上笔耕，更上层楼，再上层楼。

丽娃河效应

进入 1996 年以后没几天，便应邀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位校友的作品研讨会。这七位作家是：沙叶新、赵丽宏、孙颙、王小鹰、陈保平、陈丹燕、刘巽达。没在这次会上拿出作品的华东师大老校友戴厚英、毛时安等作家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这些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作家，为他们的母校增添了光彩。

华东师大怎么会出产这么多写作高手呢？

有人说，是他们“有生活”。这无疑是有道理的，并且可能是第一位的道理。可是，在大统一的中国，同龄人的经历或遭遇是大体一样的。大家占有的生活是差不了多少的。

有人说，是他们“有才华”。这无疑也是有道理的。这是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因。可是，中国的大学生当中，谁没有才华啊？

会上，我说了一句：“恐怕与华东师大校园里流淌着的丽娃河水的水质有关。”在坐的都笑了。

几天后，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迎春茶话会上，见到了徐中玉教授。他是中文系的老主任。我向他讨教当年培养了这么多有才华老学生的经验。这位以文章优美著称的文艺理论家很朴实地讲了两句话：一是在他们露头角时，我们不设卡；二是当有人对他们的露头角有非议时，我们不理睬。

是的，“不设卡”，不就是解放思想的同义语吗？“不理睬”，不就是当别人关闸时，老师为学生开闸吗？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丽娃河边之所以飞出一群群大雁，是因为丽娃河水是活的，是因为丽娃水的源头是从教师的风骨中流出来的。

1996 年 2 月 28 日《东方城乡报》

赞“年鉴热”

自1979年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百科年鉴》以来，在中国兴起了“年鉴热”。

《中国百科年鉴》是综合性年鉴，可谓时下中国大全。现在，各科开始有各科的年鉴。经济、历史、哲学、文艺、国际形势等方面的年鉴，相继问世。如果把文、史、哲、经等看作母学科的话，现在子学科也有了自己的年鉴，如电影年鉴、戏剧年鉴，等等。年鉴的层次在多起来，年鉴的事业在兴旺发达。

年鉴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年鉴的产生是知识发展的结果。大家知道，近年来，科学在加速度发展，知识的信息量在大幅度增加，各式各样的情报资料和出版物层出不穷。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类报刊也如雪片般飞来。这是大好事。但是，事物的发展无不有个“约——博——约”的过程。试问：报刊再多下去，怎么看得了？于是，高密度、大容量的年鉴便应运而生。年鉴是“知识爆炸”的产儿。是在“博”的基础上的“约”，是更高层次的“约”，是前进。

熔百科于一炉，是年鉴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百科年鉴》固然能把百科熔进去，各种学科的专业年鉴也能熔百科。因为专是相对的。戏剧相对文艺来讲是专了，相对于京剧、越剧、话剧、评弹来讲，又不算专了，要称综合了。人们买到一部年鉴，观百科于一卷，不消说轻松多了。

缩一年为一瞬，是年鉴的又一个特点和优点。一年的岁月不算短，再灵的脑袋瓜儿也无法记下365天中所发生的大事。可是年鉴则把一年中的大事依时间为序分类记录下来。手抚年鉴，仿佛能听到春雷声，秋风声，似乎能听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声。

以一卷当百卷，是年鉴的第三个特点和优点。年鉴不是大杂烩，既不是把一年的事件简单相加，又不是把一年的文献简单汇总，更不是把一年的面貌简单地缩微。年鉴一般附有索引，不，准确地说是附有各类索引。有了各类索引，人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年鉴作广角镜向外延伸。“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管从事什么工作的人，只要学会使用索引，都可以从年鉴中得到跟自己职业有关的教益。年鉴犹如科海中的导航仪器，可以为读者指引研究的航向——尽管它不可能解决全部课题。

年鉴在中国还很年轻。年鉴的编纂和出版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已有的年鉴可能有各自的弱点。现在也许还不是为年鉴写“鉴定”的时候。但是加强对年鉴作用的宣传，开展对年鉴编纂学的教学和研究，已是迫在眉睫的了。年鉴有着自己独特的编纂规律，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作用，这是需要编年鉴、用年鉴的人共同摸索、研究的课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编纂年鉴的同道相互交流，切磋琢磨，各类年鉴的质量一定会进一步提高，年鉴一定会成为众人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年鉴的繁荣是社会繁荣的标志，是我们共产主义实践的一个方面。谁都明白，在动乱不安，朝令夕改，“一天革二十四条命”的情况下，是没法编年鉴的。历史是连续的，年鉴的事业应当是永恒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是推动中国前进的历史，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历史。历史已经记下了这光荣的一页。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面貌还将发生更大的变化。年鉴应该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1982年第3期《年鉴通讯》

建议出版《招呼集》

熟悉的人相见总要打打招呼。尽管招呼里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尽管招呼里没多大信息量，但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招呼能给人带来莫大欣慰。相反的，不打招呼，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不打招呼，往往会给人以痛苦与不安。在现实生活中，在戏剧小说中，因为不打招呼，或未听见招呼而酿成大祸或小祸的事，屡见不鲜。所以，打招呼是世代相传的礼节。

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打招呼”一词进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赋“打招呼”以政治含义之初，听起来颇为舒服。“打招呼”总比训人、批判、声讨、勒令要入耳得多。不过，政治招呼听得多了，就启发人思考一些问题。

社会生活中的招呼一般是“问好”的多，而政治生活中的招呼，却是“问坏”的多。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招呼”一沾上政治就要异化了？

当然，“问坏”的“招呼”如果问得恰到好处，“坏”处，那倒也无妨。如果对众多的“招呼”略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许多招呼是莫名其妙，经不起推敲的。大凡在情理上讲不通的，大凡采用理直气壮的批评行不通的，有些人就喜欢说：“我这里只是给你打个招呼，某某领导不喜欢……请你不要……”“招呼”变成了黄牌警告，变成了“委曲你一下的”的同义词。人应该有经得起委曲的涵养功夫。可是，假若只会吃进委曲而不敢正视是非，似乎也嫌窝囊了些。运动员应该听从黄牌警告，但是，如果裁判员在不该亮黄牌时亮出黄牌，那这裁判又当如何呢？也总该受观众裁判吧！

面对着“招呼”在践踏民主，在扭曲真理的严峻现实，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招呼派打一声招呼：如果你自信你的招呼在理，那可不可以把你的招呼或变成文字，或公之于世呢？还有，可不可以给喜欢打政治招呼的人编一套丛书，每人出它一本《招呼集》呢？《招呼集》一出，保险有人会脸红，有人会……

1989年第4期《上海滩》

学而思

开发精神能源

人类自从与古猿揖别以后，就在创造两种财富：一是物质财富，二是精神财富。这两种财富是相互关联的。前者是根本的，后者也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因此，我们在抓好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应不断提高精神生产率，努力创造精神财富。

在社会制度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物质财富的多寡取决于能源的大小。巧妇不仅难为无米之炊，而且更难为无火之炊。“炊”字为什么从“火”？没有请教过训诂学家，估计同少不了火有关。同样的，精神财富的生产也少不了精神能源。

什么是人的精神能源呢？这就是信仰、理想等。“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没有了信仰、理想，那就是能源枯竭，也即“心死”。心死是最可悲的。心死的人，就是行尸，甚至是连走兽也不如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有着足够的精神能源，换句话说，有着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那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世序》上讲了一个寓言。说是从前有个熊渠子，他夜里走路，碰到一只大虎。他想：要么被老虎吃掉，要么把老虎打死。他决心同老虎决一死战。于是，拉起弓来射了一箭，恰好射中。可是，走近一看，他所射中的不是老虎，而是石虎。奇怪的是：箭居然射进了石头。他想试试自己的力量，退回原处再射，结果怎么也射不进去了。同一个熊渠子，为什么第一次射进了，后来便射不进去了？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他第一次是当真虎射的，精神能源足。后来再射时，不管怎样，心里总觉是假虎，精神能源自然减退，力量也就小了许多。

精神能源能给人以精神力量，还可以举一例。古时候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前，将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分给了大臣。大臣问他：“我王将财产全部分给我们，大王自己不是没有了吗？”亚历山大果断地回答说：“我唯一的财产就是希望。”后来，他确实凭借他“希望即财产”的信念，建立了雄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对波斯王的“希望”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当另作评论，但他的信念产生了力量，总是事实。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大国在闹能源危机。其实，在他们那里恐怕精神能源的危机更严重。正如海外一家杂志所说：“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百多年来都是世界最新技术的领导者，但他们的思想家早就觉察到，他们的‘人’在物质文明之下正面临一个内在毁灭的危机——‘失魂’到‘物化’！”而我们则不同。我们手中有真理，这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前几年做了正本清源的工作，还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接下去就应在实践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丰富我们的精神能源，包括采取各种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力量。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现在有些人就象辛弃疾《丑奴儿》一词中的少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成天价愁，愁，愁，有什么用呢？与其躺着愁，愁，愁，不如站起来干，干，干。尤其是在举国上下已经高度注意开发外在物质能源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充分注意开发自己内在的无形的精神能源。

1980年5月28日《解放日报》

人文科学振兴的必然性

近年来，在上海的高校中出现了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那就是：理工科高校纷纷办起了人文学院。同济大学率先办起了文法学院，辖六个系两个所；接着，华东理工大学办起了文法学院，辖两个系四个所；现在交通大学也正在精心筹建人文学院；还有些理、工、医、农学校也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的振兴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文理本是同根生，后来分了家，并且越分越细，如今已经分化出了数千门。学科的分化促进了学科自身的深化，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知识的分隔和割裂，以及学者视野的狭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整化——分化——再整化——再分化”这就是学科波浪式发展的规律。不用说，与此相对应的教育事业也不可能离开这一规律。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高等学校在近一二百年中，都经历过“分”与“合”的曲折。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整化正在成为当今知识发展的大趋势，成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理工大学办文科，便是顺应这种潮流而生、而长的。

人文学科的振兴是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必然。学生“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考分是容易上去的。可是，从长远看，“单打一”不如全面发展的人成就大。做学问犹如掘井，开掘面太窄，难以打深。素质包涵的方面很多。文理兼通，不管是对学理的，还是对学文的，都是对素质的一种高要求、高标准。一流学者，几乎百分之百是“综合取胜”的。

人文学科的振兴是职业导向端正的必然。长期以来，教育界强调对口培养，用人部门强调对口录用。“对口”来，“对口”去，把学生的知识“口”越封越小。实际上完全对口的事是罕有的。刚录用时对口了，过几天又可能变得不对口了。对口，只能是大体的。导弹打得准，是因为导弹发射的不是一发炮弹，而是一群炮弹。如果对鲁迅、郭沫若强调对口，那么，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史说不定要重写了。如果要孙中山专业对口，中国就少了一位推翻封建、实现共和的大总统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才是真正强调学生的广泛适应性，才是真正的职业导向。

人文科学的振兴是世界观完整的必然。搞人文科学的，如果不懂自然科学，世界观不容易完整；搞自然科学的，如果不懂人文科学，世界观同样不容易完整。不要以为理工科都是研究物质运动和物质结构的，其世界观就一定是唯物的。一位伟人曾一针见血地批评一些自然科学家是：“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认为所有的科学家都是渺小的哲学家，固然是错误的，认为所有的科学家都不是渺小的哲学家，也同样是错误的。自然科学家有了人文头脑，才能够从朴素唯物主义上升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吗？有了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就能够预言基本粒子并非“基本”，还可以再分。少了“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在实验没做出之前，就不敢预言基本粒子非“基本”。“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哲学高度，许多理工医农的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人文科学的振兴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人文科学是一系列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学人文科学，不是要大家都去学某些音乐家的长胡子，不是要学画家的长头发，而是要弘扬人文精神，学习作为人文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真善美。现在是越来越重视道德建设了，越来越重视精神文明了。殊不知离开了人文教育，精神文明是建设不起来的。假如说我们承认过去在精神文明

建设上进展不够快的话，那么应当看到，这同长期的“重理轻文”有直接关系。请数一数报刊上有多少“工程”！精神是工程，思想是工程，政治也是工程，体育有的不叫体育，称“工程”，教育不叫教育，也称工程，就差爱情好像没提“工程”了。怎么会有那么多“工程”？无非是以“理”治“文”的缘故。文、理有相通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完全照治“理”的一套来治“文”，无异于取消“文”。要尊重自然科学，并不等于要搞科学主义，并不是让“工程”把有韵文、有魅力的人和文变成机器人或者机械文。人文科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是精神文明的基石。

理工高校在办人文科学事业，综合性大学更应该办好人文科学院系。这里不存在什么“天赋”。

理工高校在办人文科学事业，并不等于以“文”治“理”，更不等于以“文”压“理”。理工科高校的人文科学应该不是重复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科学，相反的，是要同理工高校之“理工”相结合，办出自己的特色。文科高校是以文为主，兼学自然科学；理工高校自然也应当是以理工为主，兼学人文科学。

1996年第8期《民主》

区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民进中央民主杂志社同一些地方民进组织共同举办了几次区域文化研讨会，受到当地党、政、文各界的好评。我从中“耳食”到许多高见。

文化与地理。地理环境不能决定文化，但是地理能够制约文化。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山兴山区经济，伴随着山区经济而来的是山区文化；靠水兴水域经济，伴随着水经济而来的是水文化。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主动权越少，区域文化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越大。不论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主动权有多大，人类也不会脱离自然。区域同行政区划有联系，有区别。同一个区域可以因同心圆的直径不同而分别属于若干个大小不等的区域文化，也可以因两圆相交而分别属于两三个相邻近的区域文化。

文化与经济。经济基础决定文化。文化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在一定条件下，文化能够决定经济。文化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起飞的驱动力，甚至是持久的驱动力。今日之经济是明日之文化；今日之文化也是明日之经济；经济与文化应该协调发展，同步前进。文化不是生产力。认为文化即生产力，字面上是重视文化，实际上是取消文化。正如矿山不是文化一样。物质本身不是文化。把物质视为文化，岂不是说谁家的现代化家具多，谁就有文化吗？物质固然不是文化，然而，人们对物质的认识则是文化。文化是观念的积淀，是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是无烟工业。文化是资源。把文化资源配置得好，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力，并进而转化为生产力。

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区域文化一般说是亚文化。亚文化从属于主流文化。在亚文化里有大量主流文化的成份。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是不存在的。区域文化在单一民族的区域可能等同于民族文化；在多民族区域，区域文化并不等同于民族文化。主流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发展进程，有先有后；二者间的差距大小不一。大体同步者有，相距甚远者也有。

共同性与独特性。在文化上，没有显著的独特性便不成其为区域文化，也没有必要硬是划出一块区域文化来。一个地区只要在人口素质、社会心理、风俗习惯、观念体系上同周围地区有所区别，便能构成独立的区域文化。可是，这种独立性是相比较而言的。此一区域的区域文化同彼一区域的区域文化会有大量的相似之处。中国的每一区域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都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光辉闪耀在每一区域文化之中；透过每一区域的区域文化能够看到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灿烂。

冲突与融合。地区是封锁不住的。所谓封锁，只能是暂时的。区域之间迟早是要交流的。“一河之隔，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五十多亿人口是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的。区域之间的交流无不是双向的。多数是高处往低处流，可是一旦有了文化的“虹吸管”，也会低处向高处流。区域文化间的交流，时缓时急。缓，交流起来有序。但交流有时表现为冲突、冲撞。可是，冲突也是一种交流，也会导致融合。冲突之前有融合，冲突过后有融合，在冲突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一点融合。冲突时冒出的火花，有时恰恰表明焊接正在进行中。“你吃掉了我”说明你强大，但是不要忘了，你同时，也在学习我，吸收我的文化。“胜者”有“为王”的一面，在文化上，也有胜者为“学生”的一面。

继承与变革。区域文化演化的过程是一个去粗取精的发展过程，是动态的前进的过程，可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区域文化都是有粗有精，有优有劣。有优，就很容易有与此优相关联的劣。优与劣都是有条件的。随着条件的变化，比如随着社会制度的更迭，有些优可能依然为优，甚至于变得“更优”，可是，有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优，也可能转化为劣，转化为阻碍时代前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父母在，不远游”，无疑是敬老的美德，可是在市场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下，“不远游”就办不成大事了。你不远游，父母也会动员你，帮助你远游了。研究是为了借鉴。有远见卓识的人要善于捕捉优劣之间转化的火候。全盘继承是不可能的，全盘否定也是不科学的，粗暴地否定那更是无知的表现。古往今来没有不变革的传统；普天下也没有无继承的变革。区别无非是在于侧重点不同而已。在当前体制转轨的时期，需要强调的是变革文化观念，要有序地、按照历史规律来变革文化观念。抓住区域文化，跳开区域文化。

多元与一体。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都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腔，不是一个样。从形成过程看，一般是多元一体；从形成后的稳定结构看，是一体多元。一体的结构久了，必然会冲破一体，出现多元，进而形成多元一体，变非主流文化为主流文化。“多”是文化的差异性；“一”是文化的统一性。“一”中有“多”，“多”亦有“一”。“多”在发展中是活跃的因素，排斥“多”，不利于提高“一”的水平。“多元一体”——“一体多元”——再“多元一体”——再“一体多元”，是区域文化波浪式发展的一个规律。

1995年12月15日辽宁《友报》

谈“接轨”

从一本刚拿到手的公开刊物上，读到一篇批评“接轨”一词的文章。作者写道：“什么叫‘转轨’，什么叫‘接轨’，转到哪个轨上去？同哪个轨相接？现在国际经济的主要轨道就是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轨。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能够同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完全对接吗？”由此推理，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我想这样的词儿还是慎用、少用为好。”

“转轨”、“接轨”都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出现比较多的几个词儿，也可以说是“开放”的又一通俗说法。道理很清楚，倘若不能接轨，如何开得进，如何放得出？在提倡“接轨”的改革者当中，我从未听说有什么人主张“完全接轨”。前苏联的铁路干线采用的是 1524 毫米的宽轨距，美国、加拿大采用的是 1435 毫米的标准轨距，怎样能完全接轨呢？何况有的国家，像日本就有两个铁路系统，有窄轨，有标准轨。谁又能用一种轨同他们的两种轨去接呢？资本主义国家有资产阶级，有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同的，但二者之间也有人类社会的“一般”。总是有个性，有共性。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免不了要经常走在同一个轨道上。要不，我们为什么要加入联合国？无轨可接，如何开展国际往来？至于说我们将实行“一国两制”，那就更加需要同各种轨相接了。就拿市场经济来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有多种，有八种说，有十一种说，我们出于中华民族的利益，发展我们的经济，按照国际惯例必须分门别类地同他们接轨。发展双边关系，这与社会制度有何相干！“接轨”，这与社会制度有何相干！岂有少用之理！

看了“慎用”、“少用”接轨的提法以后，当我走在每次上班必须经过的淞沪铁路上时，想起了“拆轨”的故事。我工作的上海大学文学院坐落在江湾。1876 年这里通上了火车，堪称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可是，第二年就被清政府拆了。20 年后重新修复，没再用原来的窄轨，改成了标准轨，即“车同轨”。1958 年人民政府又修一次，延长一点，使之同国内各条铁路接上轨了。轨，可修，不可拆。

1997 年 4 月 2 日《东方城乡报》

科学的生命在于真

1911年，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进行了一次油滴带电实验。根据实验提供的数据，计算后发现油滴所带的电荷中有分数电荷。就是说，发现了比电子的电量更小的电量的存在。当时，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电子的电荷量是电量的最基本的单位，任何电量都必定是电子电量的整数倍。分数电荷的存在在当时是无法解释的。许多科学家在处理实验数据时，舍去了这些令人讨厌的分数电荷，把它们当作实验误差来处理。舍掉这些分数电荷固然能使实验结果非常完美，但却失去了真实。密立根没有把这些偶然的、不可思议的分数电荷筛选掉，而是忠实地记录了各种原始数据和分数电荷的存在。他认为，真实，乃是科学的生命。五十年后，他的实验进一步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所证实。人们十分钦佩密立根忠于事实的科学精神。

真实，不仅是科学的生命，也是科学家的生命。19世纪，德国有个教授喜欢收集化石。也许是出于妒忌，他的两位同事派人在石头、骨头上刻上许多原始图画，伪装成原始人的雕刻品卖给教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教授没有及时识别，经过收集整理，出版了这些化石的研究专著。

后来，他收集到一块化石，上面居然有他的名字。此时，教授才知道上了当。专著中研究的化石，也都是伪品。他认为，化石既然是假的，专著还有什么价值？不能把假的东西长留人间。于是，他耗尽家财，把出版的专著一一买回烧毁。真实，是科学家的良心所在，生命所系。可以设想，把这些假东西流传于世，将给他带来多少痛苦！

科学必须真实，真实是科学的起点。与此相反，假科学则是不真实的。1911年，英国律师道生骗走了工人发现的几块古人类头骨碎片，又找来一块黑猩猩的下颌骨，用锉刀锉平了牙齿，再用高锰酸钾加以染制，把它埋在工人们发现化石碎片的地方，然后装模作样地挖掘。他把工人们挖掘到的碎片和自己埋下的下颌骨，一起送给了英国著名解剖学家伍德华德和古生物学家纪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瞒过了两位科学家的眼睛，假化石被定名为“曙人”，说成是人类的祖先。一度以假乱真，谬种流传，害人不少。但是，四十年后，经过现代化的科学测量方法，发现下颌骨是现代黑猩猩的，终于揭穿了这场骗局。道生“曙人”从反面告诉我们，虚假是科学的大敌，真实才是科学的生命。

真实是科学的生命，同样是科学普及的生命。科普是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它必须真实。如果不真实，那就是普及虚假的东西，就会使读者真假不辨，是非难分，这显然是与科普的目的相违背的。

那么，怎样保证科普文章的真实性的呢？

首先，要注意内容的真实和因果关系的真实。科学研究的基础是事实。因此，事实不能杜造，不能失真。有些科普文章谈到医生见到了鬼魂，故宫宫墙上出现宫女婆娑的舞影，结果都经不起调查。如果把这些不真实的东西当成事实，危害是很大的。即使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我们也要用真实的原因来说明它，要真实地揭露事物的因果联系。有篇科普文章说，杏树喜淫，如果树上挂了处女的衣裙就会结果累累，由此说明草木有情。这或许是个偶然的事实，但决不是真实的原因。用这种虚假的原因来说明，也是有违于科普的真实原则的。

其次，不仅对事物的质的描写要真实，对事物量的描写也要力求真实，

不能扩大或缩小。过去，在一些科普文章中把干扰素说成是万能良药，把红茶菌说成无所不能，把鸡血疗法说得神乎其神，这都失去了真实性。其实，世上万物有其长必有其短，有所能必有所不能。如果不正确地描述事物的优劣利弊，事情就会变得不可信。

科学的力量在于真。只有真实的科普作品，才具有生命力，才能使科普作品更上一层楼。

1982 年第 12 期《博物》

科学的巨人文笔的矮子 ——朗道轶事

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是本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因在金属理论、理想气体的抗磁性研究和量子力学等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而荣获诺贝尔奖金。

但是，这么一位堂堂的大物理学家，语文知识却差得惊人。比如说，有人问他莱蒙托夫的名作《当代英雄》表达了什么思想，他摇了摇头说：你去问莱蒙托夫吧。在评论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中人物达吉亚娜时，他只写了一句话：“总的说来，她是个讨厌的人。”特别令人惊奇的是，26岁时他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但是，他没有写论文。他不善于写作，自然也就没有论文了。朗道一生的许多著作，几乎没有一篇是他自己写的，全是与别人合写的——构思是他的，动笔是别人的。如果朗道找不到既懂科学，又会写作的合作者，那么，洋洋几十万字的《理论物理学教程》就不可能问世。

我们非常钦佩朗道求学时的老师和校长。他们没有因为朗道语文水平太差而卡他的脖子；我们更敬佩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先生们的勇气，敢于授一位没有论文的学生以博士学位。他们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尊重人才的特点，善于发现人才的长处，没有按照世俗的眼光看待朗道。要不然，甭说得学位，就是升级、考大学恐怕也是很困难的。

物理学上常常讲到“理想气体”、“理想实验”。但是，真实的气体总是不够“理想”的，因而对气体运动方程要加上某些修正；现实中的一切实验也是不完全“理想”的，所谓“理想实验”，也只能在思维中进行。对于科学人才来说也是这样的，十全十美的人才是没有的。爱因斯坦中学时数学学得很出色，但拉丁文、生物学却知之不多，以致第一次考大学就落了榜。达尔文是神学院学生，对生物学有着广博的知识，但对神学却不甚了解。遗传学的创始人孟德尔曾两次参加选中学教师的考试，都没有被录取。可见，要求人才面面俱到是很难办到的。

科学人才像锥子一样脱颖而出，就在于他对某个领域有着极浓厚的兴趣，有过人之处。倘若要求他成为多面手，对不感兴趣的东西，硬着头皮下功夫，自然就会抑制他的长处，使他穷于应付，其结果就会变成一个庸才了。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虽然我们不能苛求朗道应具有文学家的水平，但语文毕竟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应具备的最起码的知识。缺乏语文知识，对朗道来说不能不是一件憾事，否则的话，他可能比现在干得更出色。朗道，在语文上努一把力吧！

1981年第10期《视野》

居里夫人的手

居里夫人是现代科学史上灿烂的明星，她和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一起首次发现了钋和镭，开创了放射学，获得了崇高的诺贝尔奖金。后来，居里夫人又单独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金和其他形式的八种奖金。她一生获得的世界各国授予的荣誉称号有一七种之多，奖章有三十二种。居里夫人在科学上的辉煌成就，不仅要归功于她那勤奋的和善于思索的头脑；而且还要归功于她那双勤劳的、不平凡的手。

这双手，是值得人们钦佩和赞美的。

据居里夫人小女儿艾芙回忆说，她的母亲是在疗养院的病床上逝世的。母亲的遗容显得“平和、庄严，而且勇敢”，“她是世界上最美丽最高贵的人”。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她那双粗糙的手，胼胝、坚硬，被镭烧得很重，已经没有它们一向痉挛的习惯。它们伸在被单上，僵直，一动不动。”

令人钦佩，也令人惊讶：一个从事脑力劳动终生的女科学家，怎么会生着一双体力劳动者的手呢？

看看居里夫人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就知道这双不平凡的手，承担着多么繁重的劳动。

当居里夫人还是姑娘、人们都称她玛丽·斯克罗多夫斯卡的时候，她正在巴黎索尔本学院读书。那时，她已经承担着法国国家实业促进委员会交给的研究各种钢铁磁性的任务。她自己做着实验，酸液浸蚀着她那本来是细嫩的手。因为经济上的困难，她还得自己烧饭、洗衣、缝补，料理自己的生活，这更增加了她那双手的负担。当她在一个流亡法国的波兰教授家里，与她未来的丈夫和同道者皮埃尔·居里第一次见面时，不仅她那好学的精神、端庄的风度、美丽的仪貌，深深地吸引着这位三十五岁的男科学家，而且她那双被酸液浸蚀和被劳作磨炼得粗糙的手，更引起了居里的重视，他凝神注视好久。就是这双手，在以后的四年岁月里，在居里的理化学校里那个阴暗潮湿的小木棚中，她承担着“男子的职务”，一公斤一公斤地提炼了几吨重的铀沥青矿渣。在院子里，她一面烧火，一面用一条与她的身体差不多大的铁条，不断地搅拌那些沸腾着的黑色浆液。一连几小时不停地搅拌着，倾倒着，精疲力尽地坚持着。有时，需要在棚屋中提炼，室内又无烟罩设备，忍受着铁屑煤末和灰尘的袭击。为了使实验不中断，她还得在小棚屋中就地准备两人的饭菜。她一个人，既“开工厂”，又“办食堂”，既是学者，又是专门工人和技师，还兼着搬运的“苦力”，真是一身数任焉！风吹、日晒、烟熏，使她的手变得更加粗糙。经常接触和拿动装有镭的玻璃试管（尽管是封闭的），镭射线烧坏了她的手指，指尖发炎，手上脱皮，有时起泡出水，有时又变得坚硬干枯。手指变得弯曲起来，而且是经常痉挛着。如此苦战了四十五个月，终于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一克的镭。从几吨重的矿渣中，精心提取一克物质，这要多少次搅拌，多少次筛选，多少次拿动呵！四年中，她的体重减轻了七公斤。即使在后来，居里夫人的工作条件好转，有了助手之后，每次实验，她总是亲自动手，不用旁人代劳。亲手做，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这双手，即使在离开实验室回到家里的时候，也仍然是不停地劳作着。她一边看书、写作，一边做家务、照料孩子。若是有熟悉的客人来访，她常是一边陪着聊天，一边给孩子剪裁和缝补衣服。到了晚年，有时在劳顿之余，偶尔到乡间小憩，到海滨游泳，她也是常把待改的小样，随身带着，随手修

改。就是在散步时，她的手也不会闲着。有时，拿着小铲子，到花间铲土；有时，用大剪刀修剪树枝，她常常穿越在金雀花和蔷薇花丛之中，被荆棘划破腿，两手沾满了土，扎满了刺，或者扭伤了足踝。有一次，不小心，差一点用铁锤砸碎了一个手指。这就是这双手的“业余”休息。

居里夫人是非常鄙弃荣誉的，似乎她的那双手也懂得了主人的这一性格。她曾说过这样的话：每当人们用盛典来欢迎她时，她感到不舒服，甚至恐惧，使她的咽喉发干，而她的那双手呢？既不是潇洒的招手，也不是热烈的鼓掌，而是感觉到“冰冷”！一九二一年，她应美国妇女界的邀请访美时，一位负责接待的夫人为她赶制当时按规定只有教授才能穿的一种长袍时，她一面试穿，一面表现出很不耐烦。她看到自己的手，想出了一个理由说，绸缎衣料对她那双被镭灼伤过的过敏的手有刺激性。她的这双手，又成了她逃避荣誉的助“手”！

尽管如此，荣誉的浪潮，还是不断地袭击着她的那双手。在访美期间，一批批的欢迎者慕名而来。其中一个狂热的人，由于太兴奋，在同她握手时，用力过猛，致使她的手指受伤。在以后的旅行访问中，不得不把手腕缠上纱布，手臂悬吊在绷带中。这是荣誉给手带来的“灾难”。当美国哈定总统亲手将美国妇女的捐赠款所买来的一克镭赠给居里夫人时，她也致了简短的谢辞。接着的仪式是一批美国贵客，列队依次同她握手。因为手伤的关系，居里夫人不得不让女儿代表她本人同这些美国的名人们一一握手……

在居里夫人的辉煌成就中，她的这一双手，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科学家的头脑，劳动者的手，真是“得心应手”呵！

如果搞科学工作的人，不仅有着一个勤奋的善于思索的头脑，而且还有着一双辛勤耐劳的居里夫人那样的手，那么，他或她，就一定能够从真理之树上，摘下累累硕果！

1979年12月10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

在宇宙大爆炸面前

不久前，科学家从人造卫星自动记录下来的材料中，惊奇地发现在河外星系大麦哲伦云中，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这次大爆炸持续的时间只有 1/10 秒，但释放出来的能量，却相当于太阳释放能量的 1000 亿倍，是有史以来人们所见到的一次最剧烈的爆炸。幸好大麦哲伦云离开地球有 18 万光年（即 1.7028×10^{18} 公里），地球才免于遭殃。如果同样能量的爆炸发生在银河系里，那么地球大气层将变得灼热；如果是太阳喷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地球就立刻气化。因此，有些科学家被这次大爆炸震惊得目瞪口呆。

其实，在茫茫宇宙中，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爆炸是此起彼伏，时断时续的。夏夜常见的流星下坠，也是一种爆炸。最大的爆炸要数宇宙大爆炸了。宇宙大爆炸所指的“宇宙”，仅仅是人们目前所能探测到的范围。它的距离尺度为 100 亿光年，它的时间尺度为 100 亿年，大约只包含 1 亿个星系。宇宙大爆炸大体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是温度从 100 亿度以上，下降到 100 亿度左右时，中子开始失去自由存在的条件，或者是发生衰变，或者是与质子结合成重氢、氦等元素。我们通常讲的化学元素，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从此以后才开始形成。二是温度下降到 100 万度后，早期形成化学元素的过程基本结束。宇宙间的物质主要是质子、电子、光子和一些比较轻的原子核。三是当温度继续下降到几千度时，辐射减退，宇宙间主要是气态物质，气体逐渐凝聚成星云，再慢慢形成布满空间的恒星体系。如果没有宇宙大爆炸，就没有今天的银河系，更不会有今天的太阳系。说到这里，我们不仅不应当惧怕宇宙大爆炸，相反却应当感谢宇宙大爆炸。宇宙大爆炸是人类的催生婆，假若今日之宇宙还在 100 亿度，生物会出现吗？

当然，在宇宙间，有地球这般得天独厚条件的天体不多。据 1978 年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测定，微波宇宙背景辐射只有 3K。这就是说，宇宙爆炸到如今，余热已经不多了，微乎其微。目前我们的宇宙，基本上是稳定的。

1980 年第 12 期《科学画报》

野蛾扑窗之类

听说，老科学家朱洗，为了驯化蓖麻蚕，使它适应我国的气候条件，按照人们的意志繁殖，做了很多杂交实验，都没有达到理想的要求。有一天晚上，纱窗外几只野蛾突然慕灯而来，不断地在窗上扑撞。他灵机一动，捉住飞蛾同蚕蛾交配，结果成功了，完成了很久没有完成的工作。

野蛾意外地送上门来，这可以说是偶然的巧合。不过，再仔细地看一看朱洗先生入迷似的研究活动，又觉得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了。科学家整天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假日也常常在显微镜旁边度过，甚至连安排好了的青岛休假也谢绝了。

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蓖麻蚕可以驯化，这是必然的。但是，在什么时候成功，是靠野蛾自动飞来还是去到外面专门捉来，在哪一位科学家手中成功，等等，则是难以预计的了。我们既不能因一切事物都受必然的规律制约，就认为人们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俯首甘受必然性的支配；同时，我们也不能抹杀事物发展的真正原因，心存侥幸，幻想“野蛾扑窗”的偶然成功机会。

做好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必须下一番苦功。坐等必然，幻想偶然，都将一事无成。野蛾扑窗似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却不知在这之前，科学家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实验——“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苦历程。若是没有多次杂交的失败，即使有再多的野蛾扑窗，谁又会想起把野蛾捉来同蚕蛾交配呢？清末大文学家王国维曾经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阶段：“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阶段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段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段也。

正如同蓦见野蛾飞进来一样“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看来也是得之偶然，其实却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必然结果。

1961年10月23日《解放日报》

为观念的短命而欢呼

近年来，观念变革已从报纸标题变成了家家户户谈论的话题。这是改革的好兆头。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离不开先进观念的引导，都要靠先进观念来巩固。观念不变，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也会得而复失。

既然观念变革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我就想在观念变革时，提出以下一个命题：观念的寿命在缩短。

不是么，没提出观念变革时，观念也是在变的。说得再远一点，在“观念”这一概念出现以前，或者说，在人们还不知道观念为何物时，观念就在变了。

就拿家庭观念来说吧，血缘家庭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能维持多少万年，是同有一种与血缘家庭相适应的家庭观念分不开的。普那鲁亚家庭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能存在多少万年，是同有一种与普那鲁亚家庭相适应的家庭观念为之服务分不开的。还有对偶婚，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绝迹，也是因一种与对偶婚相适应的家庭观念的支撑分不开的。

我曾在处于对偶婚阶段的几个民族中作过调查。如果把在他们那里司空见惯的家庭观念说出来，保险会有一大批人不敢相信。

有一个对偶婚民族，聚居在两个县。这两个县，所有的夫妻从来没有吵过架，甚至彼此间连“高声”（即嗓门响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因为，稍不如意，就离婚。频繁的离婚是夫妻和睦的前提。决定离婚后，相互会送上一程又一程，临别时还会说“苏巴苏巴”（再见）。

还有一个对偶婚民族，一个男人的许多女“朋友”之间，从不嫉妒；一个女人的许多“男朋友”之间，也从不嫉妒。为什么？因为，遍地都是“朋友”，找“朋友”是举手之劳。

还有一个对偶婚民族，抱着娃娃谈恋爱，不抱娃娃就没资格谈恋爱。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歧视非亲生子的现象？没有。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这种念头。他们的观念是：亲生与非亲生都一样亲，甚至认为非亲生比亲生更亲。

我亲眼看见，就是这些观念的存在，巩固了对偶婚；当然，首先是由于对偶婚的存在，产生了这些观念。

且不说对偶婚及其观念的优劣，我想说明的是：正是对偶婚制，结束了群婚制。我想说明的是：就是这种对偶婚制，后来又被我们现行的个体婚制所代替。

天下没有永恒的观念。不管为多少人信奉、称道的观念，迟早要消亡。不管它在人类历史上起过多么大的推动作用，迟早要消亡。

但是，观念消亡的速度并不是一样的。血缘家庭观的历史比普那鲁亚家庭观的历史要长，约有上百万年。普那鲁亚家庭观的历史又比对偶婚观要长，约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就是在进入个体婚阶段以后，个体婚的家庭观也曾发生过“部分质变”，其变速是加速度增长的。

“李杜诗篇万口传，而今已觉不新鲜。”李杜距离今天多少年？不过千把年吧？

前些时候，有人说：“各领风骚二百年”，这就客观多了，是对的。二百年就是二百年嘛！比历代的“万岁”要短多了。

最近又有人提出：各领风骚“没几年”。听说，有人觉得受不了。有什么受不了的。观念寿命的缩短，是好事情，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观念

是第二性的。观念寿命缩短，是社会加速度前进的反映。社会进步得快，有什么不好？社会为什么会进步快，那又是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加速度发展的结果。生产力发展快一点，有什么不好？科学技术发展快一点，有什么不好？

科学技术加速度发展是近一二百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大特点。大家想想看，从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经过了多少千年，可是，从蒸汽机时代到原子时代经过了多少年？从原子时代到计算机时代又经过了多少年？也就是几十年的光景。可见，观念的变速是有物质基础的。

有些人总希望自己所信仰的观念能永恒下去，其实这是同我们所信仰的辩证法相悖的。辩证法可能是寿命最长的一种观念。但是，就是这种观念已经并且正在丰富、变更自己的内容和形式。

“一切皆流”。观念在流。流行在我们中间的传统观念将流向何方？这是值得作为有思想的动物的人认真思考的。不让它流，怕它流得快，怕是一种愚昧。——我坚信。

1986年第11期《现代家庭》

周期律的“泪”

国庆假日，同一九四五年出版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的原国讯书店经理尚丁先生聊天。话题很自然地扯到那个周期律上。我俩就这个问题不知议论过多少次了。不过，议论得比较细的，要算这一次。尚丁先生不但讲了很多《延安归来》里面没有写上的毛泽东同黄炎培交谈的情况，还讲了《延安归来》出版后毛泽东有关周期律的言论。从而使我对周期律的认识进了一步。

一个政权、一个朝代，是不是存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回答应该说是肯定的。秦始皇“兴”时，统一了文字，统一了中国，够“勃”的了。可是，后来他“忽”了，鱼肉起人民来。民不聊生，陈胜揭竿而起，刘项乘机灭了秦。汉代“文景之治”可谓“勃”了，“光武中兴”继续“勃”了下去，轻徭薄赋，惩治腐败，提倡廉洁，可是后来呢？后来“忽”了，外戚专权，宦官当政，贪污横行，贿赂冲天，黄巾、赤眉一起，汉王朝亡了。周期律难过啊！周期律无情啊！

可是，那无不是在封建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不同于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正如毛泽东对黄炎培说的：我们有新路。我们有民主，我们“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敢松懈”，“我们能跳出周期律”。多年来，我们以“能”而自豪，以“能”而自勉。

“能”是目标，“能”是“决心”，可是，“能”并不是唾手可得的。我们在明确了“能”以后，更要看到“难”的另一面。难，四年后难得毛泽东为跳出周期律流了泪。在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暗暗地流泪。毛岸英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他想起了与黄炎培的谈话。是的，周期应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算起啊！领袖的泪，周期律的泪，为跳出周期律之难而流的泪。

难，从建国几十年的历史看，确实难。不是吗？在他流泪不久，就出了刘青山、张子善。在他活着的时候，横行霸道的“四人帮”不就是“宦官专政”吗？包括毛泽东本人，不也有不给人家民主的时候吗？毛泽东虽然认为民主是跳出周期律的起跳板，但是，他始终没有把民主科学化、制度化。事实很清楚，低度民主就带来高度腐败；高度民主只会有低度腐败。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低度民主就带来大面积肌体的死亡；高度民主只会有小面积肌体的死亡。

不同的社会制度有本质不同的地方，同时也应该看到人类社会就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之间也有共同之处。差异决定了我们能跳出周期律；共性决定了我们难跳出周期律：第一是“能”，第二是“难”。在战略上要坚持“能”；在战术上要看到“难”。要笑看周期律，要泪对周期律。这才是两点论。只看到“能”，忘记了“难”，是片面性，是简单化，是不成熟的表现。成熟的政治家，更着重在解决“难”字上下功夫。把化学元素系统化的那个周期律也是经过近半个世纪才算完善起来的，其中有德、英、意、俄等许多国家的科学家的汗水。我们中国要跳出政治上的周期律，也要有各民族、各阶层、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才行啊！

1997年3月5日民盟《上海盟讯》

具体性之歌

真理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字眼。

真理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求得真理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真理是衡量人生价值的砝码。谁为探求真理贡献大，谁的人生价值就价值连城。

真理是力量。哪个阶级手中的真理多，那个阶级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力量就大。抓住真理，所向披靡。

真理是时代的权威。对真理倘有半点不诚，即使站在真理面前，真理也不会朝你微笑。

真理是公正无情的法官。他判你有错，你就有错；他判你无错，你就无错。他说一不二。

真理是人类的慈母。一旦投向真理，真理就会让你饱尝乳汁，哺育你健康成长。

但是，真理并非法力无边。真理也有真理的难处。

地点是真理的围墙

真理是分层次、分侧面的。有的真理管得宽，有的真理管得窄。但是，覆盖面再大，也不能覆盖无边。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放到第五海，则未必有用。

在此处为真理者，在彼处可能为谬误。

麦子，在我国一般是冬天下种。这是真理。可是，如果把地点向北一移，移到北大荒，麦子则要在春天下种；如果再往南一移，移到岭南，说“阳春三月种麦子”，就要被那刘三姐嘲笑了。

老虎吃人，这是老少皆知的真理。可是，把野生的老虎关进动物园，关上几代，从来没见过祖先吃人的老虎，不会主动伤人。就连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还摸过动物园里老虎的屁股。

开水能煮鱼肉吃，这是真理。可是，把烧开水的地点往上一移，移到高山上，开水就会连鸡蛋也煮不熟了。

还有伦理道德，也是有很大空间效应的。

在我们国家，问年龄几何，是关心人的表现，可是在欧美，问女性年龄却是不礼貌的行为。

在有些国家里，青年人在经济上依赖父母是耻辱。不少人在上中学时，就不再向父母要钱。可是在我国，许多青年人在就业以后，在有了儿女以后，还要从各方面向父母伸手。

至于说，在他那里是天经地义、习以为常的事，在你这里可能是大逆不

本文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压在喉咙口的一支歌。大约是在1961年，我在《解放日报》发过一篇《画松说》，强调具体性。历史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认为讨论真理的具体性，其意义不下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另外，我也认为，以“歌”代“论”，也许是写好论文的一种尝试。总之，我自以为这篇是得意之笔。可是，不知为什么，文章发表后除了收到几篇来信外，反响极小。我至今还在思考其中的缘由。

道、十恶不赦的罪过，也不是罕见的。

地点是真理的围墙。这围墙既有助于真理坚守阵地，也有碍于真理的广泛应用。

时间是真理的升降机

时间能使真理贬值。

在远古的血缘家庭中，兄妹成婚是完全合乎道德的。可是，在今天的个体婚阶段，兄妹成婚则是非人性的。

在生产工具落后的小农经济中，多子多福是真理，多子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在今日之中国，多子，于己、于国都不利。再宣扬多子多福，是有害的。

当然，时间有时也会使真理增值。

自由恋爱，古已有之，但是在封建社会是要遭鞭打的。可是，自从推翻封建社会以后，近几百年，恋爱成了讴歌的永恒题材。

商品经济，曾为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忌。在我国，不久前还有批商品经济理论的文章。可是，曾几何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写进了党中央的决议，普及到人们心中。

真理不会被敌人打垮，却能被时间拖垮。真理会赢得时间，也会消失在流逝的岁月中。

真理随条件

真理是有条件的。空间是条件之一，时间也是条件之一。除了时、空以外，还有许多条件，如阶级条件、社会条件等。人们常说真理有阶级性，这就是指真理具体性在阶级关系中的体现。条件会约束真理，条件会解放真理。真理会随条件的变化而转移。

我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因为这是真理。可是，有不少植物是喜阴畏阳的。我亲眼看见，在篷遮住的胡椒，叶子是碧绿的；而篷子遮不到的胡椒，叶子是枯黄的。

我们常说：“茂林之下无丰草。”因为这是真理。可是我亲眼看见，对健胃有奇效的沙仁，只有种在望天树下，才能在地下结出累累的沙仁。如果不种在树下，叶子会变黄，沙仁会变少、变小。

我们常说：“水往低处流。”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只往低处流，还能引水上山吗？还能引水进城吗？水能上山，能进城，并没有改变水的特性，只不过是改变了水流的条件。

我们常说：“反对一切向钱看。”这是对的。一个“一切向钱看”的人，还像人吗？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但是这句话的正确性，是以“一切”为条件的。倘若不是“一切”，比如说，在经营管理中能不向钱看吗？

我们常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的。不过这是在没有桥、没有船、没有直升飞机的情况下，才适用的。另外，也只有过小河时才适用。过大江、越激流，就要靠桥、船、飞机了，就不能摸着石头过了。

条件之于真理，犹如土壤和气候之于植物。不同的土壤适宜种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气候适宜不同植物的生长。

条件之于真理，犹如食物之于动物。让食肉动物食草难，让食草动物食肉，也难！

真理随条件，这就叫真理的具体性。真理的具体性是由事物的多样性这一条绝对真理决定的，是由物质的运动性这一条绝对真理决定的。因其多，就要求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因其动，就更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具体处理。

愿普天同用具体性

真理的具体性是真理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真理的活力、威力之所在。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尤应重视真理的具体性。三十年来，我们的每一失误，无不与忽视真理的具体性有关，无不是因为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忘掉了真理的具体性这一真理。大呼隆，一刀切，大多是出于对真理具体性的无知和藐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有很大好转，但是，无视真理具体性的现象，并未绝迹。反不正之风是应该的。可是有的地方把拥有千百年历史的不正之风，也一古脑儿说成是“新的”不正之风，认为是改革带来的。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有些地方并不是在继续改革、深入改革、完善改革中来解决，而是用停止改革来应付、周旋。

坚持真理的具体性，头脑就不会僵化，就不会唯书搞教条主义，就不会照搬老一套搞经验主义，就不会听到风就是雨，就打雷，搞唯上主义。

坚持真理的具体性，在理论上就敢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敢于冲破马克思主义中过了时、与今天情况不相符合的观点和理论。与此同时，当有人讲马克思主义不灵时，你就不会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不灵，而是他不会具体分析、具体运用。

当然，要坚持真理的具体性是很难的。这就要求我们走到哪里，就调查到哪里，思考到哪里，就要求我们把大脑搬回到自己的双肩中间。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开拓、开明、开通、开朗。“一刀切”固然要用气力，但要比具体分析省力得多。具体性是一把万能的钥匙，但是只有勇士们才能拿到这把钥匙。懒汉是摸不到具体性的边儿的。愿普天下的开拓者同学具体性，同用具体性，同庆具体性具体性万岁！

关于学术生态环境

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

最近我在与学术界朋友接触的过程中，在向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学者讨教的过程中，不知怎么常把话题扯到学说、学派问题上。大家认为，多年来，我国不论是自然科学界还是社会科学界，被称为学说、学派的太少。有几个用中国人姓氏命名的定理，有的也是国外先喊出来，我们才跟着讲的。

难道我们的学说、学派真的就那么少吗？当然不是。在天文学中，我们有自己的太阳系演化“学说”；在地学中，仅对大地构造的看法，中国至少有五个“学派”（此处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尚未公认）；在哲学、经济学、史学中，客观存在着的学说、学派则更多。学者们所受教育不同，从事科学研究的环境不同、角度不同，各人抓住研究对象的侧面不同，采用的研究手段、方法不同，学者们个人的素质、品格不同，如此等等，都会带来不同学说、学派的不断产生。科学是运动的，发展的。科学在运动中，自然会出现参差不齐的学说、学派。各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交叉日益加剧。在各学科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也自然会有不同学说、学派的产生。从小学科向大学科发展，是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大学科需要大集体攻克。这也是学派层出不穷的原因。现在有些发达国家学派林立，不是偶然的。中国无学派不是中国学者无创见，而是未被戴桂冠。

对学说、学派采取不承认主义，理由无非是这么几条：

一曰“前人说过”。前人说过一句，与今人写出的一叠，不只有量的差异，更有质的区别。难道能因为《吕氏春秋》中讲过“日月之行”就认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马后炮吗？谁都不否认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但是有朦胧进化意识的，又岂止早于达尔文几百年！萌芽与开花毕竟不同。不能抓住死人的片言只语，就把活人的创见说成古已有之。

二曰“还不成熟”。成熟？老实说，天下无成熟之学说。牛顿的学说算成熟了吧！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比一比呢？不用说不成熟的学说，就是有错误的学说，只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只要能一以贯之，能在一定范围内自圆其说，就可以称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荒谬之处少吗？可是我们还不是照样称其为学说！现在有些人热心于把外国的一些零乱学说加以介绍，哪怕它有严重缺陷也能宽容，这当然没什么不好，可是为什么对自己同胞兄弟提出的新学科、新学说，哪怕是一个新概念，却要苛求呢？

三曰“门户之见”。不听正确意见的门户之见固然要反对，可是，专家之所以是专家，就是因为他是一门学科的里手。他专一门，就得容许他从那一门里跑出来发言。局限性人皆有之。各门讲各门的，各户讲各户的，把千“门”万户综合起来，不就全面了吗？只有无分析综合能力的人才怕人家讲门户之见。

本文原载 1984 年 10 月 24 日《文汇报》。自 1985 年 1 月 7 日起，《文汇报》就学说学派问题展开讨论。先后发表了冯兰瑞的《主要是学术民主问题》，顾昕的《提倡自由讨论的治学方式》，羿江的《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叶向平的《要重视学术自由问题》，晓义的《以阶级分“百家”是学派少的根本原因》，马勇的《学派形成与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等文章。文汇报内刊《理论探讨》也同时就拙文展开讨论。有些报刊报道了讨论综述。

不愿或不敢扶植新学说、新学派，是在理论上搞庸俗的平均主义。这，似乎也应当属于改革之列。对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来讲，关心学说的命运甚于关心房子、票子。学说是知识的精华。有学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华。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又再一次强调了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真正尊重知识，就应该首先要尊重学说，要真正尊重人才，就应该首先尊重各个学派中的人才。

为了振兴学说、学派，我建议：一、切实贯彻“不同理论观点可以展开讨论”这一条，不要到处搬用“实际上是两家”的旧说法，不要动不动把一种新观点视为异端。鸦雀无声不好。二、新闻出版界要勇于为新学说、新学派鸣锣开道。报刊从来都是培养新学派的催生婆。学术报刊要敢于拔学说之尖，兴学派之利。三、要在全社会兴起一个尊学说、重学派的科学伦理、科学心理的社会风气。学者不以毛遂自荐而脸红，同道也不要因人家自荐而眼红。只要不是搞伪科学，只要不是妄自尊大，我们就应当予以提携。发现新学说有弱点，就郑重地指出来，使之日臻完善。

从改善学术生态环境入手

读了《征答》（《方法》1990年第3期），我无意应答，只是读后有点联想。

我出生于“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豫皖苏交界处。建国前，为国共两党的拉锯战地区。昨天为国统区，今天为解放区；白天听伪县长的，晚上听刘邓陈粟大军的。这一下可苦坏了我们的作文老师。国民党来了，他要学生写国民党好的作文，撕掉写共产党好的作文；共产党来了，他要学生写共产党好的作文，撕掉写国民党好的作文。一本作文簿，撕来撕去一则难看，二则留下痕迹。后来，老师索性就要求高小学生，备两本作文簿，一为国字号，一为共字号。

两本作文簿，必然是一真一假。试问：这说假话的作文，由谁负责？该打谁的板子？难道能由小学生负责吗？依我之见，说假话的责任应当主要由客观形势来负。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狗熊。假话，大多数是逼出来的。国民党反动派逼校方说假话，校方逼老师说假话，老师逼学生写假文。我敢断言，如果不逼，在国共两党的党风有天壤之别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学生是不会说国民党好话的。

当然，不畏压力，在作文中不讲假话的学生也是有的。我就是其中之一。内因是根据嘛！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嘛！不用说，不应忽视内因。但是，有的时候更不应忽视外因。外因有时也会起主要作用，起决定性作用。我之所以不做假文，也是环境所迫。与其说是共产党儿童团的培养，不如说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逼迫。他们把我们共产党人的家属称“匪属”。他们把我这不满10岁的共产党人后代称“共匪羔子”。他们三天两头提训我们，抄我们的家。你说怎么叫我们说他们好话呢？再说，国民党那一套我们小孩子也领教过不止一次。只要你沾了“共”字的边，随便怎么样，他们总归不会饶了你。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既违主观、又违客观地写假文呢？

按理说讲真话的文章好写，讲假话的文章难写。讲真话的文章写起来快，讲假话的文章写起来慢。不论为了提高文章的质量，还是为了提高文章的产量，都必须提倡讲真话。而要鼓励讲真话，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真话存在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对不讲真话的文章固然要批评，但是对不喜欢听真话，只喜欢听假话的方方面面，更应该制止。精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精神生产关系随之发展。这是规律，是无情的规律。

1990年第4期《方法》

对社会科学作品的评估原则 ——学术生态学札记之一

比喻同一个人的阅历有很大关系。我在看了被称作“塞外江南”的兴旺型生态、被称作“江南塞外”的荒凉型生态之后，对“生态”二字有着切肤之痛。正因为对生物的生态有切肤之痛，所以当我看到学术界出现一些不利于学术繁荣的现象时，就不由地把“生态”二字移植到学术上来，呼唤建立一门学术生态学，推动学术生态环境的改善。

同农作物的生长需要有一个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良性生态环境一样，学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要高产是不可能的，要优质也是不可能的。从中外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来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学术生态环境好，它们的学术就繁荣，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学术生态环境不好，它们的学术就萧条。春秋时怎么会出诸子百家的局面？文艺复兴运动中欧洲为什么会出那么多灿烂的巨星？能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学术生态环境无关吗？按照列宁的说法，理论的思维总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产物”。

中国这几年在理论上能有一个又一个突破，也是与中国整个改革的形势分不开的。改革需要理论，改革也能产生新理论。改革应当说是决定中国学术生态环境的最大因素。

但是，从理论工作本身讲，在对学术成果的评估原则、评估手段、评估工艺上存在某些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生态的良好环境。

在学术评估的工作中，就其缺陷来说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凭某些人一句话。某些人说某一篇文章“似可”，一些人就认为此文“大可”；某些人认为某一篇文章“尚不足”，一些人就认为此文“大不足”。这有时也不能全怪一些人。大家都是耍笔杆的。某些人措词尽管不激烈，一些人办得激烈了，某些人也不制止。一次不制止，下次就大胆“加码”。

二、凭“洋人”一篇文章。文章传到海外，如果海外说你好，“看，你博得了资产阶级赏识，还得了吗？”（有一点应该补充：现在讲“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人少了）如果海外说你不好，“看，连资产阶级都说你不好，还得了吗？”有些同志一面批评别人“食洋不化”，一面把评论权交给外国人。

三、凭一份“报告材料”。有些人一看似乎要批评什么问题了，于是马上就送上一大叠“旁证”。看材料者弄不清送材料者出于什么动机，也弄不清这些材料的可靠程度，只凭自己的感觉表态或作出某种决定。

四、凭一份“内参”。什么事情都有背景，写“内参”的人未必都了解背景。即使了解得多，写出来的时候也得有取舍，斩头去尾是不可免的，弄不好还会断章取义。有些同志不看全文，不看原文，就下判断，怎能不上当呢？“口传五次，必然走样”，这是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重要命题，不信试试看。凭口头说法，写出的简报，一般都要打折扣。现在不是有句话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内参说悄悄话。”“内参”应该说多数是符合事实的，有它的作用，这样说是过分了。但这句话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现在没有检查“内参”，如果查一下可能会查出某些“内参”有相当多的失实之处。

评估工作中的这“四凭”，严重挫伤了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严格地说，精神污染源不是来自于学术著作，倒是我们的理论评估工作污染了理论界。

对理论工作的评估，应当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理论观点的新鲜程度。前人论述过的，再论述，固然没什么不好，但终究不算创新。二是社会的需要程度。新观点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正确与否要在社会实践中检验。推动社会前进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当然，完全合乎这两条的不多，但是，只要不是求全，大体合乎这两条的社会科学著作还是不少的。可是事实上，现在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苛求的多。中国的理论家是聪明的，是肯干的，是有马列主义觉悟的，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好书好文章会源源而来。

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应成为学术生态环境保护的部门，应成为理论工作者之家。宣传部门的形象近来有很大转变，在改善学术生态环境上作了大量工作。天高任鸟飞。可以预料，理论工作者会在丰富马克思主义宝库中作出杰出贡献。

1986年4月9日《解放日报》

淡化批判的空气 ——学术生态学札记之二

无论是武器的批判，还是批判的武器，都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重视批判的武器的。马克思、恩格斯写过大量的批判文章，写过“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样的文章，给全世界无产者以理论武装。在中国，批判的武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发挥过巨大威力。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的著作中，有很多是属于批判文章这一类的，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可是，批判的功能是不是永恒的呢？批判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我想，是不会永恒、不会不变的。至少在学术生活中批判的地位正在起变化。学术批判的空气应该淡化。

提起学术批判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建国以来学术界、文化界的批判活动，而这些活动大都失败了。多年来，我们开展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社会学的批判，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对自由、平等口号的批判，对商品经济理论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对利润理论的批判，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等等。“文革”中的那些不齿于人类的批判，更属于“不齿”之列。单就“文革”前的那些批判来讲，它们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从批判的发动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二、从批判的组织看，是自上而下的。被批判者早已内定，批判者也多是“点将”而出。三、从批判的声势看，是层层表态，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四、从批判的性质看，一般是步步升级，由学术批判到政治批判。五、从批判的结果看，是歼灭战，大多要算历史旧帐，要落实到对人的处理上，或免职，或开除，或撤销代表资格，或关进牢里。

这样的批判社会效果极坏，经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应该说大家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问题是，这些年来它的“余震”未止，人们的“余悸”未消，至今仍然妨碍着良好学术生态环境的建立。

历史在前进。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实践一再呼唤理论工作者，大胆探索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领导不断重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什么对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仍如此步履艰难？原因之一，不少理论工作者仍怕这样的学术批判“过几年再来一次”。他们的心情甚为复杂。一、想创而不敢创。不少学者想“创一创”，然而一看“山雨欲来”，本来想写的不再写了，写好的也不寄出了，已经寄出的要抽回去了。“创则有风险，不创最安全”成了一些人的“经验之谈”。二、担心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学术与政治本来是有界限的。但社会科学的探索多少会涉及到现实的政治，万一有人把学术问题往政治上上纲上线，事情就不好办，因此一些同志只好“嘴上讲政治，心里躲政治”，埋头去搞“经院式”的研究。三、不忍心于学术理论界的“内耗”。要搞学术批判，被批判者固然日子不好过，批判者也不好当，既怕不知何时自己也成了“被批判者”，又担心批来批去，你来我往，严重削弱了理论界的凝聚力和共向性。

凡此种种，从实践上看，淡化学术批判的空气是必要的。

从理论上说，淡化批判的空气也是必要的。

社会科学理论是对社会本质的认识。理论工作本身是社会管理工作中的一环。社会向前推进了，理论和理论工作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和更新。在阶

级斗争激烈的年代，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进程中，用大批判开路是必要的。但是，在我国，在今天，两大对立的阶级早已不存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早该被人们摒弃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再搞大批判就没多大必要了。各项工作都要把重心转到建设上，理论工作也应当转到建设上，不能例外。建设就是“立”，批判就是“破”。在破与立的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转移。一项理论建树胜过一打批判文章。不论是从理论价值上看，还是从人们对理论的承受力看，“破”字当头都是行不通的。淡化批判空气的理论依据就在这里。

淡化批判的空气是不是要取消批判呢？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淡化就是淡化。淡化只是意味着重点转移，值得批判的理论不会绝迹。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理论，我们应该批判，对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理论，我们也应该批判，对封建理论、资产阶级理论不仅要批判，还要进而战胜它。战胜的法宝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目的是发展由马、列所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要建立一套虎虎有生气的、对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理论。

淡化批判的空气是不是要学术界“一团和气”呢？也没有这个意思。对学术研究者来讲，由于各人研究的侧面不同、方法不同，由于各人的素质不同，存在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观点之间应该展开讨论、争鸣，进行批评与反批评。没有这一些，既不利于发展真理，也不利于修正错误。所谓淡化批判的空气，就是要用讨论、争鸣、商榷来取代批判。

“批判”一词，在《朱子类语》中是用来批判罪恶的。在《少林寺西堂法和塔铭》中，除了仍有批判罪恶之意外，又多了一层评论、评判之意。在马、列的著作中也是这两层意思。可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似乎又回归到《朱子类语》了。词的命运从来都是变化的。既然人们谈“批”色变，既然人们视批判为“余震”、“余波”，既然人们认为讨论是平等的、与人为善的，而批判是与此相反的，那么，我们在学术上用讨论代批判不是更符合人们的心理吗？不是更有利于造成一种活泼宽松、和谐融洽的学术生态环境吗？不是更有利于形成一种从容、宁静、团结、愉快的学术生态环境吗？

1986年4月30日《解放日报》

强化宽松的气氛 ——学术生态学札记之三

在我的学术生态学札记的写作计划中，本来没有“宽松”这一篇，只因在《札记之一》发表后几天，有同志提出了建立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的观点，广大知识分子交口称誉。“知识分子有兴趣的问题，就应当是研究的课题”，这是我这个知识社会学爱好者多年抱定的宗旨。于是就写了这个题目。

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闻“宽”则喜，闻“松”则喜呢？这可能与其处境有关。在中国，一九七八年以前，在“知识分子”前头常冠有“资产阶级”四字。除一九六二年被陈毅摘去了几天以外，这顶帽子一直戴在知识分子头上。一九七八年春天摘帽以后，宽松多了。可是，“左”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退的，封建的“重官轻文”的小生产者的心理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退的。近年来，敲打知识分子的声音不时可以听到，就是在今年，有的报纸上还大讲改造知识分子。正如有些同志所说的：对罪犯，说严，实际上难以严起来，因为罪犯的结构不同以往了；可是，对学术问题，说不严，实际上一直很严。“残则施之以宽”（《左传·昭公二十年》），受过摧残的人，听到“宽松”自然是高兴的。

不过，如果仅仅认为宽松符合广大知识分子的愿望，是很不够的，知识界之所以喜欢宽松的学术生态环境，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宽松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知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脑力劳动者来讲，劳动对象是社会，劳动手段是思维，我们知道，社会是没有围墙的实验室，而思维活动更是无边无际的车间。因此，禁锢思想无异于让脑力劳动者带着枷锁劳动，劳动产品是不会好，也不会多的。打开思想史、文化史来看，就可以明白：什么时代思想比以前有所解放，什么时代的学术就繁荣；什么时代思想受压抑，什么时代的学术就萧条。今天提倡在宏观上要宽松，目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人们对思想劳动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运用。

多年来，“理论脱离实际”几乎是每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小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既然知识分子无不懂得理论来源于实践，为什么偏偏要脱离实际呢？还不是因为环境不够宽松，联系实际有风险吗？怎么可以一味地责怪知识分子呢？实际不接受正确理论的指导，实际严重脱离理论，叫理论怎么来联系这种实际呢？今后，有了宏观宽松，学者们就不必系着“安全带”劳动了。有了宏观宽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联系就不致于走很多弯路了，杰出的理论和杰出的理论家就会层出不穷。

那么，宽松的学术生态环境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

一、宽松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站在同一政治立场上的人，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学术见解。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同一政党内的不同领导人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因此，不能把学术问题，一古脑儿说成政治问题。但是，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又是有政治内涵的。要在有政治内涵的社会科学中划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确实是不容易的。当然，只要认真分析也还是能够分清的。分清了，就能使忐忑不安的人，定下心来。对可以算学术问题，也可以算政治问题的。要往学术那边靠。其实，对政治也可以作学术探讨。政治学就是探讨政治的学问。不研究政治学的人，也能研究政治，也能自觉指点江山。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二、宽松领导与学者的关系。学术生活不同于军事生活。在学术讨论中，领导人与学者之间应当是平等的。领导人要信任、尊重学者，学者也要信任、尊重领导人。大家都应当只服从真理。在学术讨论中，不存在下级非服从上级不可的问题。随着干部专业化，领导人参加学术活动的将与日俱增，但是，领导人在学术活动中只能以学者身分出现。学者的一句只能顶一句，领导人的一句决不应该顶学者几句。在学术讨论中，既不能事先由领导人任意定调子，也不能最后由领导人随便作结论。定于一尊，是宽松的大敌，是繁荣学术的大敌。

三、宽松学派与学派的关系。没有学说、学派，要发展学说、学派；有了学说、学派，要注意处理好它们的关系。“茂林之下无丰草”，不全对。大派小派应该平等。不同学派应该互相理解、信任。有大人物或大报刊支持的大派应对小派持宽容态度。只要搭配得当，大树底下照样鲜花盛开。政治机构应该为学术研究服务，但是一个学说、学派如果要靠政治后台、政治手段来维持，那是软弱的表现，是对科学的亵渎。

宽松上述三种关系，同种田需要松土，庄稼需要通风、透气一样重要。而要建立和发展这种宽松的学术生态环境，最根本的一条是矢志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先决条件是“百”。“双百”方针的关键是“鸣”。“百”者，多也。科学承认多样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多样的学说包含的真理成分不会一样多，但是，参差不齐的学说相得益彰。所谓“鸣”，就是要允许发表，允许出错，允许讨论。没有这些允许，是不敢鸣，鸣不起来的。是不是承认“百”，是不是鼓励“鸣”？这是衡量宽松的尺度。在黑白颠倒的“文革”中，有许多文章把陆定一同志一九五六年五月所作的“双百”方针的讲话，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把邓小平同志的开明主张，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随着“四人帮”他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嗓门的提高，学术自由被荡涤殆尽，紧张的学术空气窒息了学者。这个教训值得永远记取。我们要高度珍惜宽松的学术环境，充分利用宽松的学术环境，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去扩大宽松的学术环境。

1986年5月1日《解放日报》

知识的整化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朝专业化的方向努力。有不少人已在本专业的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的职称。这是值得庆贺的。但是，如果仅止于此，那是远远不够的。信息社会的潮流是：只拿到一个学科的博士，是“铜牌博士”；拿到两个学科的博士，才能称得上“金牌博士”。也就是说，只精通一门，不算人才；只有精通两门，才算人才。

这是对专家的苛求吗？否。

知识发展规律的要求

客观世界，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一个整体。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起初也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早期的科学，不大分什么学科。古代科学家，中国的也好，外国的也好，都堪称“万能博士”，至多是有所侧重而已。可是，近几百年来情况不同了。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这里的“日益迅速”是同学科的日益分化相伴而行的。从个体看，只有分得细，才能目标集中，精力集中，达到一定深度；从群体看，也只有分得细，才能腾出力量，铺开战线，扩大领域，延伸广度。人类在文、史、哲、数、理、化等方面的成就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这样繁花似锦，是同学科的越分越细分不开的。

但是，分得太细，忘了综合，也会窒息科学、肢解科学。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痛感分工太细的弊病。分得过细，会使人变成井底之蛙，深则深矣，可是看到的天小了。即使你就研究一颗星，那也得在同天上其他星星的比较中来认识。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有机的整体，一味地分而治之，能治得了吗？分得太细，到一定时候，不但广不了，而且也深不下去。

因此，知识的整化是由我们科学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决定的。现在人们开始重视知识整化，是知识发展规律对我们的驱使和提醒。

“整化——分化——再整化……”是知识发展的必然逻辑。人类的知识，从古代的整化到近代的分化，是一大进步；经过四百多年以后，现在知识又从分化走向整化，这将是更大的进步。这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螺旋式上升。今天的整化远非古代的整化所能相比的。严格地说，古代的整化不是整化，是囫囵吞枣，是“浑沌状态”；现在的整化，才是真正的整化，是立足于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

开展“百科全书式”的教育

既然知识在整化，那么作为教师传授知识和学生吸取知识的学校应该怎么办？

为了适应知识整化，高等学校要加强综合性。工科学校要办理科专业；理科大学要办文科专业；文科大学也要开理科课程。这将为开展“百科全书式”教育创造极好的条件，至少师资的整体是一支百科的队伍。

为了适应知识整化，高等学校要调整课程，不必把课程定得那么死。要尽量提高选修课的比重，选修课的学分至少要占一半，能占大半更好。除此

以外，要开各种各样的讲座。少则每周一讲，多则六讲也无妨。这样可以弥补已经稳定了的课程跟不上知识更新步伐的不足，让学生及时掌握新兴学科的动力，不致于造成“文科学生是‘理盲’，理科学生是‘文盲’，文、理科学生是‘政盲’”的局面。

为了适应知识整合，要编“百科全书式”的教材。从知识整合的角度看，以往的教材有不少很干瘪。法国有个“年鉴学派”，他们主张编“总体”书，“目的是抑制专业分工过细的倾向，促进各学科研究者之间的交流”。

当然，最根本的是教师要作“百科全书派”，要精通本专业，了解邻近专业，还要学一点距离自己的专业较远的学科的 ABC。名师出高徒。教师是大百科，学生才能成小百科；教师的知识跨度大，学生才能跟着上来。

要提倡“一主多副”

既然知识在整合，那么我们在运用知识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候，就不能单纯用其所长。既要把自己最长的贡献出来，也要把自己较长的贡献出来。这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正业、主业，又要有副业。要“一主多副”，主、副相得益彰。

“一主多副”的含义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一是在同一专业范围内，采用不同的劳动手段。比如说，你是法学研究人员，这是主业；但是，你同时可以去做法学教师，这是副业；同时去做律师，那是又一个副业。变来变去，没离开本行。

二是离开了本专业。比如说，你是研究法学的，那你也不妨以经济学为副业，以社会学为又一副业。

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谁攻的专业多，谁就要被视为“万金油”，被视为“不务正业”，被人讥为浅薄！他们把“浅薄”看作“博学”的同义语。

其实，博学未必就不深。博而不深者有之，博而造诣颇深者也有之。郭沫若是史学家、剧作家、诗人等。曾有人嫌他面太广，甚至连他自己也说过自己面太广的话。可是，郭老之所以成为郭老，就在于他无所不包。

面广不等于东一头西一棒，而恰恰是开掘深的必需。郭沫若如果不是史学家，他的历史剧会那么深刻、丰满吗？郭沫若如果不是诗人，他的历史剧里会有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吗？再以前面提到的法学家学经济学为例，看起来是不专了，可是恰恰因为法学与经济学的杂交，才使这位法学家变为经济法专家。经济法专家较之于一般法学家岂不是更专门了吗？

有了“副业”会不会妨碍“主业”？从前一种情况看，是不会的。但也有因“副业”而削弱“主业”，甚至丢掉“主业”的情况。有些人可能对此表示惋惜，可我要为此唱赞歌。君不见有多少名家成名在“第二专业”而不是成名在“第一专业”吗？鲁迅在医学上的成就比得上文学吗？可是鲁迅所学的专业是医学呀！《1983年中国哲学年鉴》里面有七十名在世的哲学家小传，当中哲学科班出身的只有二十几人，加上同哲学接近的专业出来的，也不到一半。这说明许多人在“副业”上的成就大于“主业”，或者是第二专业变第一专业，道理不外乎这几点：一是“第一专业”确定得较早，当时自己未必成熟，而“第二专业”则是在成熟时期从实际出发自愿决定的；二是自己的第一专业是科班，所学的是“金科”，所干的是“玉律”，不那么容

易突破。可是，对“第二专业”来说，自己不是科班，或敢于“离经叛道”，或善于“破老古董”，开创新局面。因此，学者容易在“第二专业”中破土而出、脱颖而出。

这样说，“第一专业”岂不是白学了？不是。鲁迅丢掉了医学职业，可是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仍有浓厚的医学色彩。所谓“丢掉”，总是丢而不掉，用处还是有的。“第一专业”的用处，不只是为“第二专业”提供点例证，更主要的是，在基本功上“第一专业”同“第二专业”是相通的，在方法论上“第一专业”同“第二专业”是相通的。没有“第一专业”为借鉴，就谈不上“第二专业”的兴起。主业与副业是彼此渗透，互相转化的。

尾 声

“知识整化”的势头方兴未艾，这里有许多课题值得探讨。本文中有些话可能过头，可能有漏洞，但是在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知识的整化趋势作出相应调整这一点上，我还是坚持的。

1984年3月16日《文汇报》

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能否再高一点⁵

今天我想谈一下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在最近的来信中，有十几封是谈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多数是讲知识分子政策在他们所在的单位里落实得很差。有的说，他用非所学，这样一来专业不对口，他所在单位就不能把他当知识分子看待。有的说，快五十岁的人了，一家人还挤在一间房子里，没有藏书、读书、写书的条件。有的说，用三年时间写一本书的稿费，不如退休司机半年的收入。有的还谈到，同样的知识分子，在住房、提级等方面，文教部门的不如在党政部门的好。还有些来信，谈得很具体，要我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说实在的，我是爱莫能助。对有些知识分子的疾苦，我已向写信人所在单位作了反映。效果怎么样？我

估计，不可乐观哟！这不只是因为邓伟志人微言轻，更主要的是因为重官轻文的思想，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管理体系。这一套封建思想，在有些国家经受过资本主义的冲击，在中国没经过资本主义的很大冲击。全靠社会主义冲击，难度是很大的。说得难听一点，对有些人来讲，想卡一下知识分子是很便当的。随手一抓，就可以抓出一大把卡知识分子的理由；灵机一动，就可以找到一大串卡知识分子的借口。尽管这些理由和借口，都是老掉牙的老话，但是，在找借口方面，好多知识分子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在今天的信箱节目里，我不想一一分析那些借口和所谓理由，只想从理论上讲一下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许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有一定好处。

考察一个集团、一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要同这一时代的任务相联系。要站在时代任务的高度来评价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地位，从一个集团一个阶层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大小来看它的社会作用。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我们就看一看知识分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吧！

实现四化需要两种人：一种人是体力劳动者，一种人是脑力劳动者。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体力劳动是很重要的。但是，与脑力劳动比较，体力劳动有很大局限。体力劳动的缺陷有些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体力劳动至少有两个缺陷：一是它的能量受劳动者生理的限制，二是限于重复性的劳动，很难有创造性。

而脑力劳动尽管也有局限性，但是它具有更多的优越性，更适合于四化的需要。

⁵ 年初，我在上海市社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最近几个月《文汇报》开展学说、学派讨论。这个讨论是在胡耀邦同志鼓励、支持下开展的，一步步在深入。这个讨论虽然是我引出来的，但是后来的文章都比我深刻、尖锐，击中要害。这表现在后来的文章，大声疾呼学术民主。民主出文章，民主出观点，民主出学说，民主出智力。社会主义经历了由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到运动（工人运动）再到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又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四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现代文化是由各种学说组成的，是由学派来显示的。社会主义学说还要发展，还要经历若干阶段。左，有时来自一些领导同志，有时也是我们自己吓唬自己，层层加码。有人搞宗派有术，搞学派无方。学派少，宗派就多。有了学术民主，有助于克服‘左’，会促使人没有时间搞宗派。有了学术民主，学术才能繁荣，就不会下笔如有‘绳’，而是下笔如有神了。没有惊鸟之弓，就没有惊弓之鸟。”（《祝愿八五年成为理论年》，上海《社联通讯》1985年第2期。）

这里的道理有以下五点：

一、劳动手段现代化的水平越高，越需要脑力劳动，换句话说，越需要知识分子。从现有的工业企业看，哪个行业现代化程度高，它那里职工中的知识分子比例就大。国外有的学者作过统计。在中国也是这样。越是落后的行业，知识分子的比重就越小。可以预料，随着四化步伐的加快，脑力劳动者地位会逐步提高。

二、技术更新的速度越快，越需要脑力劳动，换句话说，越需要知识分子。近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在加速度发展，这是恩格斯说的。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这样。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应尽早尽快地采用先进技术，不断改造旧技术。在这项工作中，首先要依靠的应当是脑力劳动者。

三、管理工作的现代化，尤其需要脑力劳动者参加。现在，管理在经济、科技、文化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管理人员应当是通才，是通晓许多学科的人才。优秀的管理人才不仅要懂本行业的业务，而且还要懂管理科学。这种人才知识面要广，知识量要大，少了是不行的。

四、横向联系的作用越大，脑力劳动的地位越大。现在到处在讲“横向联系”。可是，知识贫乏的人，是难于从事横向联系的。对左邻右舍的专业不了解，不懂，处处有所谓“隔行如隔山”之感，怎么同人家横向联系。拥有一定知识量，对人家的先进经验一听就懂，一懂就会用，那有多好。退一步讲，在交流中，假如左邻右舍留一手，你也能明白几分，那有多好！

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那些会驾驭社会主义规律的人来参加。那么，能具有规律性认识的人是谁呢？无疑应该是有知识的人。我们要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进行改革，需要创造型、开拓型人才。那么这种人才在哪里？主要在知识分子中间。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就在于能够遵照科学，遵照规律，从事创造性劳动。没有创造，只会讲老话、套话的人，算不上脑力劳动者，称不上知识分子。这也是马克思说过的。复杂劳动就是要有“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过去我们常讲，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现在看，这一估计远远不够了。应该说，在文化较低的国家里，在缺少高技术高文化的国家里，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

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正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正逐步缩小，脑力劳动被提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78年党中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人鼓舞，有人反对。前不久，还有人发表文章说，知识分子要在思想改造好以后，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言下之意，过去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己力量是对的；言下之意，现在也还有些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认为，从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那天起，知识分子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并且这一部分不是普通的一部分，它是工人阶级当中富有创造力的一部分，是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一部分，也是创造剩余劳动比较多的一部分。一句话，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的中坚。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高了，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说，准确地提高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是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理论准备。

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讲得不多，不透，因此，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阻力很大。也有些知识分子把这一评价，看作是恩赐。其实，这不是恩赐，这是如实反映客观存在。

淡化“当官心理” ——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

官，在一些人心里一直是颇有吸引力的。近年来，当官、谋官之心是强化了还是淡化了？这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可是，如果不要求定量分析，允许用模糊数学、模糊语言来解答，还是可以讲清楚的，那就是：强化了。

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一批栋梁之材来管理。为人民而当官，当为人民之官，是官民的共同心愿。但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想当官的人增多，是不利于全社会的知识化的。从全社会看，想当官的人多了，做学问的人就少了；从个人看，做官与做学问之间有个函数关系，二者是成反比例的。我预测到提出这个函数关系会遭到非议，便做了点调查，让事实说话。

不消说，我调查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在收入《简明社会科学辞典》的人物中，“姓”马的最多，共有26位。我发现其中没当过官或只当过三、五年小文官的有20位；当过官但著作是在不当官时写的，有3位；一直当官且有学术成就的有3人，如创造“马锡五审判方式”的马锡五。可见，不当官而出学术成就的是多数，既当官又出学术成就的是少数。

正因为当官与做学问有冲突，所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众多文人不当官。古代文人不当官的情况可分五种：

一、拒官型。这类人不愿当官，事实上也没当过大官。如东汉的郑玄，入太学，后专门著述、教书。袁绍想称帝河北，派军队押郑玄出来当官，郑玄不肯，竟以布衣相见。又如被人称为“书淫”的皇甫谧，司马昭掌魏时，召他当官，他说：“你与其让我当官，不如借点书给我读。”晋武帝建晋时，又召皇甫当官，皇甫仍不肯。

二、辞官型。这类人当过官，但后来坚决挂冠，改做学问。如明代的李贽，当过三年知府，主动辞官，住在庙里，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写出了《焚书》、《藏书》等名著。又如清代文坛“性灵”派倡导者袁枚，当过知县，40岁时辞官，留下大量著作，开教女学生的创举。

三、罢官型。本人并非不想当官，只因被罢了官，便因祸得福，有时间做学问。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当过许多官儿，但晚年遭到贬谪，在被贬为“民兵营长”时，宋神宗还不许他“签书公事”，但他却留下许多豪放的诗篇。又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被罢官后，并不通路子复官，专心作画吟诗，成为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

四、无官型。本人并非不想当官，只因没交上官运，当不上官。如隋代哲学家王通，上书隋炀帝，不被理睬，便隐居著述，教书，培养了一大批“河汾门下”。又如清初三大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抗清失败，当不成官，便隐居讲学，遗下了卷帙浩繁的名著。

五、官学交替型。这类人仕途曲折，时而为官，时而为学。为官时一般不学，为学时一般无官。像宋代的朱熹，三上三下，每次下时都有著作。尤其是晚年，下台后，他闭门著书，成为宋代理学的著名代表。

如果说1985年是我的“文章年”，那么，1986年便是我的“信箱年”。这一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我开了个《邓伟志信箱》节目，主要是就听众提出的各种理论热点、难点，作出答复。每次十至十二分钟。本文便是我的一次讲话稿，曾在990千赫播过四次。1986年8月23日又发表在《文汇报》。发表后收到过三十余位知识分子的来信，大多是为知识分子叫苦的。

五种情况从不同侧面说明，当官与做学问是相斥的。

文科如此，理工科更不用说了。在搞文的知识分子中，之所以还有少数人当了官以后仍有学术成就，那是因为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当官也是观察社会的窗口之一。不当新闻官，很难写出《官场现形记》；不是八旗，也很难写好清廷生活。但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以自然界为实验室。自然科学家固然也离不开社会，但是大可不必弄个官儿当当。文理相通，是指理论和方法上相通，无论如何不是指把自己通向官场；文理一体，是指综合研究，而决不是去交官运。

古代中国如此，当代外国又如何？在美国，许多学者认为，做官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高位是学术的坟墓。在今日美国，学者当官的情况，大体有三种：一是被视为大学者应尽的义务，不得不轮流担当；二是觉得自己在学术上已是“江郎才尽”，半路“出家”为官；三是既有学术成就又有管理才能者。不过第三种人的学术成就一般说不是很大。人的精力有限嘛！像美国阿波罗登月总指挥的学术才能就不如其管理才能。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同古代封建地主之官，同美国的资产阶级之官，在性质上、在职能上都是有根本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但是做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是一样的。为了改变外行领导内行，提倡干部要知识化、专业化是正确的，选拔知识分子当领导，也是必要的。但是，让一些治学有方、做官无术的学者当领导是很可惜的。在知识分子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想当官的人增多，不是好事。

不过，这不能只责怪个人，更要从社会上找原因。现在有些作法是助长人们的当官心理的。比方说，学者工资的上限低于干部工资的上限，促使一些人走升官之道。再比方说，社会上还客观存在做官容易做学问难的问题。做官，只要有人提拔，就可以平步青云。搞科研，即使是倾毕生精力，也未必有成。这也是助长“做官心理”的原因。再比如说，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情况：不当官，特别是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论文再好往往找不到地方发表；当了官，论文即使不怎么样也有人抢，也有人捧。还有，我们科研的课题选择权、人事安排权、资金支配权，并不在科学家手里，而在一些不搞科研的干部手里，以致科学家为了科学，也不得不去争个一官半职。

为了转变人们的做官心理，除了端正认识外，还必须掀掉助长做官心理的外因。为此我建议：

一、官的产生应从“点将型”变为民主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各类干部应尽可能多的由选举产生。把选举权交给群众，而不是交给个人。现在不少单位的“群众推荐”只是一种“摆设”，对此群众是有意见的。

二、官的职能应从家长型变为服务型。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削弱集权。官没有了特权，人们的当官心理就淡了。干部真正做学者的后勤，学者没有了后顾之忧，也就不想夺后勤之“官”了。现在有些地方是前后方脱节。学者们要搞的课题，他不批；要交流的人，他不给，致使身在前线的学者不得不回头光顾后方，恨不得集“司、政、后”于一身。

三、官的条件应从政治型变为知识型。现在任用干部，见海外关系就扔的情况少了，但是凭死档案用人的情况还是有的，“将门”多“虎子”的心理也是有的。今后选干部，在知识化专业化方面，不能光看知识总量，还要看其知识结构。业务上内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其是否懂得管理科学、领导科学、组织心理学。这几门不及格，不能当官。

四、学者的科研工作应从被动型变为自主型。只有当学者们在从事学术研究中，不必仰仗行政部门“划圈”时，只有当学者有了课题选择权、人才交流权时，学者才不会弃学当官。

南朝有个思想家陶弘景，梁武帝请他出来当官，他不肯。梁武帝只好经常派人向他请教，因而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山中宰相”就是今天的“思想库”。知识分子应做领导的“外脑”，“思想库”，不必统统去做官。做了官，就失去了学者的特色。我相信，在党中央关于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号召，落实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后，人们的“重官心理”是会转变的，会淡化的。

关于“对话”的要领

对话作为民主生活的一种形式，在被冷落了一阵以后，最近又流行开来。这是大好事。

对话不同于“一人讲，众人听”的单向式的报告，跟讨论也不完全一样。对话是矛盾着（请注意：从哲学上讲，矛盾是普遍的）的两个方面，直接见面、交谈，有助于感情交流，有问必答，不容易回避矛盾，从而达到沟通、理解、合作的目的。

但是，对话的这些作用并不是唾手可得的。现行的对话有流于形式的，也有有负众望的。要提高对话的效应，还得下很大功夫，至少要抓住以下三个要领。

第一，要说真话。这主要是对主讲人来说的。

主讲人所讲的问题，应当是实际生活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应当是人们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焦点。对此，一般说人们心里是有数的。如果绕开热点、难点、疑点、焦点，不论是虚设一问还是虚设几问，都无法提起听众的精神。有意回避热点，不是无能，就是无理。

不仅如此，在环绕热点讲话时，如果不讲真话，那也是愚弄群众。讲老话、套话，尽管不是假话，但是无补于事。要听老话、套话，何必跑到你这里？多年来，我一直对肖伯纳的一句名言有怀疑。他说：两个人交流苹果，各人只能得到一只苹果；两个人交流思想，各人能得到两点思想。肖氏名言，似乎忽略了讲套话这类情况：都讲套话，恐怕交流上三天三夜，也交流不出两种思想。你说，天气好；他说，好天气；你再说，天气实在好，他再说，实在好的天气。试问：这四句加起来能大于一吗？一句套话重复千遍，依然是一句套话。讲套话，有悖于对话的目的。

为什么有些人在对话时语言刻板？未必是他们口才不好。原因之一，是被套话“套”住了。套话的主要功能是“自身安全”。飞机升降时要系安全带，那是为了防止飞机颠簸时坐不稳。可是，不管什么时候都系安全带，那也就动弹不得了。哪里还有什么进步！反之，不讲套话，敢讲真话，讲起来就活了。真话出风趣。真话出幽默。讲真话方显演讲才能。

第二，要双向交流。这主要是对听众来说的。

上面讲到，对话与报告的不同之处就是让听众提问题，让听众发表评论。对话不是“我说你服”的所谓说服教育，不是“我打你通”的所谓打通思想。

对话的双向性是由对话的“对”字决定的。双向性应当是对话所固有的。没有双向性就不成其为对话。既要姓“对”，就不必害怕双向性。

双向的对话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在政治上平等的体现。不是常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双向的对话会使矛盾双方认识上的差距缩小，会使矛盾双方的感情交融，友谊增进。

双向的对话是深化认识的必须。思想的火花最容易在碰撞中产生；不碰撞便不容易产生思想火花。思维能力要在共振中增强；没有共振，思维的能力就会衰竭。对话就是碰撞，对话就是共振。不管听众从哪个角度提问题，都会使真理更丰满。即使是挑衅，高明的人也会把它转化为挑战。能不能勇于提问，是个国民素质问题。欢迎不欢迎提问，也是个国民素质实实在在的问题。

第三，要容错话。这主要是从对话的环境上说的。

对话是短平快。对话中所讲的话，有不少是随机应变出来的，是当场被激发出来的，很难做到不说错话。一般说，对话中的错话率要比文章中的错话率高得多。文章可以七稿八稿。八稿就是对七稿的修正。相对于写文章而言，能不能为对话要个特殊政策？能不能给对话中的错话以更大的宽容度？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有依据“讲话记录”挑出“错误言论”的习惯。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仅凭一份记录治罪的现象存在了。

为此我诚恳建议：对话中的错话只能由参加对话的人在当场心平气和地帮助纠正。如果要对对话中的错话作批判，必须在批判前把记录稿送本人审阅。如当事人认为记录不符合原意，或者要求修改当事人当时的谈话，应该尊重当事人的这一庄严权利。

1988年2月12日《广州日报》

首要的是个“百”字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首要的问题是要有百家。没有百家，谁来放？谁来鸣？百家，并不是指专家的数量，也不是指学科的数量，而是指在每一门学科中的不同观点、不同学说、不同学派。

对理论管理工作来说，重要的是要扶植百家，发现百家，给各家以生的权利。既给流行的观点以生的权利，也给被人视为“异端”的观点以生的权利；既给正确成分多的学说以生的权利，也给正确成分少的学说以生的权利。对学说不能求全，要允许它有缺陷。“谷低”往往是“峰高”的伴随物。假如把谷填平了，大概峰也就不高了。一般说，有“特长”必有“特短”。在宏观上宽松，有利于“扬长”。老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正因为推行了“兼容并包”，当时被人视为洪水猛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才得以传播。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并不是假的。他不欣赏旧派，也容了旧派。容了旧派不仅无害，反而有益，促使新派思想的深化，使新派在与旧派的较量中发展。

不能容百家，喜欢搞“一言堂”是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是宗法观念。恩格斯在批评阻挠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气量狭小”时，指出：“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不花精力搞学说、学派的人，容不得不同学说、学派的人，往往是把精力花在搞宗派上去了。理论工作也有个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现在学科越分越细，有几千门，纵横交织，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在合流，再沿用管小农经济的办法管学术事业怎么行呢？理论工作也有个管理现代化问题。可是，最基本的的一个条件，是要兴百家。

1986年5月25日《文汇报》

把百家争鸣提到新高度

“双百”方针的旗帜不仅要举，而且还得比原来举得更高。高到哪里去呢？依我之见，应当从具体意见之争提到学说、学派之争的高度。学说是科学的精华，学派是人才荟萃之所。科学学派既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重要标志。学说不可能是自封的，也不可能是几个啦啦队捧得起来的。称得起学说，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概念、范畴，独立的研究方法，和比较完整的一以贯之的体系。当然，要产生一批光彩夺目的学说、学派不可能立竿见影，它需要一系列条件，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伦理的，还有研究手段、思维方式等等。这里着重讲两点：

从外部条件上说，要长治久安。安，从社会学、行为科学看，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其实，不管什么人，无不以“安”为地。“安”比“食”更重要。安是安全之安，不是“静”。在学术上，万籁无声不好。“安全为生产”。我们要的是能够指导精神生产力的充满活力的安。

从内部条件上说，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科学探索在遇到险阻时，要用自己燃烧着的献身火炬去照亮科学发展的道路。

1989年12月4日《文汇报》

争鸣“四忌”

一年来，我投入了编写《社会科学争鸣大观·社会学卷》的工作。从40年的争鸣轨迹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时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贯彻得好，什么时候学术就繁荣；什么时候贯彻得不好，什么时候学术就不那么繁荣。

学术事业发展的曲线，值得各方面注意。我在这里仅从学者如何开展争鸣、怎样“争鸣”就叫“犯规”的角度，谈点看法。我认为争鸣有“四忌”：

一忌“砍学科”。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学科总是由粗到细的。依其研究对象的切割，出现一门又一门学科是合乎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轻易地砍掉一门学科，就等于挖掉一只观察世界的眼睛。我国有些社会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同社会学被砍掉20多年，不无关系。对绝大多数学科来讲，只有以什么思想为指导这一点上的区别，并不存在可有可无之说。

二忌“禁学说”。学说有高下，有正误。但是，学说之所以成学说，总是抓住真理的一个方面，不可能没有一点合理成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合理成份，也得给它一块地盘。在总体上唯心的，说不定还有辩证法，甚至也有局部的朴素唯物的成分。即使是出于剖析的动机看一门学说，也得给学说以生的权利。无条件地全盘否定一种学说，是形而上学。我们否定遗传学上的摩尔根学派，是何等的坚决啊！结果怎么样呢？摩尔根学派不还是照样有人研究、有人讲解吗？学说是禁不了的。

三忌“乱上纲”。学术与政治的界限讨论了几十年，始终没说清楚。讨论一阵，似乎快要说清楚了，忽然一下子又说不清楚了；说不清楚，在实践上不利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又得再从头讨论起，再折腾一番。学术观点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实际工作部门一定采纳。学术观点如果被党政部门采纳了，变成指令性的了，那就是政治。或者是被人拿到街上作为蛊惑人心的工具了，那也就是政治了。学术观点变成政治行为以后所产生的影响，不论优劣，都由政治行为的主体负责，除非学者自己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变成政治行为了。学者之所以成学者，就一定要有独到见解。所谓“独到”，无非是社会所未到，无非是有别于常见。这样，“独到”就必然有二重性，有正误之分，因此也就容易被认为是错误。对学者的学术观点可以批评，但是任何批评者都只能作为一家之言来批评，不能无限上纲，不能一锤子定音。回顾马寅初、孙冶方等学者的观点的沉沉浮浮就更加容易理解这一点了。当然，对已经转化为政治行为的错误观点，是另一码事，必须批判，不能手软。

四忌“找后台”。学者是靠真理吃饭的。只要抓住了真理，就可以所向披靡。即使有点曲折，最终还是真理取胜。因此，学说的兴衰，主要看学术水平的高低，看对实践是否有用，而不必组织啦啦队，更不必找什么靠山。找靠山压制对方，不好；找靠山抬高自己，也不好。喜欢找靠山，只能说明自己的浅薄和虚弱，是缺乏自尊、自信的表现。苏联的李森科派的后台够硬的了，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硬了，但是他们也只能逞强于一时，久而久之还是为人所不齿，至少在用行政手段压对方这一点上，为众人所不齿。

砍学科、禁学说、乱上纲、找后台都是文坛上的犯规行为，都是不利于争鸣的，都是学术园地中的病虫害。学者之间的不团结现象，有很多是大帽子扣来扣去扣出来的。不同学科、不同学说、学派的学者，共同注意了这四忌，争鸣才能争得起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学术事业才能成为世界学术之林中

的参天大树，社会也才能真正持久稳定。鸦雀无声不是真正的稳定。

1990年2月9日《昆明日报》

在“繁荣”上多花力气

当代学术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科丛生，学说蜂踊，学派林立。中国要在世界学术百花园中占据更大的地盘，必须进一步强调繁荣，在“繁荣”上花大力气。“万紫千红才是春”。学术界要繁花似锦，除了提高繁花自身的生长能力以外，客观上还必须为繁花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学术生态环境是多方面的。当务之急是广开言路。言路广开，学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出来了。积极性、创造性是学术事业的能源。学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出来了，学术界的繁荣景象就出现了。当然，繁花之中一定会有不那么香的花。香花同不香的花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不香的花，谈何香花？牡丹虽好，要绿叶相扶。有人把绿叶说成绿色的叶子，这不全对。绿叶是有臭味的植物。把绿叶种在牡丹旁边，牡丹就可以免受虫咬。牡丹的存在也有臭绿叶的功劳。繁花无论如何要比无花、少花好。希望《新论》继续在“繁荣”、繁花上多做工作。

1991年第500期《解放日报·新论》

理论上要有突破

文化发展，说到底就是文化改革，文化突破。改革就是对传统的突破。任何传统，不管它在历史上起过多么大的作用，不管有多少人在按它来行动，总是要被突破的，总要或多或少地改变的。“花无百日红”嘛！听说草原上有种花，能超过百日而不枯，但一千日以后还是会枯的。

文化发展要靠发展着的理论来指导，文化发展要靠发展着的理论来支持、巩固，文化发展也必然会升华出新的理论。这是辩证法加给我们的。环绕文化的理论是多侧面、多层次的，也可以说是有体系的。对已有的文化理论，要作一番分析，分清哪些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哪些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希望未来的人们产生与未来的人们有利的理论、舆论来。恩格斯还说，未来的人们在造舆论时会不管恩格斯时代的人们如何看待他们。今天，一切活着的人，相对于恩格斯来说，无不是“未来人”。因此，我们有义务、有权利在理论上“突破”。理论上突破的广度与深度，是衡量文化发展的重要尺度。愿理论之花盛开！——盛开其实也是对花蕾的突破。

1986年5月14日《文汇报》

文化建设需要文化理论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出现文化建设高潮。

几十年来，中国出现了几次文化高潮，似乎没有人论述过。只记得有人论证过中国文化界的几次大批判、大论战。

不论是文化高潮，还是文化建设，都需要理论作先导，具体地说，都需要文化理论来开道。

近年有人研究文化学。还有人提出了文化学的各种子学科。最近，又有人认为不存在什么文化学，也有人开始批判现有的文化学。

中国学术界有个习惯做法：当有人不赞成什么“学”时，就改用一个词“理论”。用“理论”二字来代替“学”。“学”与“理论”有多大区别？我不清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不，为了节省点时间，我们姑且都用“理论”。

我认为，为了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研究文化理论。没有文化理论，或者说文化理论不完善，必然妨碍文化建设。记得，在一次庄严的会议上，有人批评某影院改为舞厅的做法。正在讨论着，又有人提出这家影院，原为剧场，当时剧场改影院就不对。在讨论了很长时间以后，我发言了。我说，判断这个影院应不应该改为剧场的尺度到底是什么？影院、舞厅、剧场三者应该保持怎样的比例关系？在怎么样的地方保持怎么样的关系才是合理的？这些问题清楚了，才能对影院改剧场有个是与非的结论。如果在舞厅过剩时，还把影院改舞厅，就是错的；反之，就是对的。从文化建设的宏观看，更需要文化理论指导。

那么，文化理论怎么形成？我认为，一靠实践，二靠讨论。要鼓励多种文化理论的提出。通过百家争鸣，辨别高低。一旦辨别清楚了，随着实践的发展，又会发现当初所谓清楚的结论，可能起变化，可能不清楚，甚至可能不正确。但是，真理总归是真理。真理总归会指导实际。一种理论一出来，就随便贴标签，不论是贴“是”的标签，还是贴“非”的标签，都不好，都不是科学态度。按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任何理论都是有是有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绝对的“是”，是神话。

说到这里，我想再一次提出个文化理论形成的条件问题，土壤、水份、阳光问题。要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度里，形成伟大的能对文化建设起建设作用、起指导作用的文化理论，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理论环境。我在几年前曾想对这一点的研究叫做学术生态学。在这样的理论环境里，大家精神振奋，大家情绪高昂，大家浑身有劲。人人都觉得浑身有劲了，事业就好办了。

我渴望为了推动文化建设，首先造就出一个有利于文化理论产生的生态环境。

1991年第1期《群言》

理论热的热度会更高

1997年将是热闹非凡的一年。在那非凡的热闹中，“理论热”将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股热流。

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18个年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今天也已整整5年。18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有谁参与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没有，不可能有。5年来蓬蓬勃勃发展的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数以千计的学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富矿炼好铁，好花结硕果。新的实践必将产生新的理论，丰富的理论源泉必将奔腾起丰富的理论。

理论水平取决于理论家的素质。中国学者的学风，在“文革”后有很大改进。诠释型的理论少了，独创型的理论多了。以势压人的少了，以理服人的多了。赶浪头的少了，甘于寂寞的多了。尤其是一些大家，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从不摇来摆去。相信在1997年，中国齐放着的百花会放得更开，争鸣着的百家会争得更热。

理论是为文明开路的。理论是文明大厦的支柱。理论是一个民族的第一象征。缺少理论是苍白的，有了理论就有了血气。在快要告别20世纪、迎来21世纪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理论勇气鼓得足足的，把我们的理论水平提得高高的。

1997年第1期《群言》